

C 目录

CONTENTS



主管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

主办单位：中国金融学会

《武汉金融》杂志社

本刊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顾问 陆磊

主任 杨立杰

编委

卜永祥	马天禄	王 信	王 斌
王芝斌	王季明	文行赤	邓 晖
龙志林	刘美频	刘卫星	刘志高
朱新蓉	朱正罡	朱渝杭	毕 伟
邬君宇	李 民	李秉恒	李红石
李 鹏	李中文	宋清华	吴少新
杨 德	汪 博	陈小强	陈新民
陈传龙	陈大林	陈任武	陈盛银
张劲辉	林顺辉	周全锋	姚余栋
钟 钢	贺杰峰	高新华	徐长生
徐晓华	徐小建	袁 敢	黄 宪
黄旭东	葛春尧	曾晓阳	赖秀福
潘明忠			

重点课题

03 博物馆资源共享问题探究

夏红艳

钱币学研究

05 宣统三年湖北粮饷局铜圆拾枚钱票
——伪造的清代湖北官票

张或定 张峭峰 张劲峰

08 论顺治钱穿

黄定学

11 江淮银行及其纸币

朱清华 李 东

16 新发现的金代“大定通宝”背“申酉”折十试铸币初探

周泰宇

18 浅谈先秦货币转折演变标志的魏国桥足布

周泰宇

23 清代汉口“晋和钱号”制钱票和铜元票
——汉口老字号“晋和铁号”与“晋和钱号”

张或定 张峭峰 张劲峰

根据地货币

26 试论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财经建设的作用及特点

苏利德

31 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公债券述析

张慧琴

人民币管理

33 硬币自循环的三个关键环节

马俞敏 王 蓉

2016 / 12

湖北钱币专刊

总第15期

36 对目前硬币市场流通情况的调查
——以江西吉安市为例

马友龙 刘小兰

泉海杂谈

38 钱币上的“福”文化

叶真铭

47 中华文化影响下的古代琉球王国铸币

叶真铭

51 顺治珍钱三品

黄定学

53 蕲州钱监满地金

曲 毅 段涛涛 刘斌荣 郑 飞

55 顺治钱风景这边独好

黄定学

59 湖南黄铜元鎏金样币收藏研究简述

段洪刚

60 对做好吉安红色金融工作的思考

刘小兰

62 民国汉口和成银行经理赵忍安

吕怀平

63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货币制度立法探析

黄 丽 何 康

红色精神

66 重温延安时期经济金融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郑泽生

68 延安行

刘双庆

主 编 赵以邳

副 主 编 邓亚平

执行副主编 童展鹏

主 任 吴 莹

值 班 主 任 熊 敏

广告部主任 吴俊伟

法 律 顾 问 瞿森垓

技 术 编 辑 邓雅娜 胡松林 蒿倩文

出版单位：《武汉金融》杂志社

发行单位：《武汉金融》杂志社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9-3540

国内统一刊号：CN42-1593/F

封面题字：中国书法家协会钟鸣天理事

印刷单位：湖北楚天传媒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广告许可证号：4201004001161

增刊备案号：421593201601

每册定价：11.00 元

编辑部电话：(027)87327462

发行部电话：(027)87327465

广告部电话：(027)87327290

本刊地址：武汉市武昌中南路69号

邮 编：430071

投稿平台：<http://yhqy.cbpt.cnki.net>

本刊声明

■本刊从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征集稿件，刊发文章不收取任何费用。

■本刊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数据等网站有合作，作者投稿一经本刊采用，如无特别声明，均视为同意接受以上网站的数字传播与发行。

■本刊版权属《武汉金融》杂志社所有，其他媒体转载本刊文章，须注明“摘自《武汉金融》”字样，否则即侵权。

■本刊谢绝一稿多投；文责自负。

博物馆资源共享问题探究

夏红艳

一、博物馆资源共享的内涵

资源即为博物馆中存在的书籍资源、展览品资源、管理资源等等,将自身的优势与他人共享。有限的资源与人们对各类资源的无限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博物馆资源共享活动的深入开展。

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资源共享研究已经开展了较长一段时间,具有一定的成功经验,而我国博物馆资源共享的相关研究相对较为匮乏,不利于博物馆的深入、长远发展。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更多的博物馆开始采用资源共享的方式实现资源最佳利用。

二、博物馆资源共享的重要性

博物馆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文化的展现场所,蕴含着浓厚的文化色彩。然而由于受到经济条件、社会历史因素等问题的影响,我国博物馆的分布以及展览品资源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差异特点,一些地区博物馆资源难以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而一些博物馆中的资源却得不到充分的利用,这种问题便造成了博物馆资源浪费的问题。

2015年颁布的《博物馆条例》中指出,博物馆是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随着时代的发展,博物馆不再仅仅是收藏文化遗产的场所,其教育价值更加凸显。博物馆开始富含一定的社会责任色彩,而有效的资源分享能够充分展现博物馆的教育意义,消除地区、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博物馆资源共享实际上是一种分散资源的有效整合方式,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博物馆可以通过构建博物馆系统的方式,将各个博物馆中的资源难以满足游客需求的时候,便可以寻求博物馆系统的帮助,在博物馆系统中查询资料,弥补自身的不足之处。

三、博物馆资源共享的主要方式

博物馆资源的共享,需要做好博物馆展览资源的标准化编目工作,加强馆际之间的交流以及充分发挥博物馆资源的教育价值等方式,保证博物馆资源共享活动的深入、持续发展。

(一)做好博物馆展览资源的标准化编目工作

博物馆中富含着丰富的展览资源,而这些资源主要是通过收购、采集或是捐赠等方式获得。博物馆会

将各个展览资源进行编号,对各个产品的实际出产产地、来源等进行详细记录。博物馆展览资源编号是博物馆的基础工作之一,也是博物馆资源共享的前提。

当前我国博物馆资源共享的方式较多,每个地区之间的博物馆展览资源编目方式也会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博物馆资源共享也会出现查找混乱或者编码不同等方面的问题,不利于博物馆资源共享活动的深入开展。针对这一问题,可以通过统一展览资源分类编目的方式,寻求相对统一的博物馆展览资源编目方式,进一步加强国内博物馆之间的交流与资源共享。同时,博物馆之间还需要制定相对统一的资源共享制度,明确博物馆资源共享中各方面需要承担的义务及责任,进而为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以及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加强馆际之间的交流

在当前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还需要学习优秀博物馆的科学技术,加强博物馆人才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注重参与各类博物馆学术交流活动,在相互交流中不断学习、不断进步,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这将对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馆际交流也是互通展览资源、丰富展览品资源的有效方式,将博物馆中的富余资源赠予其他博物馆,获得博物馆中的稀缺资源,在丰富博物馆展览资源的基础上,也有助于构建良好的合作关系。

(三)充分发挥博物馆资源的教育价值

博物馆中的展览资源较为丰富,展现着人类文明发展与变化的过程,具有较大的纪念意义与教育意义。博物馆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展览资源教育价值,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

比如博物馆可以开展一系列的文物资源共享及教育共享等活动,把固定展览做成展板对外巡展,包括进社区、军营、乡镇、学校、企业。同时,博物馆还可以将教育资源进行共享,把博物馆的文物做成观众可以参与的相互项目,比如手工参与制作精品课程教授学生等等。

(四)提升博物馆公共服务功能

1. 公共服务是博物馆的核心要素。进入21世纪,公共服务意识开始在社会兴起并逐渐成熟,博物馆研究、保护、展示的传统角色也开始了新的转变,人们对

博物馆是为社会及其社会发展服务的认识和理解已在逐步形成,公共博物馆服务于广大民众是博物馆的基本功能。美国著名学者詹金斯在其《博物馆之功能》一书中明确指出,博物馆应成为普通人的教育场所;美国博物馆协会成立时就宣言“博物馆应成为民众的大小”;博物馆协会在解释博物馆的定义时,将“教育”与“为公众服务”并列视为博物馆核心要素。

2.转变观念、强化服务意识,创新服务方法。我们要改变博物馆藏品研究为中心传统理念,强化服务意识,确定以展示教育和开放服务为核心的博物馆经营新理念。评价一个博物馆的价值,不仅要看其收藏的丰富和精优程度,更要看它在鼓励观众参与和学习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博物馆的主要职责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吸引每个公众经常来博物馆参观博物馆。其次,要正确处理好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关系,树立一切围绕群众,为各层次观众服务的观念,设计好符合观众需求的各种展览、各种讲座、各类教育活动,既要“请进来”,也能“走出去”,以观众的评价作为我们的工作导向,努力开展公共服务工作,不断增强博物馆的活力和社会影响力。如,今年九月由博物馆携手联袂孝感中心支行,在孝感人民广场举行金融知识集中宣传活动,市直12家金融机构、30家保险机构、2家证券机构和2家支付机构参加宣传。此次金融活动以“湖北近代钱币展”“搭台,集“金融知识普及月”、“反假币宣传月”、和《反洗钱法》颁布十周年活动于一体,在历年金融知识宣传活动中尚属首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搭台、金融唱戏”,将钱币展引入人民银行的金融知识宣传和人民币知识宣传,是一种全新的尝试,通过此种形式即普及了钱币知识,又引导了民众收藏兴趣,即贴合时代发展需要,又弘扬了钱币文化,现场气氛活跃,是一次效果很好的临时性展览。

(上接第30页)击、流动性大的艰苦环境中,使有限的经费物资有计划、按比例的开支,供应给各个部队。这样既较好地保证了抗日部队的供给,减少了部队对群众的骚扰,又增强了部队间的团结,密切了军民关系,从而使部队更好地开展对敌斗争。

2.贯彻了合理负担政策,扩大巩固了抗日统一战线,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坚持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总政策,贯彻了党的合理负担政策的方针,并且通过实践,制定了一系列符合根据地的具体政策,由于坚持了从实际出发,正确处理解决了与人民群众、地主、富农及“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的各种复杂关系,使得各阶层的公粮、税收负担公平合理,既保护了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调动了他们生产和抗日的积极性,也适当地照顾了地主、富农的一些合法

3.重视博物馆人才培养,提升公众服务水平。专业技术人才是博物馆公共服务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策划布展方面专业人才事关重要,陈列展览直接面对博物馆一线观众,是博物馆开展公共服务的核心,是博物馆对外的窗口,是博物馆各项公共服务的总策划,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一个单位的营销部,是公共服务的窗口,因此策划人才的配备至关重要。

在人才的选拔上,我们应该打破单位、部门的界限,向社会各界公开招聘,真正地选拔出来适合这一岗位的组织管理人才,推动博物馆公共服务的开展。

在现有基础上,我们积极进行人才培养和轮训,加强博物馆的人才和队伍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的思想水平、专业素质和社会服务能力。

结束语

博物馆资源共享有助于丰富人们的日常休闲生活,保证资源的有效利用,对社会文明建设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新时期背景下的博物馆资源共享,需要做好博物馆展览资源的标准化编目工作,加强馆际之间的交流以及充分发挥博物馆资源的教育价值等方式,保证博物馆资源共享活动的深入、持续开展,带人们了解更多的历史文化,充分展现博物馆的教育价值与社会影响力。▲

[参考文献]

- [1]徐青,何磊.地方博物馆美术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安徽博物馆为例[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8).
- [2]刘小瑛.我国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数字资源整合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应对策略[J].图书馆学研究,2014,(12).
- [3]胡心悦.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资源整合的发展趋势——基于ICA、IFLA和ICOM历届会议主题的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4,(17).
- [4]刘艳,王民.博物馆“资源—游客”双核环境解说规划模式研究——以北京自然博物馆为例[J].世界地理研究,2010,(1).

利益,以争取他们对抗日的同情与支持。这样做既有效地体现了共产党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政策,从而保证了根据地财经工作的顺利开展,又进一步巩固了抗日统一战线,调动了各阶层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及其生产热情。

3.改善了军民的艰苦生活,增强了抗日战争的实力。在日伪的残酷经济封锁下,正确的财经政策带来了根据地生产的发展,增加了社会财富;政府又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成立各种合作社,使得根据地军民的生活随着经济工作的好转而不断改善,群众、部队生产能力的提高,又促进了抗日游击根据地经济的发展,大大地加强了抗战的实力,也使根据地的财政逐步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宣统三年湖北粮饷局铜圆拾枚钱票

——伪造的清代湖北官票

张或定 张峭峰 张劲峰

2006年6月,北京某知名拍卖会上,有一张宣统三年(1911年)湖北粮饷局铜圆拾枚钱票拍品,系国内首次出现,仅见此一张,加上,它是湖北地方政府负责粮饷机构发行的钱票,属地方官方纸币,因此,竞拍者踊跃,其拍出价,竟高达49,500元,已成为纸币爱好者争相选购的热门品种。数年来,一直有人在关注此票,进行宣传、介绍或鉴赏。例如,《泉坛》杂志上就有介绍。

研究表明,宣统三年(1911年)湖北粮饷局铜圆拾枚钱票,作为湖北地方政府机构的官方钱票,它的出现,明显与清代湖北地方政府机构发行官方纸币的政策、规定以及传统做法,格格不入,存在诸多疑问和矛盾,显然,它是一张经过精心伪造的湖北清代官票。

为此,本文就宣统三年(1911年)湖北粮饷局铜圆拾枚钱票及有关疑问和矛盾等问题,作简要考证与分析。

一、湖北粮饷局铜圆拾枚钱票

湖北粮饷局铜圆拾枚钱票,为竖式票,单面印刷。图案与文字,为蓝紫色,铅印而成(图1)。

正面图案,由边框、天格和地格组成。

边框,由牡丹花及花卉等图案组合而成。

天格内的文字是,“湖北粮饷局”。

地格,分为左、中、右三部分:

右侧,有编号:“局字第肆捌七三号”。其中“肆捌七三”字,为蓝色墨汁书写。

中部,为面额文字:“凭票发铜元拾枚正”,“铜元拾枚”,相当于制钱一百文。作为湖北粮饷局之官票,“正”的写法,极不规范,此处应以“整”字代替为妥。

“铜元拾枚”处,盖了一枚圆形押款章,但不清晰。印章是清代纸币防伪的重要措施之一,本应清晰规范,以便识别。

左侧,为发行时间:“宣统三年吉月吉日”,其中,“吉”字为黑色毛笔书写。显然,此吉字与蓝色“肆捌七三”编号,不是一次书写的,有违常规。

按常规,作为行用票,在“吉月吉日”下方,还应盖上一枚“湖北粮饷局”落地章,但此处却没有。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湖北粮饷局铜圆拾枚钱票的形制,接近于民间商号发行的钱票。

这种钱票形制,与清代湖北地方政府发行的官票

相比,其风格截然不同,不得不令人生疑,应当进一步加以分析和研究。

二、非官票形制,有违清代湖北官票常规

从机关名称上分析,湖北粮饷局显然是清代湖北地方政府专门管理粮饷的机关,属地方官办机构。

目前所知,史料记载,清代湖北地方政府发行过纸币的机构,仅有湖北官钱局和湖北银元局发行过纸币,有制钱票(图2)、银元票(图3、图4)及银两票(图5)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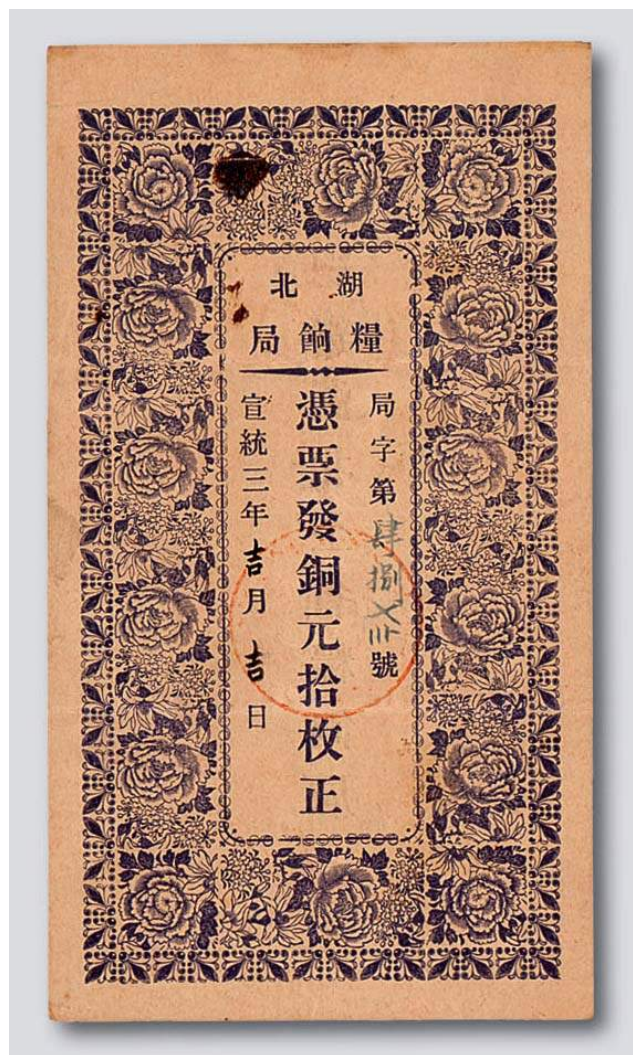


图1 宣统三年湖北粮饷局铜圆拾枚钱票

这所有钱票,在其正面图案中,均包含有“二龙戏珠图”,图案精美,庄重、大气,这也是湖北官方纸币的典型风格。

相反,湖北粮饷局铜圆拾枚钱票,图案简单,粗糙,其风格近似民间商号发行的纸币,与湖北官方纸币风格,大相径庭,有违常规。

三、作为官方行用流通票,没有落地章,明显不妥

湖北粮饷局铜圆拾枚钱票之上,有编号,也有发行时间,并盖有押款章(尽管不清晰),显然,它应属行用流通票。但是,作为官方行用流通票,却没有必需加盖的“湖北粮饷局”落地章,而落地章,是发行单位的重要凭证或证明,也是钱票防伪的重要措施之一。

“湖北粮饷局”落地章,此前从未出现过,也无印章可借鉴,若另行刻制,颇为困难。因此,此官票缺少落

地章,再加上圆形押款章,故意加盖模糊不清,而且圆形章又有伪于官印风格,从而漏出了该票作伪的狐狸尾巴。

四、湖北粮饷局无权发行纸币

清末,张之洞督鄂期间,成立的湖北官钱局,其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负责湖北地方纸币的统一发行,尽管早期湖北银元局也印刷了纸币,但它也是由湖北官钱局负责发行的,并盖有“湖北官钱局”落地章。光绪后期,湖北地方政府发行的纸币,均以湖北官钱局名义发行,其他官方机构无权发行。

宣统三年(1911年)时,作为湖北地方政府机构的湖北粮饷局,显然无权印刷或发行任何纸币。

五、光绪后期,湖北地方政府发行的官票,均由日本印刷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湖北官钱局试办之初,



图2 湖北官钱局壹串文钱票



图3 湖北官钱局壹大元钱票

其纸币,由汉口本地印刷,后来,由于出现了伪造票,于是张之洞决定,湖北官方纸币一律改由印刷技术水平更为先进,且带有防伪措施的日本印刷厂家印刷,并形成制度。

前面介绍的几张湖北官钱局和湖北银元局纸币,均由日本印刷。即使在宣统元年(1909—1910年)期间,湖北地方政府发行“湖北公债票”时,仍然遵循这一传统,由日本印刷厂家印刷。

按照湖北地方政府的传统,宣统三年(1911年)湖北粮饷局铜圆拾枚钱票也应采用日本印刷,但却不是,这有违常规。

此外,日本印刷的纸币,均采用石版印刷,而湖北粮饷局铜圆拾枚钱票,其文字却为极易于伪造的铅印;这种做法,显然也是湖北地方政府所不允许的。

湖北粮饷局铜圆拾枚铅印钱票,有违湖北地方政府的传统和常规。

六、清代湖北政府机构中,无“湖北粮饷局”这一机构

从湖北粮饷局名称分析,像湖北官钱局和湖北银元局以及湖北铜币局一样,湖北粮饷局也应是湖北地方政府中的一个机构。



图4 湖北银元局壹大元钱票

查《湖北省志·政权》地方志,清代湖北地方政府机构中,无“湖北粮饷局”这一机构。不过,清代湖北地方政府机构中,曾设有专司军饷的机构,称作“湖北军需总局”。

“湖北军需总局”是同治五年(1866年)以后由湖北地方政府将省总粮台改制而成,负责应支水、陆、马、步军军饷、军需以及协济邻省军饷。光绪六年(1880年),湖北地方政府又将“湖北军需总局”,改为“湖北善后总局”,专办战争善后事宜,此后,湖北财政方面的诸多事项,也逐步由其承担。宣统元年(1909年)湖北成立清理财政局,委派各司道共同监理,湖北善后局总办。

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湖北地方政府改设财政机构,裁撤湖北善后局和湖北统捐局,(下转第37页)



图5 湖北官钱局拾两“双像”银两票

论顺治钱穿

黄定学

(十堰市钱币研究会)

穿,本意刺孔;凿通。引申义有:洞孔;过,连通,如穿针;透,破,如戳穿;着,如穿戴等。穿的上述意义,除洞孔外,多数用为动词。钱穿则是指钱身之孔,也称好。方者叫方穿、方孔;圆者叫圆穿、圆孔。古时称圆穿者叫圜金,方穿者叫圜钱。这时,穿则成了钱币学中的一个专有名词。

一、性质与意义

顺治钱穿即顺治钱中间的方孔。顺治钱身上的方孔有什么意义?第一,代表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即哲学观点。同时,也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思想。第二,是中国古钱的一种固定形制,这种形制在先秦就出现了,并且成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全国统一的标准货币。到清顺治时,已行用了二千多年,是一种经受了长期实践检验的货币形制。第三,是世界东方货币文化的主要特征。中国的方孔圆钱,是构成世界东方货币体系的支柱,具有不同于西方货币文化的典型特点。这种方孔圆钱,也为中国周边国家所接受与效仿,他们也相继铸造和行用方孔圆钱。这样,世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货币体系便形成了。

二、穿的种类

根据现存实物,按照不同的分类方法,顺治钱的穿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

(一)按穿的形状分

1.方穿。即钱孔呈四方或矩形。基本形式,可细分为三种版别。

(1)四方穿,穿的边长基本相等,是顺治钱穿的基本形式,极多见。如第一式上户版背一,直径25.3毫米,厚1.2毫米,穿5毫米,重3.1克(图1)。



图1

(2)长方穿,即穿竖向的边长,横向的边短,略少

见。如第二式右临,直径26.7毫米,厚1.5毫米,穿横4.9毫米,竖5.7毫米,重3.9克(图2)。



图2

(3)扁方穿,即穿竖向的边短,横向的边长,略少见。如第二式小头通右户,直径25.2毫米,厚1.2毫米,穿横6.2毫米,竖5.4毫米,重4.1克(图3)。



图3

2.圆穿。真正的圆穿钱实物尚未发现。根据所见实物推断,圆穿钱在理论上是应该存在的,只不过是未开金口的祖钱。如顺治第五式钱中有一枚隔轮版满汉东,直径27.1毫米,厚1.1毫米,穿5.1毫米,重3.8克。穿四周尚留有开穿时未有修平的圆弧形痕迹,应是圆穿存在的间接证据。此类钱穿不多见(图4)。



图4

3.混合穿。即穿郭是方形的,穿中间是圆形的,实物并不少见,约占百分之一。这也是圆穿钱存在的证

据之一。这类穿很标准的只收集到两版,特点是都比较厚重。

其一,第二式右小同。直径25.9毫米,厚2毫米,穿径5毫米,重6.7克(图5)。



图5

其二,第四式背满文宝泉,直径27.3毫米,厚1.8毫米,穿径5.3毫米,重6.3克(图6)。



图6

4.花穿。即穿呈八菱形,有8条边,系铸造中移范所致。钱图系夏野先生提供,参数不详(图7)。



图7

(二)按穿的大小分

在顺治五式钱中,广穿、狭穿是最多见的版式。每一式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

1.狭穿。即同版钱中穿径相对较小者。如第一式狭穿上圈,直径26.2毫米,厚1.2毫米,穿4.3毫米,重3.9克(图8)。



图8

2.广穿。即同版钱中穿径相对较大者。如第一式广穿上圈,直径25.3毫米,厚1毫米,穿5.2毫米,重2.5克(图9)。



图9

(三)按穿的修磨程度分

《天工开物》把古代钱币铸造总结为八道工序,其中一道就是“洗穿”,即现在所说的修穿。修穿的目的就是去除穿内的毛刺、飞边等多余部分,使之便于加工、使用、穿系、携带。

其一,按穿的修磨程度不同,区分为三种情况。

1.修穿。顺治钱大部分都是修穿的,但是穿往往修得不彻底,穿角常有未修到的地方。如第三式广穿福一厘,直径25毫米,厚1.1毫米,穿6.2毫米,重4克(图10a)(图10b)。



图10a



图10b

2.精修穿。顺治钱中的精修穿很少见,是否精修穿,只有和同版钱相比较才能确定。这类穿的边和角修的既彻底、又规整。如第三式广穿福一厘,直径25.3毫米,厚1.5毫米,穿6毫米,重4.65克(图11a)(图11b)。



图 11a



图 11b

3.不修穿。不修穿的钱在顺治钱中也不是很多。不修穿可能有三种情况：其一，铸造精度较高，穿不必修；其二，工序遗漏；其三，对于面、背、边都进行了修磨，唯独不修穿，而字口又特别清晰深峻，则有样钱可能(图12a)(图12b)。



图 12a



图 12b

其二，按穿被修磨后的拔模斜度，又可分为直穿和

坡穿。

1.直穿。如第一式等川顺尔宝单点通光背，直径25.9毫米，厚1.3毫米，重4克。穿径正面4.7毫米，背4.8毫米，正、背穿径差别很小，用肉眼观察，几乎没有拔模斜度，钱币界习惯称直穿(图13)。



图 13

2.坡穿。如第二式右户版右工背四决，直径26.5毫米，厚1.5毫米，重4.9克，穿正面5.1毫米，背5.7毫米，拔模斜度明显(图14)。



图 14

三、穿的作用

任何一种物件，其构成要素必然有它存在的理由。比如写小说，前面写墙上挂着一条枪，后面就必须要有开枪的细节描写，否则，前面的枪就是多余的。顺治钱穿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

1.便于加工，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钱穿其所以设计成方的，第一个作用就是便于加工。钱在修磨时除了洗穿外，还要磨外圆。古时修外圆时用一根金属条把钱穿起来，可以防止钱滚动，便于加工。

2.便于穿系、计数和携带。钱身有孔，便于用绳索穿系。有时出土窖藏钱币，有的码放得很整齐，而且有绳索穿系并腐烂后留下的痕迹。古时，习惯把一千枚钱穿在一起，作为一个数量单位。古时称一“缗”，宋时称一“贯”，明清时称一“串”。过去，把许多钱穿系在一起，缠在腰上携带。久而久之，便成了一个成语：“腰缠万贯”。

3.便于鉴定钱的性质。一定时期的钱，由一定时期所采用的铸造工艺铸成。同时，也要运用一定的修磨技术进行修磨处理。比如，通过对穿和其它方面的比较，可以成为区分普通钱、样钱和母钱的依据之一。▲

江淮银行及其纸币

朱清华 李 东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抚今追昔,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已经经过了95周年的风雨历程,那些曾经为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革命根据地货币一直被收藏、研究者视为珍宝。这些根据地货币是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斗争的历史见证,在中国数千年的货币史上占有特别光辉灿烂的一页。本文对抗日战争期间,华中抗日根据地发行的江淮银行及其纸币进行初步分析,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江淮银行纸币产生的背景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中国共产党为了领导全国人民把抗战进行到底,彻底粉碎顽固派破坏抗战的一切阴谋,决定以苏北盐城的华中总指挥部为基础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所属部队编为7个师和一个纵队。

华中抗日根据地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战时期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194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建立与巩固华中根据地的指示》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保障军需供给,刘少奇、陈毅亲自召集朱毅、李人俊等有关人士研究,决定迅速筹建根据地银行和印钞厂,发行自己的货币。关于新建银行的名称当时有人提议“两淮银行”,刘少奇认为“叫两淮”面太窄,也不够气派。新四军还要向东发展,继续挺进将来是面向大江南北,横跨淮河两岸。由此而孕育“江淮”二字,江淮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得名的。

1941年4月1日,江淮银行在盐城成立,这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第一所银行,江淮银行属新四军军部财经部领导,财经部部长朱毅兼任江淮银行行长,副部长李人俊、骆耕漠任副行长,银行下设营业、会计、秘书三个科。江淮银行共计四十余人,有三个方面人员组成,一是军部调派来的党政财政干部,二是上海地下党选送来熟悉银行业务的同志,三是选调自抗大五分校的部分学员。

为了加强苏中区对敌斗争,发展根据地人民经济。1941年6月15日在泰东县栟茶镇(泰东即今海安东部,现栟茶属如东县)建立江淮银行苏中分行,李人俊兼任行长,又在泰东县李堡镇(现海安县)设立办事处,在四分区掘港(现掘港属如东县)设立掘港支行。当时江淮银行的主要任务是发行货币,调剂社会金融;代理金库;办理存款放款、汇兑业务。

苏中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富饶的长江南北,辖20个县,与日伪控制的上海、南京等大城市隔江相望,是敌我激烈争夺的中心地区。斗争十分尖锐。1941年夏,日伪军对苏中盐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扫荡”,使苏北抗日根据地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开业仅三个月的江淮银行随新四军军财经部转移,撤离盐城。反扫荡经验告诉人们,根据地银行与印钞厂的建设必须适应游击战争环境,立足于长期艰苦奋斗,一切服从抗日需要,不宜摊子过大。因此,从1941年9月开始,苏北根据地对领导体制和组织机构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从1941年9月,建成了盐阜区行政公署,盐阜区作为一个直属的战略区。从此,江淮银行分支机构主要设在苏中地区;江淮银行苏中分行也从1942年分别进行了机构调整,下设江淮银行苏中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等支行,各县与部分大的集镇也设立了江淮银行办事处。

1941年5月,江淮银行印钞厂基本筹建完成,当时印钞厂厂长由李人俊兼任,党组织以“华光公司”的名义从上海采购到脚踏凹印机10台、手板凸印机8台、切纸机1台、照像机1台。并分批秘密运到苏北根据地。最早江淮银行发行纸币的雕刻钞板均由上海华东照相制版印刷公司老板柳薄庆制作,雕刻好的钞板后再由地下党交通员秘密送到解决区。印钞厂所需的主要设备与重要原材料均由他在上海用合法身份采购。此时的江淮印钞厂技术工人已基本到位,印刷材料也运到,机器也安装完毕,但由于日伪军的频繁扫荡,只能拆除印钞机器,隐蔽所有生产资料并转移人员。当时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无前后方之分,银行及印钞厂常遭

日伪扫荡及袭扰,必须时刻作好转移,并保护好印钞设备及物资。印钞厂虽一再试图组织印钞,但由于环境恶劣一直未果。直到1942年4月21日中共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命令李人俊等必须“在两个月内将江淮银行币印完,或者大批印出来”。1942年5月苏北取得了反“扫荡”的重大胜利,新四军财经部副部长李人俊奉命迅速将印钞设备在武装掩护下,冲过多条封锁线,转移到阜宁县羊寨镇南的虹庙正式开工,江淮印钞厂终于正式印钞。

首批印制的江淮银行币票面上均印“中华民国三十年印”即钞板在1941年已经制成,但在1942年8月才开工投产,这一年多的时间也从侧面反映出江淮银行与江淮印钞厂在反扫荡中的不寻常经历。

1942年11月1日苏中行政公署发布公告,正式发行江淮币,公告称“为抵制汪伪排斥法币、实施经济掠夺‘以战养战’之阴谋毒计,以保护根据地广大人民之利益,坚持执行经济抗战之政策,除设立贸易局管理物资出口,奖励进口外,根据地设立银行,发行江淮银行钞票,票额分伍角、壹元、伍元、拾元四种。江淮票一元作法币伍元计算”。自发行日起,江淮票不仅为根据地通用货币,而且为根据地本位货币。公告并强调:“事关抗战利益,与敌人作货币斗争,为争取最后胜利必要措施”。

二、江淮银行发行的钞票

江淮银行共发行过面额为2角、5角、1元、5元、10元、20元6种面额的钞券。

表1 江淮银行发行钞票一览表

年份	面值	图案	颜色	票幅	备注
1943	贰角	额、帆船	蓝/红	52×104	
1941	伍角	牛耕	蓝/棕	54×101	
1943	伍角	额、耕地	紫/红	52×104	
1941	壹元	锯木、插秧	蓝/棕	63×128	盖苏中
1941	壹元	锯木、插秧	蓝/棕	63×128	作伍元盐阜
1941	壹元	锯木、插秧	蓝/棕	63×128	作伍元苏中
1943	壹元	楼	红/蓝	58×117	盖苏中
1944	壹元	插秧	紫/红	56×107	
1944	壹元	浇水	紫/紫	60×114	
1944	伍元	毛像	蓝/紫	63×126	盖苏中
1944	拾元	织布、汽车	蓝/绿	66×12	有无苏浙二种
1944	贰拾元	毛像	蓝/棕	66×128	

江淮银行印制的江淮币主要特征:江淮银行印制的江淮银行钞票行名为刘少奇同志题写,笔法圆润、字体卓然、端庄大方。

江淮银行印钞厂的钞票采用铜板凹印,凸印雕刻,图案以点带线、精巧而复杂,凹印雕刻铜板由地下党带

到上海雕刻,再加上纸张为正宗的印钞道林纸,江淮银行的钞票是抗日根据地的货币中质量最好的。陈毅军长在视察江淮印钞厂时,高兴地赞扬江淮银行币的质量好,可算是抗币中的佼佼者,陈毅同志的视察极大的鼓舞了印钞工人的劳动热情,全厂日夜不停投入生产,印钞效率有了很大提高。

江淮银行的钞票有着鲜明时代的烙印,1941年版和1943年版5角券主图案均为牛耕,反应出当时苏中地区劳动人民以耕牛为主要生产工具(图1、图2)。1943年1元券主图案为楼房,体现出设计者与苏中人民反日伪侵略,要和平,重建美好家园的愿望(图3)。1944年版1元采用插秧,10元券采用织布、汽车为主图案,尤其是5元券、20元券采用毛泽东肖像图案形象逼真,苏中人民群众首先在自己的票子上看到了领袖毛主席(图4、图5、图6、图7)。



图1 江淮银行5角-民国32年版



图2 江淮银行2角-民国32年版



图3 江淮银行1元加盖苏中-民国32年



图4 江淮银行5元毛像-民国33年版



图5 江淮银行5元毛像-背图



图6 江淮银行20元毛像-民国33年



图7 江淮银行20元毛像-背图

江淮印钞厂发行的钞票,其发行的范围较广,不仅在苏中区流通,有的券别也在盐阜、淮北和苏浙地区流通。江淮银行地名券,有加印“苏中”、“盐阜”、“苏浙”三种。

(一)江淮银行加印“苏中”地名券,此券限在苏中各分区流通

加印“苏中”有四种券种:

1941年版,江淮银行1元券,主图案为锯木,正面左右加盖黑体字“苏中”,背有“Hwu Fao”(胡服)英文签名(图8、图9)。



图8 江淮银行1元加盖苏中-民国30年



图9 江淮银行1元加盖苏中-民国30年背图

1941年版,江淮银行1元券,主图案为锯木,正面左右加印红字“作伍圆”,票背中央加印黑体字“作抗币伍圆”,下方为“Hwu Fao”(胡服)英文签名(图10、图11)。



图10 江淮银行1元作伍圆加盖苏中-民国30年



图11 江淮银行1元作伍圆加盖苏中-民国30年背图

1943年版,江淮银行1元券,红色,主图案为楼,正

面左右加盖“苏”“中”地名,背为朱毅、李人俊英文签名。

1944年版,江淮银行5元券,主图案为毛泽东主席头像,票正面分别加印黑体字“苏中”,背为朱毅、李人俊英文签名。

(二)江淮银行加印“盐阜”地名券

1943年盐阜币在市场上吃香,一度发生市场票子不够用的现象,江淮银行为支持盐阜军区增发抗币。1941年1元改作5元券,加印黑色“盐阜”二字。此券是江淮银行印钞厂为盐阜银行代印,专供盐阜地区流通。主图案为锯木,票正面底边两侧加印黑字“盐阜”地名左右两边加印红色“作伍圆”三字,背有“Hwu Fao”(胡服)英文签名和黑体字“作抗币伍圆”。

江淮银行在1941年版壹元券加印流通范围“苏中”、“盐阜”地名,又加印改币值“作伍圆”、“作抗币伍圆”,这种既加地名,又改币值的货币形势在货币发行上极其罕见的,加印“作抗币伍圆”则更是旗帜鲜明的说明了货币性质。

(三)江淮银行加印“苏浙”地名券

1945年,根据时局需要,新四军军部决定成立苏浙军区,在苏浙一带开辟根据地,粟裕同志任苏浙军区司令员。部队带江淮银行1944年版10元券1000万元,为了便于苏中发行的江淮票区别开来,在10元券背后加印“苏”、“浙”两字。此券为1944年江淮银行10元券,主图案为织布、汽车,票背左右分别加印“苏”“浙”两黑体字,背有朱毅、李人俊英文签名(图12、图13)。



图12 江淮银行10元加盖苏浙-民国33年



图13 江淮银行10元加盖苏浙-民国33年背图

刘少奇同志时任中央中原局书记(1947年4月27日改为华中局)新四军政治委员。为了便于工作,刘少奇同志时用化名胡服(Hwu Fao)。为何江淮银行只有1941年版1元券背签字为英文签名胡服,而其它券种的签名为江淮银行正副行长朱毅、李人俊。刘少奇同志签名出现在抗日战争货币上,是唯一的一种。

毛泽东主席头像作为江淮银行5元、20元版主图案,纸币设计尽显毛泽东的神采,雕刻的十分传神,尤其是对五官神韵的细致刻画到位,面部、头发和衣服的线条组织疏密有序,毛主席头像纸币是由柳溥庆的徒弟朱介生、戎乾初、华继培三位共同完成的。

1942年起,日伪反复扫荡,为了适应新形势,江淮银行苏中分行进行了机构调整,下设江淮银行苏中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支行。各支行也发行过钞票。

表2 江淮银行苏中分行各支行发行情况

支行	年份	面额	主图案	颜色	票幅
第一支行	1943年	贰角	方孔钱	绿/绿	55×97
第三支行	1943年	伍角	帆船	绿/桔	62×115
第三支行	1943年	伍角	插秧	蓝/紫	66×120
第三支行	1945年	壹元	农作	蓝/蓝	64×118
第四区	1945年	伍角	牛头	桔/紫	51×110
第五区	1945年	壹元	额	灰/棕	55×118

第一支行印制的2角券,正面为三枚方孔钱,此券是苏中抗日根据地货币中唯一的带方孔钱的钞票,此券限江都、邗江、高邮、宝应、兴化5县流通(图14、图15)。



图14 江淮银行苏中第一支行2角-民国32年版



图15 江淮银行苏中第一支行2角-民国32年版背图

第三支行印制的5角券2种及1元券1种二枚5角券主图案分别为帆船、插秧;1元主图案为农作,在票面上均加印“苏中第三支行发行”字样。限在姜堰、泰兴、靖江、如皋、海安等县境内流通。

江淮银行苏中第四区行政区流通券:伍角桔色,票面加印“作壹元”限流通于东台、如皋、海门、启东、南通等地。

江淮银行五分区支行流通券,壹元券,主图案为数额,票背印有“每百元作公粮二百市斤”。限流通于扬中、扬州、镇江、丹阳等地。

加印与改值票是货币在紧急状态下的特殊产物。因为抗战形势发展之快出乎意料,所以从第一、三、四、五印制的流通券来看,当时抗战货币筹码缺乏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第五分区支行流通券1元券背印有“每百元作公粮二百市斤”,说明此券既作货币又作公粮券。苏中分行各支行的流通券,它们的发行与使用为发展根据地经济,活跃市场、稳定物价以及支援前方军需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到1945年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曙光,苏中根据地与全国一样,收复了大量的城镇,解放区日益扩大,所解决的城镇急需大量的抗币投入到市场,根据以上情况江淮银行第四支行发出通告“本行为调剂根据地金融,充实货币斗争力量,特呈准上级发行本票。在东台、如皋境内流通,特此通告”。江淮银行第四支行南通办事处发行了面额为新抗币伍元、五十元、壹佰元本票3种。

三、江淮银行及江淮银行纸币历史意义

从1944年起,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伪进行了全面战略反攻,华中根据地逐渐连成一片,客观上需要全华中根据地有统一的货币,在经过一段时间筹划后,于1945年8月1日在盱眙县张公铺成立了华中银行,在首批发行的华中币中有将印好未发行的江淮银行50元券改印上“华中银行”行名后,作为华中银行币发行。根据华中财经委员指定,决定以江淮印钞厂为基础,将各根据地印钞厂合并成立华中印钞厂。1945年8月江淮银行胜利完成了它的光荣使命。江淮银行逐步由华中银行币收兑,由于收兑必须彻底,江淮币存留不多,尤其是印有主席头像的江淮币弥足珍贵。

江淮银行发行江淮币的历史作用,在政治上,对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建立巩固根据地,开展对敌货斗争,维护人民利益及稳定金融市场,以及敌后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经济上,江淮币对于根据地调剂供需、繁荣市场、平抑物价、稳定金融、限制伪币侵害边区经济,活跃城乡金融商业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尤其是江淮银行5元、20元印有毛泽东头像的纸币鼓舞了根据地人民群众、敢于斗争、增强了胜利的信心,另外,多种面额的江淮币印有根据地农村风光、工农形象、劳动场景的图案鼓舞了人民群众当社会的主人,走上和平、富裕生活的决心。

新四军用枪杆子创建起来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对全国抗战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江淮银行票成功的发行与流通,在与日伪货币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确立了抗币的本位制度,维护了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支持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为人民战争取得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江淮银行的发行及流通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完成的,在这种环境下,以自己发行货币兑换群众手中的敌伪货币,限制并禁止了敌伪货币的流通,有效地抵制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及掠夺,保证了解放区群众利益,保证革命战争的供给,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为人民战争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这些货币,又是我国劳动人民自己掌握货币制造、发行权的伟大实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至今天,在中国货币史上仍然繁花似锦绽放着它独有的光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中国梦”,正像习总书记在建党95周年上的讲话,根据地货币及根据地货币精神,仍然激励着我们开启民族复兴伟大的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参考文献]

- [1]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M].文物出版社,1987:402.
- [2]中国纸币大辞典——革命根据地编[M].中华书局,2001:488.
- [3]中国人民货币图录[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97.
- [4]江淮币的印制、发行和回收[J].钱币博览,2016,(1).

新发现的金代“大定通宝”背“申酉” 折十试铸币初探

周泰宇

金世宗大定年间(公元1161—1189年)所铸大定通宝小平钱的背文分别有纪“申”、“酉”等字,又有大定通宝折二光背进呈样钱,折五型光背以及折十光背仅见试铸样钱。而笔者近日收藏的这枚罕见的折十型大定通宝试铸币,其背文“申酉”二字,却同时出现在同一钱体上(图1)。这一新的发现,是为有效地化解钱币界对其小平背文“申”、“酉”为纪年之误,应为五行“金旺”国祚祥瑞寄语或吉语钱,因而具有极大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笔者就此试作一些探讨。



图1

一、大定通宝背“申酉”大钱的辨伪

要确立该大定通宝背“申酉”大钱的地位和意义,必须首先要辨别其真伪。该背“申酉”大钱,直径40.84mm,厚3.06mm,重25.50克。按照笔者收藏古钱币十多年积累的辨伪“锈、透、皱、构”四字法悉心观察,该背“申酉”大钱属真品无疑。所谓“锈”,纵观该钱表面有分布得体的颗粒状锈片,虽薄似蝉翼,却不易剔除;放大镜下的钱体深处呈胎发硬红绿锈蚀;钱的字廓表面包浆为黑色氧化层包裹的青铜白色,这是其钱含锡铅成分较多而引起铜色的变化所致,俗称“锡沁色”;同时还伴有坚硬的自然土锈,为开门见山的生坑钱。这种经过几百年风雨侵蚀产生的自然锈,今人是造不出来的。所谓“透”,该钱铜质熟透,犹如熟透的柿子,呈臃肿状态,完全达到了金代青铜钱氧化熟旧的断代标准,可参见金章宗的泰和重宝篆书大钱(图2)。伪品虽然也造出看似逼真的锈色,但其铜质用手指捻一会则显出贼亮。所谓“皱”,即自然磨损程度。该钱出世后,在流通中经过人们多年的把玩和摩擦,其外缘廓

已经光洁、圆润,有的字廓转角处锋芒不再显露,也就是俗称的“火气已经消尽”,给人一种似老人肌肤松弛而起的纹路,或衣服绸布因受褶皱的皱褶、皱褶痕迹之感。所谓“构”,即该钱的形制架构和文字结构。金代崇尚北宋徽宗御书的崇宁、大观钱,除金代各个皇帝仰慕汉文化外,主要是自金太宗完颜晟天会五年(公元1127年)正月,把宋徽宗赵佶、钦宗赵恒等赵姓皇族及宦官、工匠等三千余人,掳押到金国黑龙江阿城县后,利用宋徽宗的瘦金书体和工匠等技术人员,仿照宋徽宗的崇宁、大观钱式(图3),开始铸造自己的钱币。如金熙宗的“天眷通宝”、废帝(海陵王)的“正隆元宝”。尤其是金世宗完颜雍的“大定通宝”大、小铜钱,有小平(图4)、折二(图5)、折三、折五以及折十试铸币,其形制和钱文均仿大观通宝瘦金体。所以,该大定通宝背“申酉”大钱,脱离不了大观钱的影子。其形制特征是,细缘,背缘廓略宽于钱面廓,内穿廓面窄背宽且均呈长方形;钱廓面深背浅,字廓深峻,铁画银钩,精美异常,



图2



图3



图4



图5

与今钱谱所载的一枚大定通宝光背折十试铸样钱的书风和形制完全吻合。而其背文“申酉”二字则与大定通宝小平钱的背文深浅及书法字形结构,用笔手法一致,故该大定通宝背“申酉”折十钱属真品无疑。该钱仅见《历代古钱图说》,珍贵,绝罕。

二、大定通宝背文“申酉”的含义

金世宗所铸大定通宝小平钱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其钱背或穿上或穿下分别铸有一个单字“申”、“酉”,旧说钱币上以干支纪年,“早在春秋末期始铸于空首布上,金代的方孔圆钱上又重现”,即“申、酉”为纪年。但近人望文生义,认为其背文申、酉,“当以建国金源,故取金旺之义”,但缺乏相应的证据。笔者收藏的这枚大定通宝背“申酉”折十大钱,则给后一种说法提供了可供考证的实物依据。第一,该大定通宝背文“申酉”同时出现在钱的穿上、穿下,说明其“申酉”并非纪年,因为申、酉分别为十二支的第9位、第10位。众所周知,我国古代创造的历法纪年方法,它是以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组合,若是干支纪年,不可能将两个年号同时铸在一枚钱币上,所以,该钱背文“申酉”并非纪年。第二、金世宗在位二十九年,只有“大定”一个年号。其间与“申酉”有关的有:甲申、乙酉;丙申、丁酉;戊申、己酉,若是申酉某年的简称,而大定钱上除申、酉外,其它地支未见,且金世宗从未曾改元。故其大定钱背上无论是小平单字“申”、“酉”,还是该大钱背“申酉”,判断其纪年都是不对的。第三、该大定大钱背“申酉”二字连用,应指五行说“六合”之一合。《南齐书·礼志上》:“五行说十二辰为六合”,即五行十二地支所分的阴阳结合:子、

寅、辰、午、申、戌为阳,其“申”为阳;丑、卯、巳、未、酉、亥为阴,其“酉”为阴。阴阳相配,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因此,该钱文的“申酉”即指“六合”之一,汉代指好日子。又,十二地支在五行中,寅卯属木,巳午属火,申酉属金,子亥属水,辰戌丑未属土。所以,该大定通宝背“申酉”之义即指五行中的“金”,其纪文有金旺,有利国祚祥瑞的含义。

三、金世宗五行“申酉”应感轨迹的探讨

前述已从“五行说”的原理上论证了该折十型大定通宝背文“申酉”,并非指纪年,而是与“五行发用”有密切的关系,金世宗在位期间的史实及其应感轨迹也进一步得到了印证。一是从完颜部建国号“大金”的内涵,看大定通宝背文“申酉”。北方女真族完颜部建国号时,据《金史·太祖本纪》:“上曰: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尚白”。于是取号大金,改元收国。公元1115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称帝取国号时,对金和宾铁(也作饕铁,指纯精之铁)两种自然物质的比较,是五行中物质相克相生朴素哲学思想的反映。显然,金世宗铸大定通宝背文“申酉”之义,即以五行“申酉”代指“大金”。金在五行天干中有:“金空则响,水赖金生,金多水浊,衰金不生水,水盛厌金生;旺金喜火,弱火不克金”。所以,该大定通宝钱背以“申酉”纪文,有以示金旺,国祚祥瑞的深刻涵义。二是从金世宗南向攻略的重新定位,看大定通宝背文“申酉”。五行的方位有:甲乙寅卯东方木,丙丁巳午南方火,戊己中央土,辰戌丑未四库土,庚辛申酉西方金,壬癸亥子北方水。从时下金与南宋对峙的方位看,南宋的都城在长江以南的杭州,属“南方火”;1161年,金废帝完颜亮把首都从燕京(今北京)迁都开封(今河南省),开封在杭州以西,属“西方金”,按五行相生相克的原则,即为“火”克“金”。完颜亮迁都开封的同一年,组织大军大举攻宋。完颜雍(金世宗)乘机在辽阳自立,完颜亮在采石(安徽当涂采石镇)为宋军惨败后,逃至瓜州(江苏江都瓜州镇)被部将杀死,上演了一场五行“火克金”的重大历史事件。金世宗即位后,对完颜亮的南向攻略重新定位,首先向南宋声明,南侵是完颜亮的错误,希望重新按“绍兴和约”行事;军事行动则保持克制,不予还击。等到平定了契丹人起义后,便对南宋采取强硬态度,击退了宋孝宗的“隆兴北伐”,重订“隆兴和议”,使金宋两国保持了40多年的和平状态。三是从金世宗对内采取的经济政策,看大定通宝背文“申酉”。按五行说的原理,五行的五种元素,在天上形成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在地上就是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在人就是仁、义、礼、智、信五种德性,在天、地、人间形成串联。从金世宗取名“大定”年号且在位二十九年不变可知,所谓大定,即全部安定。《书·武成》:“一戎衣,天下大定”;《管子·内

浅谈先秦货币转折演变标志的 魏国桥足布

周泰宇

战国时期,布币发生了一次形制由空首布变为平首、钱体由大变小、重量由重变轻的重大变革。而伴随着魏文侯率先变法之货币制度改革诞生的桥足布(又称斡布),既铸地名,又注币值,且币制规范,“在先秦布币中独树一帜,成为春秋至战国货币转折演变的一个标志”^[1],“是一次大的飞跃”^[2]。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魏国桥足布产生的历史背景

魏国桥足布,是战国早期在平肩弧足空首布、斜肩弧足空首布的基础上诞生的。众所周知,空首布是由农具铲演变而来的,《诗经·周颂·臣工》:“命为众人,庠乃钱鎛”。“庠”者,储备也;“钱”、“鎛”,即西周时状如铲形的两种重要工具。“钱”的刃部弧度较深,“鎛”的刃部较平,主要用于三晋、两周地区先民们的农殖生产中。随着农业的逐渐发达,作为青铜贵重金属而又极具使用价值的钱、鎛,便开始充当流通的职能,并从商品的队伍中分离出来,成为一般等价物,最后发展成为货币即演化成为空首布(图1)。

空首布主要有平肩、斜肩弧足以及耸肩尖足三种形态。平肩弧足空首布的主要特征是:肩平、长釜(斧头上装柄的孔),釜内留有范塞;正、背面均有三道平行竖线,或中间一道竖纹,两侧各一道斜纹;足部内凹呈弧形。斜肩弧足空首布与平肩空首布大致相仿,不同的是肩斜、币的正、背面两侧只有两条斜线。平肩、斜

肩弧足空首布保留了原始布的某些特点,是原始布状态的一种反映。一是体型大份量重。据戴志强等《古钱文字》中介绍:见有钱文的原始空首布,一般通长12~15厘米,足宽7厘米,重约110克。减重后的空首布仍显体大厚重,平肩弧足空首布可分为特大型、大型、中型、小型四等。特大型一般通长14~15厘米,重50~80克;大型者一般通长9~10厘米,重30克左右;中型者通长8~9厘米,重约18~24克;小型者,一般通长6.3~8.1厘米,重15克。斜肩弧足空首布可分为大、小两等,大型者一般7.8~8.8厘米,重22~32克;小型者一般通长7.2厘米,重16克左右。二是布币钱文杂乱。原始布大多无文,空首布多数铸有文字,以一字者居多,有记数、记干支、记方位、记名物、记地名等等,据介



图1 武字空首布

业》:“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这正是对金世宗五行申酉钱“金有肃杀、收敛之性”的最好注脚。史载,具有较高汉文化修养的金世宗,崇尚儒学,潜心于历代王朝的统治与儒学的仁政王道。他在位二十九年,“南北讲好”、“与民休息”,“上下相安”,金国财政充足,仓廩有余,政治局面稳定,连他的敌国,南宋的朱熹都称他是“小尧舜”、“汉文帝”。

金世宗正处于金王朝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该折十型大定通宝背“申酉”,将五行学说的内涵娴熟地运用其钱币上,是金代加速其封建汉化的具体反映。大定钱铸工精湛微用银料,字体轮廓工整,肉好明

净,钱家赞之“唐宋以来罕有其匹”(翁树培《古钱汇考》语)。大定钱文书法仿宋徽宗大观通宝瘦金体,影响了数代钱风,如元代的“至元通宝”、“至大通宝”、“至正通宝”;元末的天启、天定、大义以及明初的大中、洪武、永乐等钱也以大定为楷模,永乐小平钱甚至连背面轮廓都与大定钱相眸。▲

[参考文献]

- [1]李如森.中国古代铸币[M].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271.
- [2](清)张端木.钱录[M].
- [3]柏杨.中国人史纲[M].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
- [4]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下册)[M].中华书局,1984.
- [5](清)倪模.古今钱略[M].

绍计有 300 多种,其用意尚不明朗。三是以大小记数并称重,既笨重又繁琐,给商品交易带来了极大的困惑。

春秋战国之际,我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由奴隶制逐渐向封建制转变的巨大变革。即由新兴的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使农业、手工业、商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相伴而来的商业城市纷纷兴起,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大。周代自公元前 770 年平王东迁后,局处河南西部一隅的周王畿洛邑,更是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繁荣城市,这样必然会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货币的流通。但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各国经济自成体系,便开始自行铸造货币。据资料不完全统计,其铸造地点多达 100 多处^[3]。但在周王朝的京畿地区,其流通货币还没有脱离农具钱、鎛原形的青铜空首布“铲”,形体大,份量重,基本上还是以实物形态,与珠玉、货贝、青铜块等一起,作为交换媒介使用,显然不适应以商业城市为标志的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

进入战国时期,号称“战国七雄”之一的魏文侯,最早任用李悝变法,制定法律,调整赋税,使社会得到长时间的安定,开始了世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又作《尽地力之教》,劝农耕作,以增加粮食储备,富国强兵。通过文侯、武侯两代的改革,使魏国成为春秋战国之交的强国,进而称霸中原。伴随着魏国变法的货币制度改革,从遗存实物桥足布的特征看,其货币改革主要表现在:形制上,在平肩弧足空首布、斜肩弧足空首布的基础上,改为平肩、圆肩,由空首布的弧足改为方足与弧裆构成的桥洞形状,即所谓桥足布;币制上,改空首布的体大笨重为形体小重量轻便,使桥足布从实物形态中脱离出来,率先将币值分为二铢、一铢、半铢三等,币制规范,并注于其钱体上。钱文上,摒弃空首布五花八门的文字,统一为“地名+币值”的格式,让人一目了然,成为春秋至战国货币转折演变的一个标志,是中国古代货币变革的一次大的飞跃。

二、魏国桥足布的种类及凡例

据资料介绍,目前已发现的魏国桥足布地名有近 20 种,其流通时间较长的标志性地名主要有三种,即安邑布(安邑二铢、安邑一铢、安邑半铢)、少梁布(梁二铢、梁一铢、梁半铢)、大梁布(梁夸铢五十当孚、梁夸铢百当孚、梁正币百当孚、梁半币二百当孚)。其中,安邑、大梁布发行量较大,少梁布比较少。此外还见有十几种铢布,遗存数量很少。兹将笔者收藏的几种魏国桥足布特征解读如下,以便研究。

1. 少梁布“梁一铢”(图 2)。通长 55.27mm,足宽 34.93mm,面有廓厚 1.67mm,重 17.35 克。青铜质,钱体呈红色,含铜量高,不同于其它桥足布;铸工精良,布文高挺,廓四周为峻边,有明显规则的修整锉磨痕迹,不同于常品不修边;布面呈微凹形,背部不洁,为经过

多次印范后泥炭溶液等防粘连泥状点,应为战国先进的泥陶范模压法之成钱,即印范母钱,十分珍贵。



图 2 梁一铢布

该钱文“梁一铢”右读倒书,“梁”字为省“三点水”,即上部为“刃”,下部为“木”,其形见樊中岳《金文速查手册》^[4]“鼎”器铭文,与大梁布“梁”字的写法不同。少梁,古邑,在今陕西韩城县南。其本为西周时的梁国,春秋时为秦国所灭,故称少梁,后为晋所并,战国时少梁属魏。《左传》文十年:“晋人伐秦,取少梁”,即此。魏国率先变法后,国势日强,积极向西扩张。魏文侯二十七年(公元前 419 年)在少梁筑城,建造进攻秦国的据点,到魏文侯三十八年(公元前 408 年),魏完全占据河西地区后,将秦国压制在洛水以西长达八十年,今见“少梁”布稍多。又,《史记·魏世家》:惠王十七年(公元前 345 年),魏与秦战元里,“取我少梁”,故,少梁桥足布当铸于惠王十七年之前。

2. “言易一铢”布(图 3)。通长 50.47mm,厚 1.28mm,足宽 32.29mm,重 13.71 克;平肩,无外廓,背平素。言易,钱文倒书,旧释“晋易”,实误!北京嘉德 2006 年春拍会拍出一枚释“言易”,言易是“圉阳”的省文,地望在今陕西神木县一带,以“圉水”而得名。《汉书·地理志》(下)中说,圉水出自上郡白土县(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之鄂尔多斯高原,东入黄河;《水经注》三《河水》云,圉水又东经鸿门县及圉、阴县北。圉阳,《嘉庆统一志》二三九《榆林府》一据《通志》说,圉水即秃尾



图 3 言易一铢布

河,古人有山北为阴,水在北为阳的规则,固在固水东北方向,故称“固阳”。

秃尾河与窟野河并称的西河流域,是古白狄族的居住地。《史记·匈奴传》:春秋“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固、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狄的一支戎狄原在陕西延安、山西介休境地,与晋为邻。魏文侯三十八年(公元前408年),魏国完全占据河西地区后,乘机向北夺取了戎狄少数民族的大片土地,并在此设置上郡(今陕西榆林鱼河堡),治辖固阳,是魏在河西的军事重镇之一。经过近百年之苦心经营,“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使之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商业贸易也随之繁荣。因而,固阳布有二铢、一铢、半铢三等,是时下该地封建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

3.“陕一铢”布(图4)。通长58.89mm,厚1.55mm,足宽39.38mm,重19.90克;圆肩,面有廓背平素,布首柄还留有空首布特征的范塞(或称内范、范泥)。钱文倒书,陕,旧释“虞”,今张颌先生《魏布陕布考释》^[5]释为“陕”的异体字,即陕县,地望在今河南三门峡市西,战国时秦与魏国在此多次征战。魏文侯三十八年(公元前408年),“陕”为魏占领后,成为魏控制西方与中原交通的黄金通道。魏得到这一战略回旋之地,不仅解决了秦国对魏国的威胁,而且国内人多地少的困难也得以缓解,为魏国提供了兵源和粮食。



图4 陕一铢布

4.“阴晋铢”布(图5)。通长53.66mm,厚1.20mm,足宽37.46mm,重14.29克;平肩,面有外廓,无纪值数目,其重量相当于“一铢”。阴晋,钱文正书,以其地处华山北面而得名。春秋时的秦地,今陕西华阴县东,战国时属魏。阴晋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公元前389年,魏军名将吴起,以5万余人在阴晋痛歼秦国50万大军,即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阴晋之战”^[6]。魏军完全占领河西地区后,魏文侯在洛水东岸修筑一条长城,北端到达雕阴城(今陕西甘泉南),南端则是越过渭水与阴晋相连,从根本上切断了秦国与中原的交通线。魏国则利用其地理上的垄断地位,从中攫取暴利,使秦国受到了很大的削弱,魏国却越来越富。《史记·秦本纪》云:

惠文王六年(公元前332年),“魏纳阴晋,阴晋更名‘宁秦’”,阴晋归秦,从此后“阴晋”之名消失。由此可见,阴晋布当铸于公元前332年之前。



图5 阴晋铢布

5.“垂二铢”布(图6)。通长59.48mm,厚1.30mm,足宽38.77mm,重15.34克;圆肩,面有廓,背平素。钱文倒书,“垂”字上部从“宀”,今有钱著中说其下部从“毛”,作“宅”,其“毛”字与之写法相差甚远,甲骨文、金文工具书中的“毛”字中间两横书是向上折,而此书笔是向下“垂”,且古“宅”字在其布文上没有意义,笔者以为华光普《中国古钱大集》^[7]释“垂”是对的。其字形结构可见金文^[8]“簋”器铭文“垂”字,二者上部大致相同,金文“垂”下部书有一“土”字,标准的小篆“垂”则与此字形完全吻合,只是其外围无“宀”头,而甲骨文^[9]中分为有“宀”和无“宀”两种。显然,该布文为象形字屋檐下之“垂”。



图6 垂二铢布

垂,古地名。《春秋·隐》八年:“宋公、卫公遇于垂”。《注》:“垂,卫地,济阴句阳县东北有垂亭”,以其古垂亭而得名,在今山东定陶县附近。又,唐司马贞撰《史记·索引》曰:“垂,地名。有庙曰都,并魏邑”。其地在今山东曹县北,也即曹县至定陶之间。定陶,为春秋战国时著名的商业城市,春秋末政治家范蠡居此贸易,一掷千金,以经商致富,号陶朱公。魏之垂邑紧邻商业城市定陶,可见此“垂二铢”布,是出于与宋、齐等国经济贸易需要的产物。垂布只有“垂二铢”一种,为早期

铸品,但随着很快改为一釐、半釐两等制,“二釐”布为“一釐”布所废弃,并再未铸有“垂”布,原因是魏国主要经营河西地区,此垂布只是象征性而已。

6.“悔一釐”布(图7)。通长54.90mm,厚1.25mm,足宽37.03mm,重13.54克;平肩,面有边廓,布首留有空首布特征的范塞。钱文正书,钱谱一般释“京”,还有释“垂”、“郟”,非也,有释“悔”(姆)者,是正确的。悔即姆,该布文“悔”之“每”字形结构,与甲骨文“每”字相似^[10],为省“土”之“悔”。每,《说文·中部》:“每,艸(艸的异体字)盛上出也,从中,母声”;母,《说文·女部》:“母,牧也。从女,象褃子形。一曰:象乳子也”,悔通姆,按照甲骨文字的形体的不可逆性,悔字可以假借作“姆”,但“姆”字不能反过来当作通假的“悔”字用,即不能以“母”的字形来判断“每”字结构。



图7 悔一釐布

该布文“姆”为古地名即姆野,也作牧野,在今河南省淇县西南。牧,《尔雅·释地》:“邑外谓之郊,野外谓之牧”,相传为周武王与殷纣王交战的地方,即郊邑朝歌,殷之都城,周武王灭殷,封康叔于此,周为卫国。公元前659年(春秋时期),北方狄部落并吞卫国(河南淇县),卫迁都楚丘(河南滑县),后又迁都帝丘(河南濮阳),其地属晋。战国魏文侯四十年(公元前406年)灭狄(中山国),“姆野”属魏国。因此,该“悔一釐”布为魏币。

7.“梠釐”布(图8)。通长53.06mm,厚1.50mm,足宽35.27mm,重14.23克;平肩,面有廓。无纪值数,其重量相当于“一釐”布。钱文倒书,“梠”,旧释“𡗗”、“𡗘”,笔者综合何琳仪(《古钱丛考》^[11])和王本兴(《甲骨文字典》^[12])的字形等工具书,得知为“𡗗”通“梠”,梠通“核”,读作“核”,二者是个会意字,即郟核。《诗·小雅·寄之初筵》:“郟核维旅”,《注》:“梠与核义同”,郟核(梠),即旅,陈列之义。《说文》曰:“核,陈留乡”,在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南,战国属魏。

陈留,古地名。《寰宇通志》八三《开封府》上《陈留县》:“古有莘城,春秋为留地,属郑,后为陈所并,故称陈留”。春秋时,晋文公和齐、宋、秦等国联军,战败楚

国的“城濮之役”便在陈留附近。战国魏文侯强大时,西取秦的河西,北败中山,南击败楚国,夺得大梁(河南开封)等地,故该“梠釐布”为魏国所铸。



图8 梠釐布

三、魏国桥足布转折演变的几个问题初探

(一)桥足布铸行的时间上限与下限

魏国桥足布铸行的起止时间,虽然史籍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战国商业城市兴起的大背景以及发生在魏国桥足布上地名的史实,可知桥足布铸行的大致时间。

货币是商业城市兴起和繁荣的产物。周王朝时期的封国之地,实际上跟奴隶制的部落没有什么区别。一个简陋的土屋土墙的小院子,就是封国君主的皇宫。不同的是,封国君主除每年需对周王朝进贡外,对其封国内的土地和平民,具有绝对的权力。但随着春秋时期周王朝中央政府东迁后,其原有的威风 and 尊严永不复返,大国不断吞并或臣服小国的争霸斗争四起,各封国便凭借其本身的力量壮大自己,以求自保。他们首先要做的便是将其“皇宫”改造成城廓,以抵御外来侵吞。古代所谓的城,即在其都邑四周用作防御的墙垣,一般有两重:里面的称城,外面的称廓。《管子·渡地》:“内之为城,城外为廓”,后来城廓便逐渐发展成人们商贸交易的中心。

魏国桥足布中有一种遗存数量较多的大型“安邑二釐”布,应是战国早期魏国最早在其王城“安邑”筑城的产物。《史记·魏世家》:武侯“二年,城安邑、王垣”,安邑为魏的世袭领地,是魏文侯、武侯两代改革富强之地,即早期的都城,在今山西夏县西北。这就告诉我们,桥足布铸行的上限,应在魏武侯二年前后(公元前394年)。其下限,我们则从“阴晋”桥足布中可知,公元前349年,庞涓马陵道大败战死后,魏惠王迁都大梁(河南开封),不断割地求和,到公元前332年,“阴晋”归于秦国,秦改阴晋为“宁秦”,阴晋之名从此消失,阴晋布自然停铸,即为桥足布的下限。从而得知桥足布的铸行只有二十多年,时间较短。

(二)桥足布的形制及文字特点

由于桥足布是由空首布向平首布转化的早期制作,其器形和钱文布局尚无统一的规范和陈式,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一是器形制作多样。品种有的平肩,有的是圆肩;钱体宽窄比例有的多有的少;首柄长度有的长有的短;裆的弧度有的深有的浅;足的宽狭有的大的小。如这枚平首“梠”布(相当于一铢布),首柄与布身的比例不够协调,布身较宽,两足的弧度大而两足窄狭,分别只有2和6mm,近似空首布“武”字的两足。二是钱体修饰多样。有的正面铸有外廓,有的则没有外廓,如“言易”桥足布面无外廓;正面中间也有有直线和无直线的区别。三是钱币文字多样,钱文有的正书,有的倒书,倒书多于正书;有的是甲骨文,有的是金文,有的省文,有的是通假字,也有左读右读之分。四是钱文内容多样。正面钱文一般是记地名和面值“二铢、一铢、半铢”,但也有个别只铸地名,不铸面值的,如“梠”、“阴晋”布;桥足布多为素背,但也有个别铸有背文,如“安邑”背铸“安”字,“梁夸”背铸“夸”字。

魏国桥足布形制和文字多样性的特点,从钱币收藏的角度看,它使沉寂、单一形式的空首布变得更加活泼起来,给人以耳目一新:布的周边加铸廓,增强了钱币的装饰性;钱文倒书,方便了人们握柄观赏;布文上一律铸地名,提高了商业城市的知名度;布文上打出“铢”字旗号,大小等次币制规范,减少了“称量货币”称重、验色、找零等繁琐,交易时一目了然。

(三)桥足布的“铢”字与币制

魏国桥足布的钱文上大都由地名和一个“铢”字组成。铢字最早虽然在空首布上也偶有出现,但桥足布将“铢”字固定在钱文中,已经成为一种常制,其意义却十分重大。对于桥足布上的“铢”字的涵义,一说是重量名,一说为货币单位,笔者则赞同后一种说法。铢同“斤”,其本字为斤,为斫木的工具。《庄子·在宥》:“于是乎斲锯制焉”。斤,原为斧形工具。斧是古代的一种兵器,《汉书·武帝纪》:“杖斧分部逐捕”,《周礼·考工记》中的“六齐”之一“斧斤”即为兵器。斤,则是古代劳动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徐灏《笺》:“斧斤同物,斤小于斧”,也许是“斤”在西周时期青铜块(饼状或条块)作为一般等价物广泛流通的基础上,曾充当媒介交换的一般等价物,“斤”字才逐步演化为重量单位而后载入空首布文中的。但从空首布过渡到平首布后,空首布的形状及重量已有了较大的改变,故桥足布上的“铢”字不再是重量标度^[13],而是被借移为币的专用名称,符合古代金属铸币的演化、发展规律。

至于魏国桥足布以“铢”为货币单位的币制,其布文上的标度为二铢、一铢、半铢,而二铢布极少见,有的几乎为孤品,可见其实际上实行的是分阶段的大、小两等制。即开始实行的是二铢和一铢搭配,但很快二铢

布被废弃,然后,实行一铢和半铢相配。而战国中期以后,“方足布又废弃了一铢布,最后定格在半铢的币制,一直到战国结束”(戴志强,2014),方足布是由桥足布演变而来的结论,便源于于此。魏国桥足布“两等制”的这种变化,实际上是钱币不断减重的过程,因而钱界称铢布的币制是一次大的飞跃。

(四)魏国桥足布的作用和影响

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金属货币剧变的时期。春秋战国之际,魏国在其他六国中率先变法,相伴而行的货币制度改革,在平肩弧足空首布、斜肩弧足空首布的基础上诞生的桥足布形制和币制,对周边各国的货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是桥足布由空首变为平首、弧足变为桥足形制后,已脱离了实物的形态,原来的农具钱、铸等遗迹已完全消失殆尽。受其影响,几乎在桥足布诞生的同时,韩国在平肩弧足空首布、斜肩空首布的基础上诞生了锐角布;赵国在耸肩尖足空首布的基础上诞生了尖足布,它们的铸行分别影响了周边地区货币的流通使用。到战国中期,在桥足布、锐角布基础上诞生的方足布,更是影响了各国的大部分地区,一直到战国晚期。二是桥足布由空首变为平首,即布钱首部扁平无釜。钱体由大变小、重量由重变轻的桥足布,不但节省了币材,而且便于携带和流通,成为推动钱币减重变革的大趋势。如由桥足布演变的方足布、类方足布,轻小便捷,币制单一,影响到魏、韩、赵、两周和燕地,各地也都均有铸造和流通使用。三是桥足布上既铸地名,又注币制,将“铢”字作为货币单位并成为常制,使重量逐渐失去了意义。桥足布上的“二铢、一铢、半铢”标值,即表示重量多少,不再需要在每次交易时称出重量,适应了我国北方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需要。同时,对南方楚国的货币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战国中期以后楚国铸行的长布“殊布当铢”背“十货”、连布“四布当铢”、小布“当铢”,其钱文上都是货币单位“铢”字,楚国昔日的今安徽、江苏以及河南东南部、山东西南部和浙江地区,也均有其长布、四布、小布钱出土。▲

[参考文献]

- [1]孙仲汇.新布释[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2]戴志强等.古钱文字[M].文物出版社,2014.
- [3]李如森.中国古代铸币[M].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
- [4]樊中岳.金文速查手册[M].湖北美术出版社,1994.
- [5]张颌.魏布陕布考释[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
- [6]柏杨.中国人史纲[M].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
- [7]华光普.中国古钱大集(甲)[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 [8]同[4].
- [9]王本兴.甲骨文字典[M].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10.
- [10]同[9].
- [11]何琳仪.古钱丛考[M].台湾文史出版社,1996.
- [12]同[9].
- [13]同[1].

清代汉口“晋和钱号”制钱票和铜元票

——汉口老字号“晋和铁号”与“晋和钱号”

张或定 张峭峰 张劲峰

清末民初,汉口有一家著名老字号“晋和铁号”,至今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以经营铜、铅、铁、锡、钢等大五金为主。资金雄厚,经营额巨大,1913-1922年,几乎垄断了武汉整个铜材市场,可谓独霸一方。

然而,“晋和铁号”,还有一家分号“晋和钱号”,却鲜有人知。“晋和钱号”设立于光绪年间,是“晋和铁号”的重要资金运作机构,对“晋和铁号”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和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晋和钱号”所在地及其所属建筑,已经找到,保存仍然基本完好。目前所知,它是武汉地区仅存的一家清代钱庄古建筑,其历史价值和历史内涵,尤其值得关注及保护。

汉口钱业,历史悠久。明季即有以钱为业者。清初就有钱店制度。

乾隆、嘉庆时期,汉口地区的钱庄业已很发达。道光年间,仍然十分兴旺,银号、银炉、钱店有百余家。

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叶调元《汉口竹枝词》一书中,就有多处谈及汉口钱庄业的繁盛情况:

“近日银号兑换无多,专持放票,店本六千至一万不等,放票或至十余万,利轻害重,非乾嘉时期比矣。”

“银铺生意一毫争,钱店尤居虱子名,本小利轻偏稳当,江西老表是钱精。钱店百有余家,惟江西人最得法。”^①

上述记载说明,道光时期汉口的银号以放款为主,而且,其放款业务,比乾隆、嘉庆时期,更加兴隆。而钱庄的业务,以兑换为主,数额虽小,但经营十分稳妥。在一百余家钱店中,江西人经营最为精明。显然,道光时期,汉口钱业就以江西帮占主导地位。

同治末年,湖北地方政府在武昌设立了“公济益官银钱号”,在汉口设立了“协成官银号”和“有成官银号”,在铸造银锭

的同时,还开始发行银两票、制钱票等。从此,汉口钱庄、银号及商号等,群起仿效。光绪时期,形成了湖北民间发行钱票的一个高潮。

汉口“晋和钱号”也不例外,光绪时期,也多次发行钱票,并流行于市面。

清代汉口地区钱庄发行的钱票实物,极其罕见,也是民间钱票爱好者争相收藏的品种。为此,以下就“晋和钱号”和“晋和铁号”以及“晋和钱号”清代发行的制钱票、铜元票,作简要介绍。

一、光绪二十七年“晋和钱号”制钱票

“晋和钱号”制钱票,为竖式石印票,红、黑双色印刷(图1)。



(正面)



(背面)

图1 光绪27年汉口镇“晋和钱号”制钱票

钱票正面图案,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一幅“轮船图”;下部为多层长方形框格图,由边框、天格和地格组成。

外边框内,绘制的是“二十四孝人物故事图”。其上端有“汉镇,熊家巷”诸字,即商号所在地,汉口镇熊家巷。

熊家巷,今仍在,位于江汉区民生路中段北侧,花楼街东侧,东南至熊家中巷,西北通黄楼街,长不到400米,宽约4米。因居民以熊姓居多,故名熊家巷。

内边框中,书写的是一篇古文,可惜,暂未查到出处。

天格中,有“晋和”两个楷书大字,即商号名称。

地格,分左、中、右三部分。

右侧,为编号位置,有编号“鲤字第叁号”。其下端,印有“认票不认人”说明文字。其上端盖有一枚抬头章,数字“叁”处,该有一枚菱形押款章(半边),兼做骑缝章用。

中部,为面额位置,印有“凭票发九八钱壹千文整”。“九八”为旧时商用数字写法,系兑付率,即一千文兑付九百八十文之意。面额“壹千”处,盖有一枚圆形“晋和钱号”押款章。说明“晋和”商号为一家钱庄。

左侧,发行时间位置,有“光绪辛丑年吉月吉日”,“票”上方盖有一枚长方形“晋和”落地章,说明该票由“晋和钱号”发行。

钱票背面图案,为红色,也分文上下两部分:

上部,为一幅“帆船图”。

下部,为一幅多层长方形框格图,内外边框由花卉图案组成,其内部,分上、中、下三部分:

上端,有英文“CHIN WO BANK”(晋和钱号)及中文“晋和钱号”。

中部,书写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出师表》的部分段落。

下部,书写的是,宋代范仲淹《岳阳楼记》的部分段落。

文章末尾,有“汪日升印”四字,即印刷厂家。

“汪日升”系汉口汪日升印书局,成立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以前是湖北较早设立的石印局,既印刷石印书籍,又印石印制钱票。

二、光绪三十三年“晋和钱号”铜元票

多年前,香港钱币收藏家冯乃川先生,特意曾赠送笔者一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晋和钱号”铜元票图片,供作研究分析之用。“晋和钱号”铜元票,为竖式石印票,红、黑双色印刷(图2)。



(正面)

(背面)

图2 光绪33年汉口镇“晋和钱号”铜元票

钱票正面图案,分上下两部分。

上部,盖有一枚文字防伪章,其内容是选自清代文人山阴金《格言联璧》、宋代诗人阮阅《诗话总龟前集》以及晋代文学家左思《咏史八首》中的诗句:

“度量如海涵春育,应接如流水行云,操存如青天白日,威仪如丹凤祥麟,言论如敲金戛石,持身如玉洁冰清,襟抱如光风雾月,气概如乔岳泰山。((《格言联璧》)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诗话总龟前集》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咏史八首》……”

下部,为多层长方形框格图,由边框、天格和地格组成、其风格同“晋和钱号”制钱票。

外边框内,绘制的是“百子图”。其上端有“汉镇,熊家巷”诸字。

“百子图”,民间又叫它“百子迎福图”、“百子嬉春图”、“百子戏春图”,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喜庆图案。由于“百”含有大或者无穷的意思,因此,把祝福、恭贺的良好愿望发挥到了一种极至的状态。

内边框中,书写的是战国末期文学家宋玉《风赋》的部分段落:

“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宋玉对曰:‘此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

文章末尾,有“汪日升印书局印”诸字,说明印刷厂家的名称为“汪日升印书局”。

天格中,有“晋和”两个楷书大字,即商号名称。

右侧,为编号位置,有编号“厂字第壹号”。

中部,为面额位置,印有“凭票发当十铜元壹佰枚整”,相当于

制钱壹串文。

左侧,发行时间位置,有“光绪丁未年吉月吉日”,“票”上方该有一枚长方形“晋和”落地章,丁未年,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此票上的各种印章,如抬头章、骑缝章、押数章、押款章、落地章以及加盖位置等,均与前述“晋和钱号”制钱票同,

钱票背面图案,为红色,也分文上下两部分:

上部,盖有一枚地名章“汉镇熊家巷正街”。

下部,为一幅多层长方形框格图,内外边框及内部,全由花卉图案组成,中部有“晋和庄”三字。

此外,两种钱票之上,还保留了不少钱票流通时留下的书写文字或印章,这是清代民间钱票流通时民间的习惯做法。

三、“晋和铁号”与“晋和钱号”

汉口老字号晋和铁号,开业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系上海“唐晋”五金号老板唐晋斋与汉口原“金泰”铁号中班权景泉联合筹办的,以经营铜、铅、铁、锡、钢等大五金为主,至今已有100余年的历史。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时,其营业额已达到了五十万两。

民国二年至民国十一年(1913-1922年),是汉口铜器业发展鼎盛时期,也是晋和铁号铜材经营最好的时期,它几乎垄断了汉口整个铜材市场。当年,湖北铜币局铸造铜元所需的铜、铅原材料,几乎全部被晋和铁号所控制。可见其商业之昌盛。

据说,武汉著名老字号“曹祥泰”创业初期,因炒坊起火店铺被烧个精光时,其经理曹南山的老朋友晋和铁号经理权景泉,愿借银3000两作资本,供其复业。可见汉口晋和铁号资本之雄厚。

晋和铁号,最初开设于汉口堤口太和桥,后来,迁至堤口回龙寺。如前所述,原址堤口太和桥改为“晋和钱号”经营场所。民国十年(1921年),汉口钢铁业兴起,于是,晋和铁号又迁至河街中码头,改以经营钢铁业为主,经理为叶南山。民国十三年(1924年)叶辞职,吴子彦任经理。

抗战时期,武汉沦陷前夕,晋和铁号将店内全部货物寄存于“天祥洋行”等处。抗战胜利后,晋和铁号勉强复兴,资本有6000银元,但经营惨淡,直到解放。

“晋和钱号”与汉口著名老字号“晋和铁号”同名,实际上,“晋和钱号”是“晋和铁号”的一家钱庄分号,主要用来资金筹集和运作,以利铁号的经营与发展。当年,汉口大型商号,大都办有自己的钱庄。

“晋和钱号”最初所在地汉口熊家巷正街,与“晋和铁号”早期所在地汉口堤口太和桥相距不远。“晋和钱号”何时开业,未见记载,但是,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汉口钱庄文献中,其名字已在其中。显然,其开业时间在“晋和铁号”开业后不久或同时。

民国九年(1920年)出版的《汉口商业名录》中,仍有“晋和钱号”的名称,其地址,改在汉口堤口太和桥,即“晋和铁号”最早设立时的原址。这充分证明,两者为同一家老板经营,“晋和钱号”是“晋和铁号”的一家分号。此时的“晋和铁号”已迁至汉口堤口回龙寺。

四、“晋和铁号”与“晋和钱号”原址老建筑

如前所述,“晋和铁号”,最初开设于汉口堤口太和桥,后来,该地又改为“晋和钱号”的经营场所,今汉口江汉区沙家横巷太和桥。此“晋和钱号”地址上的老建筑,如今仍在(图3)。



图3 汉口太和桥“晋和铁号”和“晋和钱号”老建筑

此建筑,由两部分组成:前为两层砖混结构楼房,后为三层红瓦尖顶四坡屋顶洋房。中间有通道。前后有门,屋旁有一道侧门。前后均有界碑,标有“晋和通前至后墙脚地界”十个字(图4)。

“晋和铁号”和“晋和钱号”老建筑,是武汉近代商业和金融繁荣的见证,对研究近代民族工业、近代商业、近代经济、近代金融、近现代建筑及近代金属加工业,具有一定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作为目前有据可查的武汉已知唯一存在的,也是湖北金融界多年查找的清代钱庄老建筑,已成为古代汉口繁荣发达金融业的重要实物见证,值得作为武汉历史金融建筑和商业建筑,加以保护、开发和利用。▲

[参考文献]

- [1](清)叶调元.汉口竹枝词[M].道光三十年版.
- [2]武汉书业公会.汉口商业名录[M].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九年正月.



图4 “晋和通前至后墙脚地界”界碑

试论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财经建设的作用及特点

苏利德

(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是晋绥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建立的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抗战期间,大青山根据地的八路军、抗日民主政权和蒙汉各族人民群众,在极其艰苦残酷的游击战争环境中,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不仅在敌后的防共特殊区域开辟了游击根据地,而且还战胜了各种困难,使根据地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坚持斗争直至最后胜利,这一胜利与根据地狠抓财经工作是分不开的,财经工作一直是大青山抗日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为根据地军民坚持、发展和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物资保障。

一、大青山抗日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困难及财经方面应对措施

大青山地区位于绥远省中东部,面积约9.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140多万,有平绥铁路横贯东西,成为连接华北和西北的重要纽带。如果敌人占领该地区既可与察哈尔、河北敌占区连为一体,又可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形成包围夹击的态势,同时也可成为南渡黄河直接威胁陕甘宁边区的桥头堡。因此,在抗日战争中,该地区对我双方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正因如此,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就显得极为迫切和重要,也正是此原因使日寇对该地区经常进行疯狂的扫荡、封锁及掠夺,这些行径使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日军侵占绥远大部分地区后,为了解决其侵华战争和日本本土物质上的迫切需要,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对该地区经济进行着空前的掠夺,并把其北部的大青山地区划为其防共特殊区域。仅1938年从伪蒙疆输出的各种物资总值即达10839万元,而进口物资总值才有6753万元,出超部分竟达4086万元。日寇为了扩大税收,除了通过贸易统制进行掠夺外,还强迫老百姓种植鸦片,以此来摧残绥远的经济。在伪蒙疆地区,1938年强迫种植鸦片50万亩,次年激增至80万亩;绥远境内“七七”事变前的鸦片税收为256万元,到

1939年已增至423万元。

日寇为了更有效地控制该地区的经济命脉,一方面通过开办银行和开设各种公司、工厂、株式会社等大肆搜刮物资财富;另一方面则通过增设税目,提高税率,来搜刮人民的钱财。1938年,日寇仅从绥远征税就高达956万元。

1941年以后,日寇对这一地区推行极为残暴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施政跃进运动。首先频繁地对大青山根据地进行扫荡,并袭击我党政军领导机关,仅1941年5—10月,就对活动在绥西的党政机关袭击五、六次。以致10月,绥察区党委社会部长兼绥西地委书记王聚德和蒙古游击队长高凤英等12名同志在万家沟大火烧村遭敌突袭壮烈牺牲。

日寇除对根据地进行更频繁、更大规模的扫荡外,还实行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一起进攻的所谓总体战。首先采取对根据地实行封锁围困的“囚笼”政策,在大青山、蛮汉山主要沟口挖封锁沟、垒封锁墙,断绝通往根据地的交通,压缩我部队到人口稀少、贫困的山地;敌人还以公路、铁路等为界对根据地实行分区分隔政策,然后又把各个被分隔地区封锁围困起来。为了断绝群众与我军的接触,敌人还大规模烧毁村庄,强行并村,屠杀人民群众和靠近我的伪政权人员;在合并后的村庄,修筑围墙,派伪军驻守。敌人还实行供给组合制度,控制群众购物数量;取消零星市场,限制商贩活动范围;对商店货物造册登记,严禁物资运出敌占区;派兵到根据地抢粮抢物等办法来断绝我物资来源。1941年后,敌人每年在各县都要抢走几万到几十万石粮食。日寇企图通过长期封锁围困来达到消灭大青山抗日力量的目的。

日寇为了添补其侵略战争的巨大资耗,通过苛捐杂税残酷地搜刮大青山地区的人民。据1941年绥察行政公署的调查,武川县二区六合乡当年向敌人交纳各种税款高达47508.2元,人均负担洋70.69元;陶林县西富圣乡(敌占区),当年对敌人负担高达46891.4元,人均负担洋91.94元。由于不断地收取苛捐杂税,大青

山地区的人民生活赤贫如洗,靠吃灰菜、苦菜、榆树叶和麻参、沙蓬等野草籽碾成的“三什面”充饥,在敌人的残酷压榨下,城乡饿死的人不计其数。人民群众的生活既如此困苦,大青山我军物资给养自然更无保证。我军政人员经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吃了今天没有明天的,衣服也不能按季更换。部队和游击队既要行军打仗,防止敌人的扫荡和突袭,又要花费大力气解决本身的物资给养,这些问题使大青山抗日军民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根据地的局面也日趋困难。

鉴于此,党中央和晋西区党委根据大青山的局势,适实改变斗争策略,在军事、党的工作方针等方面都做了具体决定。在财经工作方面则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打破敌人封锁,筹措所需物资,坚持抗日武装斗争

频繁的扫荡和严密的封锁既然是敌人企图消灭大青山抗日力量的主要手段,那么,打破封锁就成了我抗日军民的头等任务。

首先想各种办法打破敌人对封锁线的控制。为了解决敌人封锁造成的给养困难,部队和地方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派出少量武工队员到归绥等敌占城镇设法购买,筹集物资;二是帮助群众生产、抗灾,将机关多余马匹分给群众,鼓励群众多打粮,支援抗日;三是自力更生,开荒种地;四是打击敌人的抢粮队伍,夺回抢走群众的粮食;五是在各条沟口设置税卡,按照抗日政府的规定,向运粮运物的过往商人和地主征收一定的税款或物资。对伪军走私买卖的要增收税额,对民愤大的则没收其货物。这些措施对解决给养困难起了很大作用。

为了彻底打破敌人的封锁围困,1941年7月到1942年6月,骑兵支队还积极向敌占区活动,打击敌人小股部队和土匪,发动群众,组建游击队;同时抽出力量设法解决部队的物资给养。绥西部队也派出武工队活动在敌统治较严的土默川筹集物资,搜集敌人情报。

此外,通过伪军、伪组织的关系来解决所需的军需物资。如1941年春天,驻守武川县一、二联区活佛滩的伪靖安警备队五大队的部分官兵在我党的争取下,为我军送过不少情报,购买过枪支、弹药、布匹等禁销物资,缓解了其在军事上给我军造成的威胁和经济上对我形成的封锁。

在抗日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敌人妄图通过封锁围困消灭大青山抗日力量的阴谋终于破产。

敌人封锁失败后,继而又以疯狂的扫荡来对付大青山抗日力量,他们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使根据地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灾难,敌人所到之处,无不一片废墟,为了防止抗日力量隐蔽,敌人还烧掉了山里的一片片山林。绥西的阿路板村原有上百户人家,经日寇

烧杀,只剩下了几户。在扫荡中遭敌毒打和被抓走当劳工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敌人连群众饲养的家禽、牲畜都要抢走,抢不走的则用机枪扫死。敌人在扫荡中还烧毁了根据地内几乎所有房屋,特别是党政军机关常住的村子被烧过四、五次以上,有的甚至达七八次、十几次;1942年以前,整个大青山根据地就有两千多个村庄被敌人烧毁。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大青山的抗日武装和党政人员仍顽强地与敌人战斗,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熟悉地形和山地便于游击活动等特点,不断地变化战术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为了克服当时严重的物资困难和提高工作效率及战斗力,骑兵支队领导对根据地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及部队进行了精兵简政。精兵简政后,部队数量虽然减少,但战斗力大大增强,更能适应当时游击战争的环境,政府紧缩了机构,加强了基层,提高了工作效率。

(二)开展大生产运动,克服日寇封锁造成的经济困难

为了解决日寇、国民党进攻和封锁造成的经济困难,塞北工委和军分区坚决贯彻毛泽东同志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自1944年春开始,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高克林、姚喆、张达志等同志带领部队起早摸黑开荒种地,种了很多莜麦、荞麦、胡麻以及土豆、萝卜等蔬菜,秋后获得了大丰收。部队还养猪、磨豆腐,使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减轻了群众负担。在大青山根据地活动的部队也积极响应号召,在敌人不易发现的偏僻山区,进行小规模的生产。1944年春,部队共开荒六千余亩。与此同时,党和政府也采取减收公粮、举办农业贷款等措施,积极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和生产困难。这些关心群众疾苦、维护群众利益的政策和行动,受到敌后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增强了军民团结,扩大了我党在敌占区的政治影响,为夺取大青山抗日斗争的胜利,准备了物资条件。

(三)全力筹措经费,支援抗日战争

由于大青山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因而根据地的经济十分落后,当地的农业生产一直沿着古老的粗放耕作方式,广种薄收。农田水利设施在后山地区根本就没有,完全靠天吃饭。因此,平均单产极低,遇有灾年,则颗粒无收。尽管如此,根据地的爱国士绅、老百姓纷纷慷慨解囊,捐献钱物,资助八路军抗战。他们除了应担负的合理负担外,还捐献粮食、布匹,给抗战部队赶做军鞋等。如陶林县的富户谭成宽在1939年青黄不接,粮食紧张时一次就拿出400石小麦和杂粮捐献给我军。武川县山区富户刘钰从1938年到1942年先后支援我军粮食500石,全副鞍具军马30多匹。

除此,根据地军民还用战争缴获来的物品充实自

己,这对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和生活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二、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财经工作的开展

(一)根据地财经面临的困难及工作的开展

敌人在对根据地进行不断地扫荡、蚕食的同时,还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以此来破坏我党政军民的经济活动和生存条件。其主要手段为:一是规定居民凭户口册和凭合作社的购物证,才能购买一定数量的东西,如火柴每月不得超过1包,布匹每户每年不得超过3丈;二是取消零贸市场,把零散小商都控制起来,规定其活动范围;三是各商店的货物都予以登记,一切货物的出售都要经过当局许可。与此同时,日军在游击区大肆烧杀抢掠,妄图给根据地军民制造严重的经济困难,而且,为了隔绝游击区人民群众与根据地的联系,还在游击区内实行“移民并屯”政策,强迫游击区群众把房屋拆毁,搬迁到敌占区的村镇居住。1941年7月,日军又在大青山的18道山口挖沟筑墙,封锁山地和平川之间的道路,企图阻塞山川之间的交通,以此来封锁根据地,并阻挡根据地抗日部队到游击区和敌占区的活动。

残酷的战争对根据地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破坏,而经济封锁和经济掠夺又导致物资流通的阻塞,这一切都给根据地的财经建设带来了困难,也增加了民主政权开展财经工作的难度。

从动委会时期到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经济工作始终是政权工作的重心和中心工作。在初创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时期,由于时间紧迫,又不太熟悉情况,经济工作一度紊乱,以后在工作的实践中,特别是各级抗日民主政府逐步建立以后,绥察区党委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绥察行政公署也陆续公布了财经工作的条例、办法,逐步完善了财经制度,保证了经济工作的开展。

1940年9月绥察行政公署成立后,在征集物资和经费的工作中废除了募捐方式,实行了田赋、营业、盐、煤窑、羊税等五项税收,克服了过去反复募捐,负担不合理的现象。对于公粮、公草、皮衣、军鞋等也实行合理征收的办法,根据需用数量一次摊派一次配齐,克服了以前屡征屡派的做法,使群众感到便于应征。在敌伪控制区征收公粮则实行变款调济,减轻了我游击区的负担。对于从我游击区流出的粮食、皮毛等物产,则征收出口税,这样既限制了物资输入敌区,同时也增加了抗日经济收入。此外,还制定了经费开支制度,实行经费预决算,克服了浪费现象;粮食也实行计划供应,人吃马喂均有定量,克服了乱支乱用,增加群众负担的现象。但尽管如此,财经制度仍不健全,经济工作仍不能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

1941年4月绥察行政公署正式成立后,以较大的

力量整理了财政。8月,绥察区党委总结了绥察游击区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结合当时的实际,提出了经济工作的政策和具体措施,指出:“财政经济工作是绥察地区最弱的一环。同时也是根据地的巩固最重要的一环”,决定要求:一是取消一切乱起款乱用款的现象,统筹统支,制造预决算。二是应逐渐实行各种税收制度,取消断圪堆要款子的现象。三是要发动与领导群众向敌伪的经济掠夺作斗争,破坏其仓库,抵制与打击其挖窖与抢粮,加紧与保护秋收,进行切实的藏粮工作。在重要运输路口以游击队截敌人所抢群众粮食,充补口粮,减轻人民负担。四是公粮除部队机关食用外,其较远地区粮食不易运输者,可作价作为财政收入之一部。同时分配可划分等级……应严格检查以粮票交换物品以及其他贪污浪费现象。五是普遍创办合作社做到每乡一个……在山内地区,政府部队可办小型的机关合作社及公营小商店,调剂山内日用品,便利公用物品的购买。

《绥察行政公署施政纲领》中对于经济政策和经济建设也作了相应的规定,要求实行合理负担,严格预决算制度,进行各种经济建设,鼓励和支持工业、农业、畜牧业生产,发展商业贸易,实行减租减息,调整劳资关系,建立税收制度,以增加财政收入,支持游击战争。

为了贯彻绥察区党委制定的经济政策和完善财政制度,绥察行政公署在1941年和1942年中,先后颁发了一系列保证财经工作开展的训令、条例和办法。为了解决部队所需马鞍、马镫、马嚼口等,1941年4月发出了《关于建立铁工厂皮毛厂的训令》,要求每县建立一所拥有三至五名工人的小型铁工厂;为了供应部队所需之皮革及冬季马靴、毛袜等,要求在绥西建立皮革厂、毡厂各一所,绥中建立皮革厂三所、毡厂七所。9月又作出了《关于组织各种工厂的决定》,提出建立毛织、皮革、木、铁、鞋等工厂的要求,并对原料供应、产品分配、经费开支等一系列事项作了明确的规定。为了发展农业生产,9月还公布了《关于颁发开荒条例的训令》,规定“凡公共之荒地及逃亡地户之荒地,政府可无条件地发动群众去开荒”,对于私荒开垦和开荒地的租期,征收公粮的办法和对开荒者的奖励都作了明确规定。同时还发布了田赋征收办法、征收救国公粮办法、征收粮食出口税办法、公粮征收分配单行办法以及春耕工作指示和《关于严格供给制度开展节约运动的训令》等。为了发展商业贸易,绥察行政公署发出《关于合作事业的指示信》,分析了日伪在绥察地区的经济统治和经济掠夺的严重性及开展合作事业的重要性,指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和敌人作无情的经济斗争,也是重要的一环。这种斗争情形的中心就是发展合作事业。它可以统治产品,限制敌人低价收买;它可

以平衡物价,使敌人无法抬高;它可以推行法币,巩固金融,它可以起调剂作用,粉碎敌人封锁政策。”另外还作出了《关于各专署各县区成立公营商店的决定》和《关于对敌占区贸易管理办法》等发展商贸的政策措施。从而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财经政策和具体办法,以指导经济工作的进行。

绥察行政公署在制定上述政策、措施的过程中,对财政制度和财经工作进行了严肃的整顿,调整了税收办法和项目,取消了羊税,增设了大车捐,各项税收照章办理,实行合理负担,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

经过整顿财政制度,减少了浪费,节省了开支,各自为政的本位主义大为减少。当然,绥察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在经济工作中也存在着不足,如有些经济法令、条例、办法和决定是脱离实际的,有的是照搬了其它根据地的作法,从而使经济工作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经济工作作为绥察抗日民主政府的一项中心工作,成绩是主要的,贡献是巨大的。

(二)不断发展根据地经济,努力做到自给自足,为坚持抗日战争创造条件

在生产建设方面,由于游击环境的极端困难,只能发展一些适应游击战争的小规模的生产建设。在绥南、绥中和绥西各地均创办了小铁匠、毡房、熟皮房、马装具作坊以及组织了小商贩,基本上完成了马掌、皮革、马装具、毡鞋、毡套等军用必需品的生产和自给自足。

1940年以来,由于游击战争的胜利发展,财经制度的逐步完善和群众情绪的稳定,绥察游击根据地的农业生产也有了明显好转,各地区的公粮及各种军需物资的征收数量大大增加,有力地支援了部队的游击战争,巩固了各级政权的基础。据武川、陶林、归凉三个县1941年的统计,共征收救国公粮14万石、征收田赋款(蒙疆币)300余万元、购买军马1000余匹、购买洋布1000余匹、征购皮大衣4000余件。在远离后方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一支2000余人的抗日武装部队和党政机关,能够保证供应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是绥察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对抗日战争的巨大贡献,也是绥察抗日民主政府经济工作的成就。这些钱粮物,一部分留给区政府和区游击队使用,一部分上交县政府和专署,更多的是供给了八路军大青山骑兵支队骑一团。

在日寇大肆提倡种植鸦片,搜刮绥察人民的财富和进行经济掠夺上,抗日民主政府则通过收缴烟土,最大限度地减少日伪对鸦片的掠夺,来削弱日本侵略者“以战养战”的目的和减轻对绥察人民的毒害。绥察民主政府规定了征收烟苗罚款的具体办法,做到既要打击日伪掠夺烟土,又不能增加农民的经济负担。在与日伪的斗争中,绥察地区的广大农民经过宣传说明征

收烟苗罚款的道理后,积极向抗日政府交纳烟土和罚款;他们背着日伪政权,冒着生命危险把收集来的烟土送给抗日政权,积极配合民主政府和八路军同日寇进行斗争。绥察抗日民主政府对于所征收的烟土和罚款则从抗日大局出发,全部用于抗日事业,使之成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这个总目标服务。

财经工作的另一个方面则是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同时保护生产,发展生产。1942年11月,中央晋绥分局在发给塞北工委的指示信中说:“……减轻人民负担是很重要的。……认真地精兵简政,实行正确的财政政策,在绥远同样是重要的。”“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强调征收公粮一定要实事求是,万万不可收过头粮。”按照这一精神,塞北工委认真实行精兵简政,把党政军机关加以合并,使机关人员减少了34%。军分区精减整编使战斗人员、生产人员增加了84名。把骑兵三团的两个连改编为步兵团,使主力军更加地方化和群众化。实行精兵简政,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根据地的财政困难。

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我党把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直接做到敌营的内部中去,这对打破敌人对抗日军民的经济封锁起到了积极作用。如驻扎绥西察素齐的伪蒙军防共二师师长韩伍,经过教育争取,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各方面给根据地的抗日斗争以很多方便,仅在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向根据地军队提供的军用物资就有枪枝弹药、马鞍马掌、布疋医药、粮食服装等。

组织合作社,解决抗日根据地军民生活、生产物资以至部分军需供应是根据地建设中一项重要的经济工作。1939—1943年期间,由于敌人的封锁和围剿,抗日军民的生活、生产和武装斗争在物资、军需供应上都遇到极大的困难。为了战胜困难,根据地组织开办了合作社,解决存在的各种困难。合作社的开办既方便了军民生活,又利于根据地生产,增加收入,在抗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绥察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和革命两面派乡政权,在高度游击战争状态中,以灵活的形式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开展财经工作,解决党政军的供给,为坚持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条件。

(三)开展根据地的货币金融工作

1.绥察地区的信用合作事业。1941年,绥察行政公署专门颁发了《绥察行政公署关于合作事业的指示信》,提出为“正确而有效地执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首先必须着手于合作事业”。“信用合作社,是为解决贫困人民的困难而设立的,由群众集股建立。如果需款时,可向信用合作社微利借贷……。同时,信用合作社多存粮食,在春耕时,可以借给社员做籽种,它可

以限制高利贷的剥削。”绥察行政公署提议至1942年3月,“每乡成立一个合作社,每社发展三百股数[至]六百。至于成立哪一种合作社,须按人民之要求决定之。……”。规定信用合作社的股金按每股一元,每人至多不能超过十股。各种合作社必须成立检查委员会,由五至七人组成,乡政府群众团体各参加一人,社员三人或五人。

2.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货币金融。因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以游击为主,所以财经和货币金融活动只能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没有像建立革命政权的根据地那样组建银行,并形成一套完整的财经、货币金融体制和经济活动。当时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未发行自己的货币,流通的货币有银元、法币及伪钞,主要来自罚金、献金和上级民主政权的拨款等,根据地的税收也都是以银元计算。晋察行政公署根据1942年6月贺龙等致姚喆、白成铭“关于绥察地区货币使用问题的意见”电,结合大青山根据地的具体情况,作出了停止征收使用法币、吸收银洋、打击破坏蒙疆伪币等的“关于金融问题的训令”。而对与晋西北直接相邻的绥中蛮汗山地区,则规定可暂时使用我西北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

1942年12月,为稳定根据地金融货币,与敌人倾销法币进行斗争,中共晋绥分局发出了禁止法币流通的指示。接着晋西北行署又颁布《非法行使法币之稽查与惩治办法》,规定在边区内行使和携带法币的具体规定。

为了维护根据地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及广大军民的利益,对法币采取的是先保护、后禁止政策;而对伪币则采取的是既打击又利用的措施,所以法币、伪币在根据地的货币流通中时断时续地一直延用到抗战胜利;对于银元因老百姓乐用,又是硬通货,所以在根据地初创时一直是一切交易计价的根本。尽管晋西北行政公署从1941年1月就正式颁布禁止银洋行使的条令,但因大青山根据地特殊的货币流通环境,所以对银元的态度也与晋绥边区其他分区不同。在大青山根据地银元属于主币,对外贸易、财政开支都离不开,而且到敌占区购物更是好使,所以禁行银洋的条令在大青山根据地始终未能实现。但银元的流通不利于西农本位币地位的巩固,故各级抗日民主政府虽多次颁布禁止银元流通、收兑银元的条令,最终因大青山根据地的财力薄弱及各项开支离不开银元,致使流通时禁时止、禁而不止,直至全国解放。

三、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财经建设的特点及其作用

由于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处于高度游击状态,是一个游击政权,所以,他与全国相对稳固的抗日根据地有着许多不同之处,在财经建设方面更是表现出要

适应游击根据地环境独特的自身特点,具体表现为:

1.高度的游击性决定了财经建设的适应性。在大青山的财经建设中,有许多稳固根据地的财经经验与做法及上级政府对各根据地财经工作的指示、政策是行不通的,如果一味照搬、照套,就会对经济工作造成损失,会伤害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这也是在工作实践中被证明了的。所以,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财经工作只能从实际出发,制定一系列适应符合游击战争环境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仇敌忾共同抵御日本侵略者。

2.大青山游击根据地财经工作的艰苦性。大青山地区气候严寒恶劣,军事力量是敌强我弱,游击根据地又处于所谓的“蒙疆防共特殊地带”且远离后方,部队与抗日政权高度游击,流动性大,这些特点使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成为了全国最艰苦的抗日根据地之一。由于远离后方,物资给养十分困难,而在当地,群众经日伪以及土匪的掠夺抢劫,更是穷困潦倒,加上敌人的反动宣传和特务统治,更使有些群众对八路军避而远之,由此使根据地的财经工作异常地艰苦。

3.大青山游击根据地财经工作的特殊复杂性。时在大青山地区活动的各类武装众多,有国民党组织的“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和收编的土匪等。该地区由于北洋和国民党政府长期对蒙古民族实行大汉族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采取民族压迫政策,使汉蒙民族之间一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绥察以后,更是采取了宣扬“复兴蒙古”、“帮助蒙古民族独立自治”、“抑汉扬蒙”等一系列挑拨离间民族团结的做法,使历史上本已存在的民族矛盾更加复杂化。大青山八路军、抗日民主政权在制定与贯彻各项财经政策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这里的民族问题,采取了许多维护与照顾蒙古民族利益和争取蒙古民族抗日的政策与措施,如在游击区域内允许蒙民继续收地租,对蒙民不征或少征税等,用实际行动粉碎了日寇挑拨民族矛盾的阴谋,从而赢得了蒙古民族的支持。此外,八路军、抗日民主政权怎样妥善处理绥察地区日寇提倡种植、生产鸦片的“毒化”政策的特殊问题和严重的匪患问题以及在经济上处理同“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的关系问题,也使大青山根据地的财经工作更具特殊复杂性。

尽管大青山游击根据地财经工作异常地艰苦、情况特殊复杂,但八路军、抗日民主政权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正确解决这些问题的方针政策,使财经工作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改进了部队的供给状况,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由于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财经工作遵循了统筹统支的方针,坚持了一切服从战争需要,一切为了战争的原则,所以能够在抗日政权和部队高度游(下转第4页)

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公债券述析

张慧琴

(湖北省博物馆)

土地革命时期,部分革命根据地因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等需要,印发了不少公债券,兹略作介绍与探析。

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公债券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并没有发行带有“公债”字样的债券,但1931年冬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发行的“水利借券”,实际上是一种公债券,也是目前所见时间最早的革命根据地政府印发的公债券。1931年夏,洪湖革命根据地发生严重水灾,加上国民党军队的破坏,根据地内一片汪洋。1931年冬,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为了整治堤坝,决定发行水利借券30万元。此次借券为无息借券,以第二年的土地税作担保。借券可以出售,但不能购买货物。

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发行的“水利借券”,目前只见到1元券一种。

二、中央革命根据地公债券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行了革命战争公债券和经济建设公债券,其发行时间虽不是最早的,但数量最大。

1932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发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战争公债券”,总额定为“国币”60万元。面额分为5角、1元、5元(图1)共3种,利率为“周年一分”。发行期为1932年7月1日至30日,以半年为归还期,也就是1933年1月即可还本付息。



图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战争公债券五元

这是一期短期公债券,除50万元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行外,还有10万元分配到湘赣和湘鄂赣两根据地发行。

1932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又发行第二期革命

战争公债券。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券总额为120万元,面额、利率、还本付息期限和第一期大致相同。为了节省费用,还将回收的第一期债券又加盖“第二期”字样,继续发行。

1933年7月,中央革命根据地还决定发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建设公债券”300万元,面额分为5角、1元、2元、3元、5元共5种。年息5厘,自1934年10月分7年支付利息,自1936年10月分5年还本^[1]。

以上公债发行方法,是按地区(根据地内各县)、分对象(红军、城市商人、党团政府、普通民众)进行数量分配,通常对于富人、大中商人要派定数额,责令购买;对于普通民众,则是鼓动购买,不强迫命令。对于经济建设公债,发行的方法略有不同,就是购买时可以用“银钱”,也可以用粮食。之所以可以用粮食买债,是因为先已发行了两期革命战争公债,而经济建设公债数量巨大,有钱的群众毕竟有限;二是粮食为当时的紧缺物资,发债也是为了筹集物资,所以用实物——粮食购买也符合实际。

以上公债发行时,都公布了“公债条例”,其中均提到了“国币”二字,就是公债发行数量是以“国币”来计算的。所谓“国币”,民国初年曾以袁世凯头像银元为国币,但中央革命根据地“债券条例”所说的“国币”,不会是银元,而应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货币。虽然一般材料没有明确说明,但1933年4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训令》第十九号则说得比较清楚。这个训令,是关于“建立现金出口登记制度”的,其中规定:“凡携带大洋和毫子往白区办货在二十元以上者须向市区政府登记,一千元以上者,须向县政府登记,取得现金出口证才准出口,无出口证及非为办货用的,一律不准出口,向银行或兑换所兑换大洋的,也要有现金出口证为凭,无出口证的,显系在苏区内使用,则一律兑换国币及毫子。”^[2]显然,“国债条例”所说的“国币”不是大洋(银元),也不可能是国民党政府许可经营的其他银行的货币,而只能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内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货币。

这些债券额度使用的是“国币”计算,但并不是规定必须使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货币购买,只是实际上根据地内现金缺乏,现金特别是大洋处于紧缺和管制状态,能用大洋或现金购买的很少。至于“毫

子”,当是指中央根据地造币厂铸造的2角银币,它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同时流通,只是数量很少。

中央革命根据地在1932—1933年间分三次发行公债,而且一次比一次数量大,正是当时中央苏区进行日益激烈的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经费不断大幅增长的客观实际所使然。

三、湘赣革命根据地公债券

1932年12月,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也决定发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革命战争公债券”,正式发行期为1933年1月。发行总额为8万元,面额分为5角、1元(图2)、2元共3种,利率周年1分,1933年7月为还本付息期。1933年7月,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又发行了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券15万元,面额、利率和第一期相同,只是还本付息期限由原来的半年延长到了14个月,1934年9月为开始还本付息期。1933年11月和1934年1月,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还决定补发(增发)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券,实际上是第三期革命战争公债,总额原定20万元,后又增加20万元,年息为5厘,分6年还本付息。其发行条例的说明文字是:“湘赣省苏为着充裕革命战费,经中央政府批准,特发行第二期革命公债十五万元。最近在广大群众热烈要求之下,补发二十万元,作为经济建设,以八万元用于发展对外贸易,八万元用于用于粮食调剂,四万元帮助合作社”^[3]。这则和经济建设公债类似,但实际上因为当时战争激烈,一般经济建设基本上不可能进行,所以这些公债仍然属于筹集革命战争经费的公债。不过,这一次的发行任务并未完成。



图2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革命战争公债券一元

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革命战争公债券”,其“公债条例”亦规定额度以“国币”计算,这个“国币”并不是指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货币,而是指湘赣革命根据地的银行货币,只不过,当时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湘赣省工农银行在该债券发行时,已决定改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因而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货币称为“国币”自然是可以的。

四、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公债券

1932年12月,在湘赣省革命战争公债券发行的同时,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也发行了一期“湘鄂赣省短期公债券”,总额5万元,年息1分,面额分5角(图3)、1元两种,期限1年。该债券未标明用途,但实际上为革命战争公债券。1933年10月,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又决定发行二期革命公债券,所谓“二期”,显然是相对于上一期的“湘鄂赣省短期公债券”而言。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券总额为“国币”8万元,年息6厘,发行期限为1年。



图3 湘鄂赣省苏政府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券一元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公债券的额度也以“国币”计算,其原因在于债券发行时,湘鄂赣省工农银行也已决定改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赣省分行。不过,虽然湘鄂赣临时省委和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在1932年4月就已决定要将湘鄂赣省工农银行改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赣省分行,但因为原来发行的旧币一直没有收回,而且继续发行新币,银行基金也一直准备不足,致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赣省分行的筹建工作迟迟未能完成^[4]。虽然改建为国家银行分行的工作未完成,但并未影响到根据地政府以“国币”作为公债券确定额度的币种名称。

五、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公债券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也发行有革命战争公债券,只是名称不太一样,叫“闽浙赣省苏政府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券”。这种公债券总额为“国币”10万元,面额只见有1元一种,年息1分,推销期为1934年7—9月,1935年7月偿还。这里的“国币”,自然是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闽浙赣省分行货币。

以上债券,其发行条例大都规定以根据地各项租税为担保,即可以用来抵交租税。

另外,像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行的借谷证,则是土地革命时期发行量最大、现存数量最多的(下转第67页)

硬币自循环的三个关键环节

马俞敏 王 蓉

(中国人民银行荆门市中心支行)

金琦行长助理在2013年时提出了人民币现金的四个循环过程:一是从印制企业到人民银行发行库(重点库和分库)的循环,二是人民银行发行库与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库间的周转循环,三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与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循环,四是人民币现金进入流通后在相对时间内脱离金融系统的自循环。作为人民币组成部分的硬币,同样会经历从生产到退出流通的全过程。硬币自循环要求不依靠人民银行投放新硬币的传统办法,而要将社会上沉淀的大量硬币激活,让它们循环利用起来,在一定区域内形成顺畅循环使用的局面,因而是排除了人民币现金第一循环的其他三个循环过程。本文正是从硬币的三个循环过程出发,分层和分类地考察了荆门地区硬币流通情况,明确了其中问题所在即关键环节,以便于更好地建立硬币自循环体系。

关键环节一:银行业金融机构硬币回笼人民银行

在人民币现金第二循环中,通过现金存取款业务的办理,硬币在人民银行发行库与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库之间周转。人民银行如最上游的水库向整个市场承担着硬币的供应和补充,金融机构如河流湖泊,起着运输、存储和吸纳收集的作用。硬币自循环的畅通,首要应满足水库与河流湖泊之间的畅通,即硬币能够实现有效的投放和回笼。

(一)硬币投放畅通。人民银行向市场投放硬币,一方面受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需求影响,控制力减弱,另一方面能够采取相应的措施,应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可能对硬币需求消极的状况,如根据市场供求状况,在取款额度内搭配适当比例的硬币。本文用区域内硬币净投放积累量表示市场中硬币流通量(硬币面额小,自重较大,硬币在区域之间的流通少,相比本区域内人民银行的投放量基本可忽略不计),汇总统计荆门市2005-2015年间1元、5角和1角三种券别硬币的净投放量(表1)。荆门市全辖11年间净投放硬币共计17129万枚,金额5544.2万元。按2015年底荆门市常住人口计算,荆门市全辖人均持币至少59.14枚,金额至少19.14元。荆门市辖内各级人民银行发行库硬币供应充足,在满足银行机构的硬币取款需求上,完全做到了有求必应,满足了市场对硬币的需求。

表1 2005-2015年荆门市全辖硬币净投放汇总情况表

券别	项目			
	净投放金额 (万元)	净投放枚数 (万枚)	平均持币 金额(元)	平均持币 枚数(枚)
1元	1909.8	1909.8	6.59	6.59
5角	2640.6	5281.2	9.12	18.23
1角	993.8	9938	3.43	34.31
合计	5544.2	17129	19.14	59.14

(二)硬币回笼效果差。对于硬币回笼,虽然人民银行可以采取分派回笼指标等办法,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完成任务,但由于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硬币回笼的实践效果并不好。以荆门市为例(表2),2005-2015年全市共回笼1元硬币659万元(主要为2014年与2015年回笼),占投放量的25.65%。回笼5角硬币21万元,为2005年回笼,仅占到投放量的0.79%。1角硬币回笼量为0。三种券别的硬币回笼量合计占到投放量10.93%。可以看出,硬币回笼整体效果差,5角和1角硬币基本无回笼,1元硬币回笼情况好于5角和1角硬币。银行业金融机构硬币回笼人民银行成为硬币自循环的关键环节之一。

表2 2005-2015年荆门市全辖硬币回笼情况统计表
单位:万元

年份	1元	5角	1角
2005	59	21	0
2014	480	0	0
2015	120	0	0
合计	659	21	0

注:其他年份1元、5角和1角硬币回笼量均为0。

(三)银行回笼硬币渠道单一,公交公司是1元硬币回笼的主渠道。根调查,荆门市人民银行发行库回笼1元硬币均为荆门市农业银行交存,而市农业银行回笼的硬币均为其开户单位市公交集团公司交存,公交公司回笼成为目前荆门市人民银行回笼1元硬币的唯一渠道。荆门市公交集团公司聘请三四十名清点人员,每日对收入硬币进行清点和打包,平均每日向市农行交存1元硬币1至2万元,全年回笼银行1元硬币约500万元。由于荆门市公交现金票价为1元和2元,对5角和1角硬币的需求量小,回笼量相应也小,相比较1

元硬币有公交公司回笼,5角和1角硬币目前基本上不存在大批量回笼的渠道,成为硬币回笼最薄弱部分。

(四)主客观原因导致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拒面回笼硬币不畅。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理应是现金回笼的主要渠道,但实践中硬币通过营业网点回笼的效果并不好。据调查,银行业金融机构客户交存的硬币往往以批量形式出现,甚至还有大量污损严重的残损硬币,频率低,回笼量少,无法形成规模回笼硬币交存人民银行发行库。主观上,硬币币值低、自重大,居民对于少量的硬币往往并不在意,不愿意费神费力去交存银行。营业网点觉得硬币清点、上交麻烦,不能带来绩效,对硬币回笼持消极态度;客观上,硬币回笼范围窄,回笼主体少,主要以公交公司为主。银行业金融机构硬币清点机具缺乏,据统计,荆门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均未配置硬币清点机具。在目前完全依靠人工清点包装的情况下,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于交存的硬币必须进行人工识假清点包装等,时间长、效率低、假币难以识别,操作难度较大,客户交存硬币的积极性差,回笼量少,形成了“硬币清点机具不到位——银行业金融机构回笼硬币操作困难——硬币回笼量少——硬币清点机具不到位”的恶性循环中。

(五)人民银行硬币投放回笼政策、清分条件制约了银行业金融机构硬币回笼人民银行发行库。长期以来,人民银行重纸币回笼轻硬币回笼,重硬币投放轻硬币回笼,结果出现了荆门市全辖从2005年至2013年9年间硬币回笼量为零,但存在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库的硬币积压并存的现象。另外,人民银行应对回笼硬币进行二次清分再投放市场,以避免残损币、游戏币及差错产生,但目前人民银行硬币清分硬件条件还不能满足回笼硬币的清分要求,限制了对硬币的回笼。

由上可以看出,人民银行硬币净投放量大,硬币投放实现以投促回的效果较差;市场硬币回笼主体单一,相比较1元硬币有公交公司回笼,应更加关注5角和1角硬币回笼问题;在硬币第二循环过程中,人民银行和银行业金融机构应逐步推广、合理布局地应用硬币机具,激活体外流通硬币,提升硬币操作水平,加快硬币的流通速度,促进硬币回笼。

环节二:“小个体”经营者的硬币需求满足

在人民币现金第三循环中,硬币在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市场主体之间流转,表现为银行向市场主体供应硬币与市场主体对硬币需求相结合,银行从市场主体回笼硬币与市场主体交存硬币相结合的双向运动。根据在硬币供求中扮演角色的不同,本文将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主体划分为公交及轨道交通单位、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小企业个体户等“小个体”经营者、居民等四类,分类考虑在硬币循环包括硬币回笼和需求两方面

面的情况。

(一)市场主体对硬币回笼差异很大。在硬币回笼方面,市场主体之一的公交公司是硬币收入大户,有强烈的硬币回笼需求;其他市场主体收入硬币少,以硬币需求为主。如医院超市车站商业中心等均需要大量硬币。一般“小个体”经营者发生硬币收入和支出,收支相抵后主要表现为硬币净支出,无回笼压力。居民乘坐轨道交通等有一定的硬币需求,但这部分需求分散且需求量少,产生的零星硬币留在家中备用或沉淀下来。因此除公交公司和特殊情形以外,其他三类市场主体对硬币回笼的意愿和现实性都不强。

(二)市场主体的硬币需求满足: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采取预约基础上的“自下而上”方式进行硬币投放。市场主体对硬币的需求形成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对硬币的投放。尽管法规上规定了承担人民币券别调剂的责任,但作为市场主体,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人民币现金服务,主要基于提升服务质量和平衡成本利益等方面考虑,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投放硬币:“自下而上”方式是指单位及个人等向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提出硬币兑换或预约兑换需求,后者基于客户预约量向本行现金中心提出硬币需求,现金中心汇总需求后予以配款,如果库存不足则向人民银行办理取款业务,然后流程反向操作,硬币最终投放到市场。

(三)不同市场主体的硬币需求满足渠道存在差异。轨道交通、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等市场主体体量大,属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喜欢的“大客户”,在与银行的货币供应“谈判”方面具有一定的话语权,硬币需求相对容易满足。这两类市场主体往往能够与开户银行建立起稳定的货币供应协议,通过协议约定即时满足各券别人民币需求。根据对荆门市几个典型硬币需求大户的调查(表3),包括大型超市、医院、商业中心、交通等在内的硬币需求大户均与银行业金融机构达成了硬币供应协议,以荆门市新成立的万达广场为例,万达广场与开户单位荆门市建设银行建立了货币供应协议,能够根据自身硬币库存和需求情况,及时向建设银行提出硬币取款需求,后者通过调取库存或向荆门市人民银行发行库办理相应券别的硬币出库业务,充分满足了万达广场的需求。

表3 荆门市典型硬币需求大户的货币供应情况表

硬币需求单位	硬币供应银行	需求券别	备注
东方百货	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	1元,5角,1角	连锁超市
市一医	农业银行	1元,5角	医院
沃尔玛	工商银行	1元,5角,1角	大型超市
中商百货	工商银行	1元,5角,1角	大型超市
万达广场	建设银行	1元,5角,1角	商业中心
火车站	工商银行	5角,1元	交通

(四)“小个体”经营者的硬币需求满足是人民币现金第三循环的关键环节。硬币需求大户的硬币需求能够通过银行业金融机构满足,普通居民对硬币需求很少,“小个体”经营者数量众多,需求量较大且稳定频繁,但由于自身经济规模小,往往不能够被银行所重视,硬币需求满足渠道更加多样化和困难化,成为硬币需求满足环节的薄弱部分。据对某小型超市、早餐店、药房、蔬菜超市等“小个体”经营者的调查(表4),对于硬币需求的满足渠道,这些“小个体”经营者更多的是选择非银行渠道,原因一是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硬币备付量不足,时常会出现兑换不到的情形;二是银行兑换硬币积极性不强,存在要求以存款为前提,或托辞无硬币的现象;三是专门到银行网点兑换硬币耗时费力,自身意愿性不强。

表4 典型“小个体”经营者硬币需求及满足渠道情况表

需求单位	需求券别	需求量	满足渠道
小型药房	1元,5角,1角	合计平均每月2000元左右	开户银行
某早餐店	1元,5角	平均每日1元50元,5角30元	平时积累,找熟人(如菜市场商贩)换,银行,兑换中介
个体超市	1元,5角,1角	合计平均每月1000元	平时积累,找熟人(如供货商、菜市场商贩)换,银行
蔬菜超市	1元,5角,1角	平均每月1元1000元,5角150元,1角100元	平时积累,找熟人(如供货商、菜市场商贩)换,银行

由上可以得出,市场对于硬币主要以需求为主,目前能够形成回笼的主要以公交公司为单一市场主体;银行业金融机构以“至下而上”方式向市场供应硬币,可能导致营业网点常备硬币不足的情形;市场机制为“大客户”创建了较为稳定的货币供应机制,而“小个体”经营者的硬币需求满足渠道更加多样化,更应该强化传统银行渠道对“小个体”的硬币需求满足。

环节三:居民沉睡硬币的激活

在人民币现金第四循环中,硬币脱离金融系统在市场主体之间的自循环,其特点是硬币每一次转手都并非回到银行业金融机构,形成了硬币的体外循环。硬币流通寿命长,正常情况下,硬币在寿命周期内周而复始运行,行使其流通和支付的职能。根据货币流通公式: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必要量(M)=待销售商品数量(Q)*单位商品价格(P)/货币流通次数(V),市场中硬币需求量除了受商品交易总额影响外,还与硬币流通次数即流通速度相关。在市场中硬币存量一定的条件下,沉淀硬币越少,处于“活动”状态下的硬币量就越多,那么同等流通速度下产生的硬币供应量就越多,需要人民银行投放增量硬币的数量就越多,就越能减少硬币的发行成本。因此盘活市场中沉淀的硬币,是人民银行除了直接向市场投放硬币以外的另一项增加硬币供应量的可行措施。

(一)硬币主要分散沉淀在居民家庭。硬币在经营者和居民之间转手流通,硬币沉淀意味着硬币处于长时间不流通状态,没有发挥出货币的相应职能,是社会资源的浪费。经营者持有的硬币处于活跃状态:一是日常性的零星收支流转,二是根据供求关系的硬币动态补给;对于居民者而言,居民并不会担心硬币携带不足会影响其消费行为,由于硬币币值小、自重大、携带不便,大都会将经营者找零获得的多余硬币随手放入家中,如此循环往复,日积月累,大量硬币源源不断地沉淀到居民家中,逐渐退出流通领域。即使日常会用掉部分硬币,但仍有新的硬币不断进入沉淀。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家中存放几十元甚至上百元硬币在财产中的占比微乎其微,极少会有人从理财角度专门把硬币交存到银行。

(二)多种因素造成硬币在家庭中沉淀。一是居民自身的用现习惯,偏好纸币,1元、5角和1角硬币本身携带不方便;二是物价上涨,硬币购买力弱化,特别是5角和1角,通常仅在各类超市中使用,硬币适合范围窄;三是市场中硬币使用渠道匮乏,快捷式饮料小食品自助机、自动售票、贩卖等设备少;四是兑换硬币的渠道少,银行办理硬币兑换依靠手工清点速度慢;五是现行小面额纸币同时发行和流通的“双轨制”,特别是1元纸币对1元硬币有明显的驱逐效应。

(三)硬币自循环的关键就是要让居民家庭沉淀的硬币循环起来。硬币沉淀不但阻碍了硬币的正常流通,降低了硬币流通速度,扩大了硬币的供需矛盾,造成了国家资源浪费,而且对银行系统的硬币回笼带来了潜在压力。在传统工作机制下,硬币投放呈现单一投放、少回笼或无回笼的现象,硬币循环陷入“投放-沉淀-再投放”的死结。打破死结必须让沉淀硬币不再沉淀,最关键就是要激活居民家庭沉淀的硬币,让它们循环利用起来。为此应该加强对硬币流通循环的宣传引导,提高社会公众对硬币循环的认知程度,养成携带、使用和兑换硬币的习惯,加快硬币周转,减少沉淀。同时,为居民家庭使用硬币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鼓励有条件银行金融机构逐步引进硬币自助兑换机,实现7*24小时随到随办,化解银行硬币回笼难的问题。

由上可以看出,由于主客观等各个方面的原因造成了硬币主要沉淀在居民家庭,呈现出量小分散的特点。硬币的沉淀通过存量变少和速度降低两个方面减少了社会硬币供应量,只有让沉淀硬币动起来才能解开过去单纯依靠硬币投放的死结。因此激活居民家庭沉淀的硬币成为硬币自循环畅通的关键环节。▲

对目前硬币市场流通情况的调查

——以江西吉安市为例

马友龙 刘小兰

(中国人民银行吉安市中心支行)

近年来,吉安市辖内1元及以下现金供应基本以投放硬币为主且投放数额增加,但硬币“只投不回”、“流通受阻”等现象日益凸显。为有效促进硬币循环、服务百姓民生,现对硬币流通情况进行专题调研,分析存在问题及原因,提出提高硬币流通效率对策建议。

一、基本现状

(一)硬币投放总量逐年上升,而硬币回笼量却逐年下降。据调查统计,在近三年吉安市全辖投放、回笼的硬币中,投放回笼比仅为6.85%,各券别硬币投放量逐年上升,而回笼量却逐年下降,投放回笼量失衡。

(二)农村地区硬币供应不足,硬币投放仍有较大空间。吉安是欠发达的革命老区,辖属11个县(市)、两个区、214个乡镇,总人口约510万,其中农村人口占80%。农村地区经济生活交易以小额居多,结算工具以小面额现金为主。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小型超市、零售店铺林立,硬币需求量也随之增大。目前银行业金融机构大量的硬币基本上是投向市区人流量密集的大网点,农村地区的网点常常被“边缘化”,造成硬币供应区域的不平衡,农村地区硬币供应与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调查显示,农村地区居民对1元、5角、1角硬币仍有较大需求。

(三)无库县银行业金融机构硬币投而不放,大量硬币积压在其业务库。近年来,基层人行按照上级行有关政策要求,逐步加大了对未设发行库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硬币供应。但从实际调研中获悉,人行发行库投放的硬币大量地积压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库或上交至其上级行,未充分调运配发到各基层网点。

二、存在问题

(一)银行业金融机构“只投不回”,硬币回笼难。由于硬币清分处理机具价格较高,日常清分处理和设备维护成本大,受“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经营目标驱使,银行业金融机构配备硬币清分机具的积极性很低,依旧采用最原始的手工清点方式来完成硬币回笼工作,加之硬币重量大、规格品种多、收付劳动强度

高,组织同一金额的现金存款,硬币整理成本远远高于纸币。此外,长期以来,银行业金融机构硬币收兑机制不健全,未将硬币收兑工作纳入对营业网点和一线员工的绩效考核范畴,因此对硬币投放回笼工作持消极应付态度,对客户办理硬币交存业务互相推诿,导致硬币处于“有投无回”状态,硬币基本在居民手中“沉睡”。

(二)城乡居民“只进不出”,硬币循环使用难。问卷调查显示,城乡居民喜欢使用小面额纸币的人员占比达80%,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喜欢携带纸币外出购买、消费,而目前吉安全辖必须使用硬币投币消费的场所只有个别超市的投币存包机和自动售货机。因此“喜纸厌硬”的偏好导致城乡居民将消费过程中接收到的硬币习惯性存入家中的储蓄罐或办公室的抽屉里,很少带硬币出去消费使用。抽样调查的1000人中,人均携带硬币量为3枚,而其家庭存放量约为30~50枚,办公室等其他场所存放10~20枚。由此可见,城乡居民硬币“只进不出”致使投放的硬币70%长期“沉睡”,无法实现正常的循环流通,硬币循环使用难。

(三)硬币自助设备稀缺,硬币与纸币自助互换难。从2014年开始,吉安市便开始推进银行业金融机构硬币自助服务设备建设,但由于硬币自助处理设备的价格昂贵,目前吉安市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布放硬币自助处理设备相当匮乏。截至2016年6月末,全辖736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中,仅布放了8台硬币自助兑换机,覆盖率仅为1.01%。且在日常使用中经常出现故障,多半硬币兑换机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由于硬币自助设备稀缺,导致纸币与硬币通过自助设备互换难。

三、原因分析

(一)硬币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由于银行业金融机构、企业等硬币供需各方尚未搭建“互联互通”的硬币信息共享平台,使得硬币回笼方与需求方之间难以直接对接,相互之间不能进行有效的硬币余缺调剂。问卷调查数据显示,被调查的50家大型商户(公交公

司、医院、大型超市等)有40家反映只能通过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交存或兑换硬币。因硬币相互调剂难,致使回笼者硬币大量积压而需求者却十分紧缺。

(二)硬币供应保障监督缺失。受县级发行库撤并等因素影响,基层县支行对人民币流通管理的履职也随之弱化,且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只对保护人民币流通和办理人民币收兑业务作了一些原则上的规定,却没有规定处罚条款,客观上致使银行业金融机构违法无成本,因此小面额现金供应“主办行、主办网点、备付金”三项制度难以得到有效落实,而人民银行作为监管者难以监管到位。

四、对策建议

(一)拓宽硬币投放渠道,保障硬币的市场供应。拓宽硬币投放渠道,进一步加大对无库县的硬币投放力度,建立“库县对接”硬币供应长效机制。根据未设发行库县域市场需求,通过中心支库从分库直接将硬币调拨到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库或当地硬币需求量大的大型客户,减少中间环节,降低调运成本。发挥支库的现金供应保障作用,在农村地区建立硬币定向供应机制,开辟硬币供应绿色通道,将发行库的硬币直接投向农村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设在农村地区的网点,确保硬币增量的精准投放和券别结构合理。

(二)增加自助设备布放,提高硬币使用效率。强化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硬币自助兑换机、硬币存款机等设备的购置、布放与业务量的统计分析等工作的指导

和监督的同时,强化业务人员技能学习和培训,提高对硬币自助兑换机具的日常维护管理和业务数据统计分析水平,及时掌握硬币自助兑换机具的运行、使用情况,适时调整自助机具的布放,充分发挥自助机具全天候服务功能,提高硬币使用效率。

(三)创新监督管理手段,强化硬币收兑职责。强化对硬币流通管理工作的非现场监管,构建以硬币自循环配套工作情况、群众投诉情况、网点硬币收兑情况等主要评价指标体系的考核机制,制定分层次、差异化的考核办法,全方位覆盖银行业金融机构现金服务工作。对群众反映强烈、硬币收兑数量少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应重点关注,及时组织现场检查,并果断采取约见谈话、通报批评、暂停办理发行库交存款业务等监管措施促其整改。修订完善人民币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对违反人民币券别调剂尤其是硬币收兑业务规定行为进行行政处罚,追究违法单位、责任人员责任,增强其硬币收兑社会责任意识。

(四)加大社会公众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硬币流通环境。加大社会公众对“推行小面额人民币硬币化是必然趋势”的宣传力度,利用电视、网络、微信公众号等新兴媒体进行宣传,将使用硬币的优点与爱护人民币和反假货币知识宣传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唤醒居民手中“沉睡”的硬币,鼓励公众使用硬币自助设备,营造良好的硬币流通环境。▲

(上接第7页)设立“湖北度支公所”,内设田赋科、税捐科、俸饷科、会计科、机要科、行政科等。

也就是说,清代湖北地方政府中负责军饷的机构前后分别是“湖北军需总局”、“湖北善后总局”和“湖北度支公所”。宣统三年(1911年)时,负责俸饷的湖北地方政府机构中,只有“湖北度支公所”,但是其内部机构中并没有所谓的“湖北粮饷局”。也就是说,“湖北粮饷局”,并不存在。

实际上,粮饷局是清代军队中的一个机构,并非政府机构。

清末,袁世凯接管小站的定武军后,将其改名为新建陆军,至编成北洋军,逐步改进了军队后勤机构,在北洋军总部,设有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局,各营设相应的专门委员及医官,明确职责,专司其事。如粮饷局,于每月派员会同各营主官及营饷员,在操场点名发放。

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编练的湖北常备军,

其军制,与北洋常备军基本一样,在其常备军总部后勤机构中,也设有“粮饷局”,但此局不叫“湖北粮饷局”,更不可能由后勤机构附设的一家下级机构来发行湖北省的官方纸币。

由此可知,“湖北粮饷局”是一个凭空想象现象的清代湖北地方政府机构。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湖北粮饷局铜圆拾枚钱票”是一张利用空白民间钱票,经填写改制,并冠以“湖北粮饷局”名称的伪造清代湖北官方纸币。显然,此票无收藏和鉴赏价值,只能作为一种典型的伪造地方官方纸币,加以借鉴。▲

[参考文献]

- [1]柏文.湖北省钞券综述[J].泉坛,总第4期.
- [2]张或定,张卫星,夏红艳.清代湖北公债票的发现与考证——湖北发行时间最早的公债[J].武汉金融(增刊),2013,(11).
- [3]湖北省志·财政[M].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3-5.

钱币上的“福”文化

叶真铭

福文化是中国民俗吉祥文化的主要内容,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精神家园和世代传承的文化瑰宝。有学者归纳,中国民俗吉祥文化包括福、禄、寿、喜、财、吉、和、安、养、全十大方面的内容。《诗经·小雅·瞻彼洛矣》说:“凡言福者,大庆之辞。”福文化就是吉祥文化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它凝结着中国人的伦理情感、生命意识、审美情趣、民俗习惯和信仰追求。中国民间历来有追求美好生活、祈盼吉祥幸福的理想愿望,因此中国人对福文化具有天然的亲近感,福文化已经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须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几乎可以说无所不在。

钱币与人们生活关系最为紧密,因此钱币自然成为承载表现福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从古至今,蕴含福文化内涵的钱币层出不穷,种类繁多,在人们生活当中随处可见。人们不仅直接在钱币上书写“福”字以求吉祥,还巧妙地运用幸福吉祥的文字以及神话人物、走兽、花鸟、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图案、纹饰和符号,通过借喻、谐音、比拟、双关、象征等手法,来表达自己的对生命的关注、对美满生活的向往、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历代具有福文化内涵的钱币,都表达了人民群众的生命意识、理想追求、审美情趣和美好愿望,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故而倍受关注和喜爱。

一、“福”字入钱增吉祥

“福”字是我国出现较早的古文字之一。甲骨文中就有160多个“福”字,其字形是“两手捧酒献于祭台上”(图1)。古人以酒象征生活的富足、完美,因此古人在祭祀时总是把装满美酒的器具呈献在神的面前,以祈求幸福。《说文》:“福,祐也。从示,畐声。”罗振玉



图1 甲骨文“福”字

《增订殷虚书契考释》:“(甲文)像两手奉尊于示前,或省升,或并省示,即后世之福字。”“福”字从字形上看,左边为“礻”,意为“神祇”,而右边由“一”、“口”和“田”组成,“一”字按《说文》解释为“一,惟初太始,道立于

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口”字,《说文》解释为“口,人所以食言也。”“田”即指耕地、打猎。这个福字,寄托了古人祈求得到田地、以满足温饱需求,又得到神灵保佑、过上富贵生活的美好愿望。因此历代铸造了大量带有“福”字的钱币,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历代“福”字钱币,既有官府铸造的正式流通钱币,也有民间铸造的不参与流通的民俗钱币。

流通钱币上出现“福”字,目前所知当以唐会昌开元背“福”字钱(图2)为最早。唐代中期“安史之乱”后,社会经济遭受重大破坏,出现严重的“钱荒”。加之寺庙遍布,众多僧尼均依赖官府供给,财政负担沉重。会昌年间,唐武宗为减轻财政负担,诏令废灭天下佛教,拆毁各地寺院,以佛像等铜器铸钱。淮南(今扬州)节度使李绅率先铸造进呈一种背面铸有“昌”字的“开元通宝”钱,“昌”纪年号“会昌”。各地州郡纷纷仿效,铸造背面有本州郡名的开元钱,统称“会昌开元”。会昌开元背文共有23种,其中一种即为“福”字。会昌开元背“福”字钱,是福建福州所铸,“福”字一般在穿上,穿下及穿右者罕见。五代后梁时期(916年),统治福建的闽王王审知铸造铅质“开元通宝”钱,有大小两种,背后也有“福”字(图3)。



图2 会昌开元福钱



图3 闽开元铅钱背福

五代后晋天福三年(938年)石敬瑭铸造“天福元宝”铜钱(图4)。五代后唐末年,天平节度使石敬瑭起兵造反,向契丹求援,割让幽云十六州,每年纳岁绢三十万匹。在契丹援助下,击灭后唐,建立后晋政权。石敬瑭对于契丹百依百顺,甘心奉比他小12岁的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自称“儿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儿皇帝”。石敬瑭依靠契丹的力量捡了个皇帝当,认为是上天赐福,因此改年号为“天福”,并铸“天福元宝”钱。存世的天福元宝钱,铸造粗糙,钱体薄小,并没给老百姓带来幸福,却将“儿皇帝”石敬瑭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辽兴宗耶律宗真景福年间(1031-1032)铸造有“景福通宝”年号钱,隶书旋读,光背,传世少见。西夏第二位皇帝、毅宗李谅祚福圣承道年间(公元1053-1056年)铸造有西夏文“福圣宝钱”,这是目前所知西夏国最早的铸币,面文旋读,光背无文,制作粗糙,存世罕见。



图4 天福元宝

300多年后,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朱元璋铸造有“大中通宝”钱,也在钱背加铸地名。“大中通宝”背“福”字钱,是平定福建割据势力后在福建铸造的,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五种面值,铸造数量不多,迄今罕见。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后,开铸“洪武通宝”年号钱,钱背也铸有地名。福建行省宝泉局铸造的背“福”字钱是洪武通宝九种纪地钱之一。“洪武通宝”背“福”字钱(图5),“福”字铸于钱背穿下,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五种面值。其中较为多见的是洪武通宝背“福”小平钱,其钱文“宝”字有缶宝和尔宝二种写法,“通”字有单点通和双点通等多种版别。



图5 “洪武通宝”背“福”钱

清顺治年间,铸造五种形式“顺治通宝”钱,史称“顺治五式”,从而确立了清代的货币体系。顺治钱二

式,在钱背铸汉字纪铸钱局,称“顺治单字记局式”。顺治六年(1649年)福建省铸钱局开铸顺治通宝背“福”字钱。现仅发现有穿上“福”字者,《古泉大全》记载的穿右“福”钱未见实物。此后,福建省铸钱局又铸造背有汉字“一厘·福”字样的顺治通宝权银钱(图6)、顺治通宝背满汉文“福”字钱、康熙通宝背满汉文“福”字钱。《古钱大辞典》记载,雍正年间规定各省铸钱背面钱文用满文,“皆用宝字为首,次用各本省一字”,从此成为定制。《古钱大辞典》收录有一枚雍正通宝背满文“宝福”钱拓图,但至今尚未发现实物。乾隆至宣统年间,福建宝福局都铸造有背为满文“宝福”的年号钱(图7)。还发现有乾隆通宝背穿上“福”字钱以及乾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背满汉文“福”字年号钱,皆不多见。1911年辛亥革命福建光复之初,中华民国闽军政府铸造发行了“福建通宝”圆形圆孔铜钱投放市面流通,有一文(图8)、二文两种面值,这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一种以省名作为钱币名称的铜钱。还有圆形方孔的“福建通宝”背“省造二文”、“福建省造”背“二文”试铸样钱,存世罕见。



图6 顺治通宝“一厘福”钱



图7 咸丰宝福一百



图8 福建通宝一文



图9 百福百寿大花钱

这些历代铸造的带有“福”字的钱币,虽然不是专门为祈福所铸,但因有“福”字寓意吉祥,满足了人们祈福纳祥的愿望,故而倍受追捧。所以官府、民间也铸造了大量带有“福”字的民俗钱币。在古代民俗钱币中,“福”字钱占了很大的比重,如“福寿双全”、“福寿康宁”、“福寿长春”、“福寿齐增”、“福禄寿喜”、“福禄万代”、“福德长寿”、“福海寿山”、“福自天来”、“福星高照”、“福在眼前”、“天官赐福”、“寿福康宁”、“福如东海”、“德福寿禄”、“太平福象”、“福寿延年”、“万福来临”、“驱邪降福”、“福寿齐天”等等,不下数百种。还有一种超大型百福百寿图花钱(图9),直径101毫米、厚4.2毫米、重270克。黄铜铸造,雕刻精美,古朴雅致,品质精良,包浆纯熟,润泽自然。钱文一面是54个“福”字,一面是54“寿”字,正面文字排成三轮,内轮13字,向外依次为17字、24字,背面也有54字,每字各有千秋,互不雷同。以篆书为基础,尚有金文、钟鼎文等,钱文点画分明,书风蜿蜒曲折、稳重端庄、千姿百态,极有韵味,尽显我国古文字绚丽多彩的无穷魅力。图文设计奇妙,排列整齐,布局合理,构造和谐,拿在手中赏玩,若饮醇酒,如品佳茗,油然而生福在眼前、寿与天齐之幸福感,一股快乐祥和的

气氛扑面而来。

除了古代钱币,现代发行的钱币上也常常可见“福”字。2012年开始,我国澳门特区大西洋银行及中国银行每年发行一枚生肖贺岁钞,目前已发行了壬辰龙年、癸巳蛇年、甲午马年、乙未羊年、丙申猴年5款生肖贺岁钞。每款生肖贺岁钞正面都印有中文“福”字,以表达美好的寓意(图10)。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2005年鸡年贺岁普通流通纪念币,背面灯笼图案内有“满堂福”字样(图11)。2008年鼠年贺岁普通流通纪念币,背面有一幅对联“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寓意新春快乐。中国人民银行从2014年开始每年发行一枚贺岁银质纪念币(图12),以“福”字为主题设计图案,呈现给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画面,传承文化,寓意吉祥,倍受收藏爱好者追捧。



图11 生肖鸡年流通纪念币



图12 2015年贺岁纪念银币

二、吉语口彩送祝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福”的概念内涵非常丰富,如我们常说的“五福”。“五福”的说法,出自上古典籍《尚书·洪范》:“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修)好德,五曰考终年(命)。”长寿是命不夭折而且福寿绵长;富贵是钱财富足而且地位尊贵;康宁是身体健康而且心灵安宁;好德是生性仁善而且宽厚宁静;善终是生命即将结束时,没有遭到横祸,身体没有病痛,心里没有挂碍和烦恼,安详而且自在地离开人间。简单说“福”就是活得较长,不受贫穷,身心健康,品德良好,能得善终。这五个方面实际上已概括了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体现了中国人传统的幸福观。只有五福全部拥有才是完美的,其余的各种情况都是美中不足,是有缺陷的福。因此《礼记·祭统》说:“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之谓备也,即富贵、长寿、安宁、吉庆、如意等全备完美之意。”历代铸造的以五福作为主题内



图10 澳门龙钞(中国银行)

容的民俗钱币不胜枚举,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吉语钱。

吉语钱,也称口彩钱,是历代民俗钱币中最为庞大的门类。凡刻铸有吉语祝辞等文字的仿钱物品,均可称为吉语钱。历代官炉、民间均有铸造,其品种极多;其形状各异,有圆形、椭圆形、六边形等;材质多样,有金、银、铜、铁、锡等,其中铜质最为常见。吉语钱上或一面为图形,一面为吉语;或两面均铸“天下太平”、“万寿无疆”、“大富大贵”、“出入通泰”等幸福吉祥的文字,表达祈盼幸福的愿望。吉语钱用途广泛,多用于婚嫁、馈赠、赏玩、祝寿、压箱底及礼佛等,也有作为压岁钱在过年时赠送给孩子的,主要目的是以幸福吉祥的文字,取其吉祥顺利之口彩,来压邪攘灾和祈求幸福。因此吉语钱表现的主题也是多种多样的,但与五福有关的内容则是历代吉语钱永恒不变的主题。

一是祝颂长寿的吉语钱。在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这“五福”之中,以长寿为先。长寿是人最重要的幸福,没有了生命,一切幸福都无福消受。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称“寿如山岳福如云”(《临江仙·为岳母寿》),将“寿”比作山,那“福”就是环绕在山间的云朵。可见幸福美满的人生离不开“寿”,所以人们对长寿之福的追求尤为强烈。历代铸行的吉语钱上大量出现关于长寿的祝颂语,如“百千长寿”、“松鹤延年”、“龟鹤齐寿”(图13)、“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松鹤长春”、“鹤寿松龄”、“龟龄鹤寿”、“长命百岁”、“延年益寿”、“福寿”等,充分体现了千百年来人们追求长寿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历代官府钱局还专门铸造了一些钱币呈进宫廷,作为祝贺皇帝生辰的礼物,称为“万寿钱”。“万寿



图13 “龟鹤齐寿”吉语钱



图14 “宝祐万年”银钱

钱”铸造都非常精美,大多为金银材质,存世罕见。如南宋“福宁万寿”金钱,“绍定万岁”、“景定万年”、“圣寿无疆”、“慈元万寿”、“福寿千春”银钱,“重华万寿”铜钱等,2011年南宋“宝祐万年”银钱(图14)被评为十大“中华民间钱币国宝”之一。存世有清

代“光绪通宝”背“福寿”钱(图15),“福寿”二字有篆书、楷书两种写法,有人认为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四川钱局铸造的万寿钱。



图15 “光绪通宝”背“福寿”钱

二是追求富贵的吉语钱。富贵,指富裕而又有显贵的地位。富,富裕,富有;贵,显贵,贵气,地位高。《韩非子》卷六说:“全寿富贵之谓福。”东汉刘熙在《释名》中直接称:“福,富也”,认为富贵就是幸福的。因此对大富大贵、富贵双全生活的追求,历来是封建社会大多数中国人的最高理想和奋斗目标。历代铸行的“长命富贵”、“大富大贵”、“福禄双全”、“金玉满堂”、“马上得禄”、“加官进禄”、“五子登科”、“马上封侯”、“拜将封侯”、“位列三台”、“状元及第·一品当朝”(图16)、“年年有余”等吉语钱,都体现了封建时代人们对富贵生活的美好愿望,凝聚了人们祈求生活富足、兴旺发达的理想追求,故而一直为人们所钟爱。



图16 状元及第·一品当朝

三是祈求健康平安的吉语钱。健康是福、平安是福,寄托了千百年来人们对生命的珍重和生活的挚爱。古往今来,健康平安都是人们最深切的祝福和最热切的期盼。无论显贵还是微贱,无论政要还是平民,无论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健康和平安都是他们最为渴求的、也是最为难得的幸福。所以历代都铸有祈求健康平安的吉语钱,如“吉康平安”、“平安吉庆”(图17)、“掌福消灾”、“积福消灾”、“植福消灾”、“驱邪降福”、“万病祛除”、“出入通泰”、“出入平安”、“平安如意”、“平安吉祥”、“六合同春”、“年年太平”、“天下太

平”等,都表达了人们追求健康,祈望自身平安、国家安定的诉求,成为人们孜孜以求并随身佩戴的必备之物。



图17 平安吉庆

四是推崇积德修福的吉语钱。追求幸福是人们发自内心最朴素的愿望,牵动着无数中华儿女的情感,千百年来从未改变。古人们很早就认识到福不会无缘无故来的,要想得福,心中必须要有股神圣的正能量来支撑,那便是“德”,可以说“有德才有福,有福必有德”。因此修好德成为“五福”之一,行善积德作为修福增福的重要实现形式,受到推崇。历代铸造了不少宣扬积德修福的吉语钱,如“积德修福”、“厚德载福”(图18)、“修德积福”、“厚德积福”、“积福修德”、“修德致福”等,表达人们希望通过多积德、广积德,获得更多幸福,成为有福之人的愿望。



图18 厚德载福钱

五是希望子孙繁盛的吉语钱。子嗣兴旺、多子多福也是传统福文化的重要内容。古人认为,人是万物的中心,但是人的生命毕竟是短暂的,人们无法超越死亡的界限,因而把自我生命的延续寄托在后代的身上,



图19 五世同堂

所以繁衍后代,不仅是接续祖先香火,更是延续人们自己的生命。因此形成多子多福的观念,认为子嗣多了,人丁旺盛,自己就更有福气,一家人能够如意、幸福、美满。所以历代铸造了大量祈求子嗣兴旺的吉语钱,如“早生贵子”、

“连(莲)生贵子”、“观音送子”、“天降麟儿”、“天仙送子”、“麒麟送子”、“瓜瓞绵绵”、“多子多福”、“多子多孙”、“五男二女”、“长宜子孙”、“儿孙满堂”、“五世同堂”(图19)等,表达人们祈望子孙兴旺、渴求多子多福的强烈愿望。

六是祝愿吉祥如意的吉语钱。追求吉祥如意也是福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吉祥,预示好运之征兆,祥瑞,吉利,幸运等。《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成玄英疏:“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徵。”如意,原是旧时民间用以搔痒的工具,流行于全国大部分地区。大约出现于战国之时,又称“搔杖”,俗称“不求人”。后成为吉祥之物,寓意万事顺利,吉祥称意。历代铸造了种类繁多的祝愿吉祥如意的吉语钱,如“必定如意”、“万事如意”(图20)、“百事顺遂”、“称心如意”、“事事称心”、“日月遂心”、“千万称心”、“诸事和合”、“吉祥如意”(图21)等,皆表达了人们间良好的祝愿。



图20 万事如意花钱



图21 吉祥如意钱

三、吉祥纹饰祈幸福

古往今来,人们总是向往风调雨顺的生活,追求长长久久的幸福。人们对幸福的渴望,不仅挂在了口头、见诸于文字,还将很多美好的祈盼描绘成图形纹样,以借喻、谐音、比拟、双关、象征等手法来表达自己对幸福美满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就是福文化吉祥图案。福文化吉祥图案追求“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人生仪礼和喜庆节日,成为传统吉祥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这些福文化吉祥图案,在历代钱币上也常常可以见到,其中以蝙蝠、莲鱼、瓜、蝴蝶、乌龟、仙鹤、鹿、牡丹、寿桃、梅花等图案较为常见。

蝙蝠图案 这是历代钱币上最为常见的福文化吉祥图案。蝙蝠是唯一一类具有飞翔能力的哺乳动物,蝙蝠的真实形象是很猥琐丑陋的。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于“蝠”与“福”同音,蝙蝠成为了好运和幸福的

象征。人们以蝙蝠表示福气、福禄寿喜等祥瑞。中国传统文化中,蝙蝠作为民间喜闻乐见的吉祥符号,其表现图案都是非常美观的。以蝙蝠来祈福,是谐音福文化的典范。因此在钱币上人们往往用五只蝙蝠组成的图案来表示“五福临门”的祝福。例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信义储蓄银行发行的当十铜元100枚钱票背面就绘制有“五只蝙蝠”图案(图22),民国时期江西修水县“乾昌祥”商号发行的一千文钱票以及民国十三年(1924年)湖北陨县将军河陈家庄“万丰祯”商号壹串文钱票上也都会绘制有“五只蝙蝠图”,代表所有吉祥的祝福。蝙蝠还可以和许多事物组合造型,构成寓意吉祥的图案。例如,由五只蝙蝠与寿元素(“寿”字或寿桃图案)组成的“五福拱寿”图案,也是一种最常见、最受欢迎的福文化吉祥纹样。中国人民银行于2015年1月发行2015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1/4盎司圆形金质纪念币、1盎司圆形银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寿桃和五只蝙蝠造型组合,共同构成了一幅繁缛富丽的吉祥画卷,寓意“五福拱寿”,象征着多福多寿。而且钱币背面上部的两只蝙蝠图案是倒着画的,深切表达出“福到”的良好祝愿(图23)。有一种钱币,在穿孔四周



图22 光绪34年信义储蓄银行当十铜元100枚钱票



图23 2015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五福拱寿”

铸上四只蝙蝠图案,以蝙蝠与钱币穿孔的组合造型,寓意福到眼前、世世幸福(图24)。还有一种“五铢”钱币,在钱币外廓上铸有一只蝙蝠图案,也寓意“福在眼前”,祝愿幸福的生活就要到来(图25)。蝙蝠还经常与桃子、石榴组合在一起,表达“福寿多子”的祝福。很多蝙蝠和桃的纹图,寓意“多福多寿”。蝙蝠、桃和两枚古钱的纹图,象征“福寿双全”等。



图24 福在眼前



图25 五铢福在眼前

龟鹤鹿图案 这是象征长寿太平的传统福文化吉祥图案。龟是四灵之一,为甲虫之长,是长寿的象征,可兆吉凶。《龟经》载:龟一千二百岁,可卜天地终结。鹤是一种仙禽,为鸟中长寿的代表。《雀豹古今注》载:鹤千年则变成苍,又两千岁则变黑,所谓玄鹤也。在古代,鹿也被认为是神灵之物,它能给人们带来吉祥和长寿,神话传说中那些长寿的仙人就是骑着梅花鹿。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常用龟、鹤、鹿图案来象征长寿太平。存世有一种民俗钱币,正面为“龟鹤齐寿”四汉字,背面穿上有一只展翅高飞的仙鹤,穿下有一只缓慢攀爬的乌龟图案,以长生不老的龟鹤图案来表达长寿的祝福(图26)。还有一种圆形圆孔钱,正面为“金玉满



图26 “龟鹤齐寿”钱



图27 鹿鹤同春钱

堂长命富贵”字样,背面穿右铸一梅花鹿,穿左铸一仙鹤,上为桐树,下有花草图案,组成一幅“鹿鹤同春”的吉祥画,以“鹿”取“陆(六)”之音,“鹤”取“合”之音,谐音“六合同春”,象征天下太平,万物皆春,欣欣向荣(图27)。

莲鱼图案 这是象征生活富足、多子多福的传统福文化吉祥图案。鱼和莲花是是中国传统吉祥图案中最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标志性符号。鱼,自古以来为我国百姓所喜爱,除了它的食用价值外,其文化寓意也很丰富。鱼多子,与“裕”谐音,又与“余”谐音,是有多余富裕、子孙繁盛的象征。人们用鲤鱼祝福“年年有余,事事康宁”由来已久,可谓上至皇室贵胄、下至寻常百姓,皆视其为祥瑞祈福之物。在中国民俗文化中,莲花也具有特殊的吉祥寓意。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有洁身自好的美好寓意,也象征纯洁的爱情,且莲蓬多子,又被视作是多子多福之意。莲与“连”谐音。因此,传统民俗文化中常用莲花或莲藕和鲤鱼的组合造型,即“莲莲有鱼”图案,以象征物的谐音寓意“连连有余”、“年年有余”,期望连年都有富余的财富及食粮,生活永远美好富足,成为中国传统吉祥祈福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脍炙人口的吉祥符号之一。存世有一种双面镂空的花钱,钱币上有两条鲤鱼和莲花、莲叶图案,形象生动,表达出“年年有余”的祝福(图28)。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2015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1/4盎司圆形金质纪念币、1盎司圆形银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



图28 镂空莲鱼花钱



图29 2015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年年有余”

瓜瓞(蝶)图案 在中国民俗文化中,“瓜瓞绵绵”是象征子孙兴旺的福文化吉祥图案。“瓜瓞绵绵”来源于

《诗经·大雅·文王之什》之《绵》篇。此诗开头便说:“绵绵瓜瓞,民之初生”。“瓞”(音:dié),就是小瓜;“瓜”,是大瓜。“瓜瓞绵绵”的含义是瓜始生时小,但其蔓不绝,会逐渐长大,绵延滋生,引申为生生不息,用为祝颂子孙繁昌,发达兴旺。传统的“瓜瓞绵绵”吉祥图案有三种构图方式,一种是“瓜”(大瓜)和“瓞”(小瓜),连着藤蔓枝叶和花;第二种是大瓜、藤蔓枝叶加上蝴蝶、金龟、蜻蜓等昆虫图案,以蝴蝶为最多见,取蝶与“瓞”同音,没有出现“瓞”图。第三种则是“瓜”、“瓞”、蝴蝶图案同时出现。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2015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1/4盎司圆形金质纪念币、1盎司圆形银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以瓜果、藤蔓以及蝴蝶造型组合设计,并刊“瓜瓞绵绵”字样及面额,构图饱满和谐,充分体现了绵延不绝、繁昌兴盛的吉祥寓意(图30)。



图30 2015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瓜瓞绵绵”

牡丹花图案 牡丹花也是常见的福文化吉祥图案。牡丹花是中国特有的木本名贵花卉,有数千年的自然生长和1500多年的人工栽培历史。牡丹花大而香,色泽艳丽,玉笑珠香,富丽堂皇,素有“国色天香”之美誉,被推戴为“花中之王”。唐代刘禹锡有诗曰:“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蓉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清朝末年,牡丹就已成为当时中国的国花。1985年5月牡丹被评为中国十大名花之一。自唐代以来,牡丹就颇受世人喜爱,被视为繁荣昌盛、美好幸福的象征。宋时更被称为“富贵之花”。牡丹花以其吉祥的寓意深受人们喜爱,成为传统的福文化吉祥装饰纹样,被广泛使用。牡丹图案在古代民俗钱币上可以找到,在当今人民币上更是大量出现。1957年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10元券,背面即以姹紫嫣红的多色牡丹纹饰作为主景装饰图案(图31)。第三套人民币2角券、第四套人民币10元券的背面,第五套人民币100元券正面“壹佰圆”面值下的装饰纹饰,均为牡丹图案。1992年开始发行的1元流通硬币,其背面也以一朵盛放的牡丹花作为主题图案(图32)。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10元流通纪念币、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流通纪念币以及1990年世界杯足球赛银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纪念银币、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金银纪念币等,也选用了牡丹花作为币面图案。



图31 第二套人民币10元券



图32 1992年1元牡丹硬币

此外,福神、天官赐福、荷花、莲叶、寿星、寿字纹、梅花(花开五瓣,象征“五福”)、石榴、西瓜、佛手瓜、桃子、葫芦、葡萄、祥云、八吉祥、缠枝纹等图案、纹饰,也以“谐音寓意”或“以物寓意”的手法来隐喻祝颂吉祥幸福的主题,因此也成为

历代铸行的钱币上常常出现的吉祥祈福图案。

四、独特钱型寓福意

圆形方孔钱是我国封建社会流通货币的基本形制。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秦始皇下令废除六国货币,将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作为全国流通行使的通货,从此圆形方孔钱作为流通货币的基本形制被固定下来,并连续行用了2000多年。直到辛亥革命时期,云南、天津、四川等地还铸造发行圆形方孔的“民国通宝”、“大汉纪元”钱。因此历代铸行的具有福文化内涵的钱币,其形制也绝大多数为圆形方孔状,但还有一部分造型较为独特的钱币,被称为“异形钱”,如葫芦、寿桃、连体、长命锁、梅花、鱼、钱树、钱剑等,以其生动形象的钱币造型表达吉祥幸福的祈盼。

葫芦形钱币 在中华民俗文化中,葫芦是重要的吉祥象征物,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寓意丰富。葫芦为藤本植物,藤蔓绵延,适应性强、长势好、果实圆润饱满,往往令人联想到家族的兴旺、繁衍与美满,因此人们把葫芦看作可以驱灾辟邪、祈求幸福,实现家族人丁兴旺、世世荣昌的吉祥植物。取其“蔓”与“万”谐音,寓

意万代绵长。葫芦,谐音“福禄”。其枝茎称为“蔓”,“蔓”与“万”谐音,“蔓带”与“万代”谐音。葫芦与它的枝茎一起,谐音“福禄万代”,象征“福禄寿”齐全,万代绵长。葫芦既可食,又可为器。作器皿既能容纳、包藏,并且不拒固体、液体,又便携带,贮存,上古时期即视之为吉器,象征天生品质以及被重视、重用,又寓意顺利、富裕、如意。所以,古代一些民俗钱币就特意铸造成葫芦形状,以取其吉祥如意。图33就是一枚葫芦形古代民俗钱币,高67.5毫米,币正面有“龙凤成祥”及道教符咒,背面为八卦图案及干支文字,以形象生动的吉祥葫芦造型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图33 葫芦形钱币

寿桃形钱币 在古代人的文化观念中,桃蕴含着吉祥如意、辟邪逐鬼、祈福祝寿的文化意义。早在先秦时期,桃就被当作镇邪驱恶的神物,当时人们已有用桃枝拒鬼于门外的习俗。如《庄子》中有:“插桃枝于户,连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汉代以后又发展为在门前悬挂桃符阻止鬼怪进入住宅,“桃符”也被认为是春联的前身。桃还是长寿的象征,其形象以蟠桃、寿桃居多,这与古代神话传说有关,如西王母种植蟠桃、开蟠桃盛会等。传说有一种仙桃,食之可延年益寿。相传孙膑为母祝寿,吃了师傅鬼谷子赠送的仙桃,返老还童。后人争相效仿,在父母生日时送鲜桃祝寿,誉为寿桃。后因桃子生长的季节性限制,人们又用面粉蒸成寿桃形状祝寿并流传至



图34 寿桃形长命百岁

今。寿桃的寓意是祝福长辈福寿如意,因此桃子从众多瓜果中脱颖而出,在民间传说中被看作是长生不老的仙果,成为象征长寿的代名词,最终演化为福文化的重要符号。存世有不少铸成寿桃形状的民俗钱币。不过寿桃形钱币,寿桃一般是倒置的,为了便于悬挂,桃果朝下,桃柄朝上。如图34就是一枚倒置的寿桃形状钱币,正背面皆铸“长命百岁”四字,其祝福长寿吉祥的主题鲜明突出。

连体钱币 指铸成两枚横列叠压形状的钱币,目前所见最早的连体钱出现于汉代,但以清代连体钱较为多见,特别是道光、同治、光绪年号连体钱最为常见。钱古称“泉”,而“泉”与“全”同音同声,因此连体钱寓意“双全”。有一种清代晚期连体钱,正面“光绪通宝”背“福寿”字样(图35),就以“福寿”的吉祥文字和连体双钱的独特造型,表达出“福寿双全”之寓意,深受欢迎。还有一种清代连体花钱,正面为“道光通宝”,背为“天下太平”字样(图36),以连体“天下太平”的造型,强烈表达了广大劳动人民期盼太平、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和理想。



图35 光绪通宝背“福寿”连体钱

锁形钱币 以锁寓意吉祥来源于古代佩戴长命锁的习俗。长命锁也叫“寄名锁”。佩戴长命锁的习俗最早可追溯至汉代,当时称为“长命缕”、“长生缕”、“续命缕”等。古人们认为,锁是一种起封闭作用的器具,门、箱等一旦上锁,就只有用钥匙才能打开,所以锁也可用来锁住无形的事物。只要佩戴上锁形饰物,就能“锁”住生命,辟灾去邪。古人认为小孩一旦戴上了锁,就能避免病魔疫鬼侵入,无灾无祸,平安长大。所以人们把这种锁称作长命锁。古时新生儿满百日或周岁举行的仪式中最为流行的就是挂长命锁了。因此历代也铸造



图36 “道光通宝·天下太平”连体花钱

了不少长命锁形状的钱币,币面铸刻有“长命百岁”、“长命富贵”、“福如东海”等字样,用以辟邪去灾,祈求平安。图37就是一枚明清时期铸造的民俗钱币,黄铜材质,呈长命锁形状,上镌有“长命百岁”等文字图案,表达了长辈对晚辈的深切祝福。



图37 锁形钱币

梅花形钱币 梅花是中国传统名花,通常在冬春季开放,与兰花、竹子、菊花一起列为“花中四君子”,也与松树、竹子并称为“岁寒三友”。在严寒中,梅开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因此民间常以梅花作为传春报喜的吉祥象征。梅花花瓣五片,有白、红、粉红等多种颜色,象征着快乐、幸福、长寿、顺利、和平的“五福”,故又名“五福花”。历代铸造的民俗钱币有呈梅花形状,多取(下转第52页)



图38 梅花形钱币

中华文化影响下的古代琉球王国铸币

叶真铭

琉球王国是位于中国东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国,从明洪武五年(1372年)与中国建立正式的藩属关系起,到清光绪五年(1879年)为日本吞并为止的五百余年间,与我国交往始终极为密切。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明太祖朱元璋赐闽人善操舟者三十六姓移居琉球。此后,不断有华人迁徙进入琉球地区,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思想文化逐渐在琉球传播,对琉球整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琉球古代钱币同样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一脉相承。如长期流通使用中国历代铜钱,仿照中国钱币式样铸造发行圆形方孔的钱币,使用母钱翻砂铸币技术,钱币上也使用汉字等,深受中国古代货币文化的影响。

(一)

琉球群岛(图1)位于中国东南、西太平洋上,距中国沿海的上海、宁波、温州约700多公里。琉球群岛位于中国台湾省和日本九州岛之间,从北到南,包括大隅诸岛、吐噶喇列岛、奄美诸岛、冲绳诸岛和先岛诸岛(统

称“琉球诸岛”),共有大小岛屿60多个。面积约4600平方公里,人口140多万(1985年)。中国古代史书中一直有关于该群岛的文字记载。隋朝时(581-618年),最早称之为“琉虬”。唐朝编纂《隋书》时,为避帝王龙讳,将该地更名为“流求”。宋朝时改称“瑠球”,《元史》又写作“琉求”,有的书中也称“留仇”。到明代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明太祖朱元璋派使臣行人杨载携带诏书出使琉球,诏书曰“朕为臣民推戴,即位皇帝,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蛮夷酋长称臣入贡。惟尔琉球,在中国东南,远据海外,未及报知,兹特遣使往谕尔其知之。”诏书中称其地为琉球,取琉璃玉和珍珠球之意。从此“琉球”成为这片群岛的正式名称,沿用至今。

明初,琉球群岛上共有三个并存的小国家:即中山国、山南国和山北国。明太祖诏谕琉球诸国,琉球中山国察度王首先奉诏,并立刻派遣王弟泰期等随杨载一同来中国,奉表称臣,贡献方物。自此,琉球与中国明朝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继中山王之后,琉球山南国和山北国也先后称臣入贡,与明朝建立了朝贡关系。“由是琉球始通中国,以开人文维新之基”,正式成为明朝的藩属国。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朝政府颁赐中山王察度驼钮镀金银印一枚。又于两年后,分别赐赠山南国王和山北国王印(图2、图3为明清政府颁赐的琉球国王银质玺印)。



图1 琉球群岛地图



图2 琉球国王之印



图3 清政府颁赐的“琉球国王之印”(满汉文)

明永乐元年(1403年),中山王世子武宁遣使讬告明朝,称国王察度于1395年亡故。第二年明成祖即遣使者赴琉球吊祭,赐以布帛,同时诏武宁袭爵,即位新的中山王。此为琉球“始受册封之大典,著为例”。永

乐十三年(1415年)琉球山南王汪应祖世子他鲁每进贡并请求承袭爵位,这是琉球首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册封的请求。同年五月,明成祖遣行人陈季芳等赍诏往琉球,封他鲁每为琉球山南王,赐诰命冠服及钞一万五千锭。从此开始,历代琉球“国王嗣立,皆请命册封”,而明清皇帝也应其所请,派遣官员前往主持册封大礼,从而形成了中琉之间长达数百年的朝贡和册封制度。明清两代,中国政府共册封琉球国王23次。琉球王国成为明清王朝的藩属国,并向当时中国政府纳贡称臣,正式确定了中国与琉球的朝贡宗藩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延续了五个多世纪。在明清两朝500多年间,琉球派人入中国谢封朝贡等多达264次,是同期与中国往来的任何一国都无可比拟的。即使在明朝衰败后,南明唐王即位于福建,琉球依旧遣使朝贡。所以《明史》称赞琉球国:“其虔事天朝,为外藩之最”。自明洪武五年(1372年)以后,琉球王国一直使用中国的年号,奉行中国正朔。直至清光绪五年(1879年),日本强行吞并琉球、“废琉置县”为止。

为了帮助琉球王国发展海上交通,促进中琉之间的朝贡往来,应中山王请求,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明太祖朱元璋“赐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史称“闽人三十六姓使琉球”。赐闽人三十六姓移居海外之举,是中国古代史中绝无仅有的一次由官方派遣的、大规模的中国移民海外活动,充分显示了明政府对琉球的特殊优待。闽人三十六姓移民为琉球王国引进了新的作物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带来了先进的中华文明,对于当时社会生产力还相对落后的琉球王国,无疑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据史载,琉球的“菠菱、山药、冬瓜、薯、瓠之属,皆闽中种而味实不逮。”福建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传入琉球。明初琉球虽为岛国,却不懂得驾舟楫,落后的航海业阻绝了琉球国与外界的往来,导致“东瀛之岛”,“凡十数而琉球最贫”。福建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传入后,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大大地推动了琉球造船、航海业的发展,使琉球一跃而成为以“海舶行商为业”、“以舟楫为万国之津梁”的贸易中转国。福建先进的手工艺技术、农业生产技术、制茶制糖工艺,以及民间习俗如凤狮崇拜、石敢当、端午节、祀灶君公、正月初四接神等风俗等也传入琉球。此后,不断有华人迁徙进入琉球地区,琉球王也经常选派子弟到中国留学。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传播到琉球的每个角落,对琉球整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琉球古代钱币同样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一脉相承。如长期流通使用中国历代铜钱,仿照中国古代钱币式样铸造发行圆形方孔的钱币,钱币上也使用汉字,使用范铸及母钱翻砂铸币技术等,深深镌刻着中国古代货币文化的印迹。

(二)

早期琉球王国经济并不发达,国家经济以鱼牧农业生产为基础,这里盛产甘蔗、甘薯、凤梨等作物,渔业较为发达,国际间的贡品与贸易交流也以当地出产的蔗糖与硫磺为主体。民间的贸易交流还是实行原始的物物交换方式。1923年9月琉球本岛南部城岳贝冢内,曾出土中国战国时期的刀币,说明早在先秦时期,琉球与我国之间就已有了商贸及文化上的往来交流。中国明朝历代皇帝大量颁赐琉球铜钱,以及明清时期琉球王国商贩通过朝贡贸易从中国获得大量中国历代铜钱,中国历代铜钱逐渐成为琉球王国民间贸易使用的主要流通货币。如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出使琉球的册封使徐葆光在其《中山传信录》中的介绍就非常具有代表性:“(琉球)市中交易用钱,无银。钱无轮廓——间有旧钱如鹅眼大,磨漫处或有‘洪武’字,已绝少。今用者如细铁丝圈,一贯不及三、四寸许;贯口封一纸,扣钤记之,散即不可用。每千,值国银二分二厘。其平时皆行‘宽永通宝’钱……国中旧有洪武钱,永乐十一年又赐永乐钱,天顺二年王请照永乐宣德间例,所带货物以铜钱给赐,礼部寝之。本朝又无赐钱之例,故其国少中国钱。”从徐葆光的描述可以得知,明朝政府曾大量赏赐琉球铜钱,琉球王国历史上大量流通使用中国铜钱。至清代,因清朝政府没有向琉球赐钱的惯例,琉球市面流通所需的中国铜钱来源不足,故而流通使用轻薄的自铸铜钱,以及日本的“宽永通宝”钱。

明永乐四年(1406年),琉球中山国佐敷村按司巴志以“中山(武宁)王失德废政”为由,联合山南国等力量,起兵一举推翻武宁王,自立为中山王。1416年巴志征服山北国。1429年巴志又攻灭山南国,结束琉球群岛政权分立局面,以首里城为王城,建立了统一的琉球王国。明宣德五年(1430年),明宣宗派内官柴山为使,正式承认琉球的统一,并赐琉球王巴志“尚”姓,琉球王国进入第一尚氏王朝统治时期。琉球群岛上的早期诸国及统一初期的琉球王国并未铸造发行本国的货币。直到15世纪中叶,第一尚氏王朝中山王尚泰久执政期间(1453—1460年)才开始仿照中国古代钱币式样铸行自己国家的货币。

1456年(明代宗景泰七年),琉球王国大世主尚泰久被明朝皇帝册封为琉球国王。1457年(明天顺元年)尚泰久王开始铸造“大世通宝”铜钱(图4),这是目前所知琉球群岛地区历史上最早的自铸货币。尚泰久是琉球王国第一尚氏王朝第六代国王,神号那之志与茂伊,又称大世主,“大世通宝”是以前神号为钱币名称。“大世通宝”铜钱形制呈圆形方孔状,面文“大世通宝”四字,楷书对读;背平素无文,内外郭线条不十分明显。只见小平铜钱一种,直径在23.3~23.7毫米之间,

重量在4.6~5.5克左右。



图4 大世通宝

其后,尚泰久的第三子、琉球王国第一尚氏王朝第七代国王尚德在位时期(1461~1469年)铸造有“世高通宝”(图5)小平铜钱,流通于琉球群岛地区。尚德是第一尚氏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神号八幡按司,又称世高王。“世高通宝”开铸于1461年,也是以国王尚德神号为钱币名称。面文“世高通宝”四字,楷书对读,钱背



图5 世高通宝

较浅且内外郭不规整。只见小平铜钱一种,直径平均在22.7~23.8毫米,重量平均在3.2~4.1克左右。根据目前所见钱币实物,“世高通宝”钱面文“世”字有大字和小字两种版式。

1469年(明朝成化五年),琉球发生内乱,尚德王被杀,第一尚氏王朝灭亡。群臣拥立前朝旧臣内间金丸为中山王,开创琉球王国第二尚氏王朝。1470年,明朝皇帝册封金丸为琉球国王,称尚圆王。琉球国官修史书《中山世谱》记载:“尚圆王童名思德金,神号金丸”。丸与圆通,金丸亦作“金圆”。1472年尚圆王也以自己的神号为钱文,铸造“金圆世宝”铜钱。面文“金圆世宝”四字,楷书对读,光背无文。目前也只见小平铜钱一种,直径平均在25.6~26.4毫米,重量平均在4.3~5.8克左右。根据目前所见钱币实物,“金圆世宝”钱按面文“世”字写法,可分为两种版式:一种“世”字从“廿”,较为罕见;另一种“世”字内的“廿”字下一横缺



图6 金圆世宝

失,写成三竖二横(图6)。

第二尚氏王朝第三代国王尚真王统治时期(1478~1525年),被认为是琉球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琉球依据明朝制度确立了官员品秩、朝仪制度、神官制度、赋税制度,扩建了首里城,废除了殉葬等陋俗,加强了中央集权,将势力扩张到整个琉球群岛,此后琉球进入稳定发展的阶段。1480年尚真王铸造发行“中山通宝”小平铜钱,直径平均在17.2~17.9毫米,重量平均在2.1~3.6克左右。较前三种钱币轻薄,铸造数量稀少,今存世罕见。

以上四种钱币,总体铸造数量都不多,特别是“金圆世宝”、“中山通宝”铸造数量稀少,实物难见。这些货币随着中琉朝贡贸易往来,少量流入我国沿海地区,如今在福建泉州的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中,就收藏陈列有这类古代琉球王国的铸币。

存世还有“琉球通宝”铜钱,其形制有圆形方孔型和方孔椭圆型两种。圆形方孔型“琉球通宝”铜钱,钱文“琉球通宝”四字篆书,背面有“半朱”两篆字,直径在43.2~43.6毫米之间,重量在34.2~35克左右(图7)。方孔椭圆型钱文“琉球通宝”四字楷书直读,背面穿孔上下有“当百”两字(图8),平均尺寸在33.2×49.8~34.3×49.9毫米之间,重量平均在19.8~23.6克左右。“琉球通宝”铜钱铸造较为精整,存世数量较多,但它们并不是琉球王国自铸的货币。是日本萨摩藩(今鹿儿岛县)岛津氏入侵琉球,为了完全控制琉球王国的经济,彻底将琉球王国纳入萨摩藩势力范围,于1863年在日本萨摩



图7 琉球通宝



图8 琉球通宝当百

藩本土开炉代铸的,运往琉球王国强制流通使用。琉球通宝的铸造发行,是日本阴谋吞并琉球的开始。16年后,1879年(清光绪五年)日本趁当时中国清廷忙于收复新疆无暇东顾,出兵强行吞并琉球王国,并改其名为冲绳县,主权独立的琉球王国至此成为历史。存世的“琉球通宝”铜钱,成为了日本野蛮侵略吞并琉球王国历史的铁证。

(三)

古代琉球王国的自铸货币,其形制、钱文、材质、铸造工艺全部仿照中国古代钱币,深受中国古代货币文化的影响。

首先,琉球王国古代铸币形制全部仿照中国钱币,也呈圆形方孔状。中国早期钱币如刀币、布币、环钱、贝币等,形状独特,各有千秋。自秦并六国、废止六国旧钱、独行“半两”钱后,圆形方孔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流通货币的主要形制,沿用了2000多年。琉球王国也长期流通使用中国的方孔圆钱。琉球王国自行铸造的“大世通宝”、“世高通宝”、“金圆世宝”、“中山通宝”钱,皆呈圆形方孔状。甚至日本萨摩藩代铸、强制琉球使用的“琉球通宝”钱也是圆形方孔状的,否则将会受到琉球百姓抵制,难以流通使用。

其次,琉球王国古代铸币也使用汉字作为钱币纹饰。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钱币文化与西方钱币文化显著区别在于,西方钱币纹饰以人物头像等图案为主,中国钱币纹饰以文字为主,钱文书法丰富多彩。琉球王国的官方文书、外交条约、正史等,都是用汉文书写的,铸币也采用汉字作为钱币纹饰。“大世通宝”、“世高通宝”两钱币直接摹仿明代“永乐通宝”(图9)钱,钱文“通宝”二字与“永乐通宝”钱文如出一辙。而“大世”、“世高”二字字体特别硕大古朴,与“通宝”二字明显不和谐。推测这两种钱可能是以明朝“永乐通宝”钱为蓝本,将“永乐通宝”钱的面文“永乐”二字移去,添加上自行设计的“大世”或“世高”字样,制成“大世通宝”、“世高通宝”母钱,而后翻铸出流通钱币。

第三,琉球王国古代铸币沿用了中国钱币的宝文钱制。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621年)废除五铢钱,铸行“开元通宝”钱,以“通宝”两字名钱,一改先秦以来以重量名钱的铢两钱制,开创了中国圆形方孔钱以通宝、元宝、重宝相称的宝文钱制时代,遗风绵延了1300余年。琉球王国古代铸币沿用了宝文钱制,也以“宝”字名钱,有“通宝”、



图9 永乐通宝

“世宝”等,这是琉球古代钱币深受中国钱币文化影响的又一具体表现。

第四,琉球王国古代铸币也以普通金属铜为铸币材料。不同于古代西方钱币以金银等贵金属作为主要币材,中国古代钱币多选用铜、铁、铅、锡等普通金属铸造,当然也有少部分采用金、银等贵金属,但这些都是王公、贵戚用作赏赐之物,或政府作大额支付之用,不作为普通流通货币使用。琉球王国古代铸币也全部采用普通金属铜作为铸币材料。

第五,琉球王国古代铸币也采用翻砂铸币工艺。就古代铸币技术而言,西方钱币以打制为主,中国则以浇铸为主。中国早期铸币采用钱范(如铜范、石范、泥范、陶范、铁范)铸钱法,从唐朝开始,钱币制造逐渐过渡到采用先进的翻砂铸钱法。琉球王国古代铸币也使用中国古代翻砂铸钱工艺。如琉球历史上最早的自铸货币“大世通宝”铜钱就是在明朝技术人员的指导下铸造的。此事见载于朝鲜李朝《世祖实录》:琉球“所兴用者钱货,然不知铸成之法,皆得于中原而用之。丁丑年(1457年)中原人始来教之,十文准米一升”。这里的“中原”就是指中国。琉球王国还专门派工匠到福州学习翻砂铸钱技术。如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琉球第二尚氏王朝尚贞王派留学生“蓄懿德入闽学铸钱之法”,归国后,“至丙申年为铸钱主取铸出鸠目钱十一万贯”。

存世的古代琉球王国自铸货币,客观真实地记录和见证了明清两朝500多年间作为藩属国的琉球与中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对古代琉球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 [1](明)严从简.东夷·琉球国[A]//殊域周咨录(卷4)[M].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据万历刊本排印,1920.
- [2](清)张廷玉.明史(卷324,外国4)[M].中华书局,1974:8361.
- [3]明太宗实录(卷28)[M].永乐二年三月壬辰.
- [4]中山世谱(卷3),伊波普猷等编.琉球史料丛书(第4)[M].东京美术刊,日本昭和47年.转引自赖正维.康熙时期的中琉关系[M].海洋出版社,2004.
- [5]明太宗实录(卷164)[M].永乐十三年五月乙酉.
- [6](明)高岐.考异[A]//福建省舶提举司志[M].民国28年铅印本:28.
- [7](清)张廷玉.明史(第28册,卷323)[M].中华书局,1974.
- [8](清)龙文彬.琉球[A]//明会要(第77卷,外藩1)[M].中华书局,1956.
- [9]赖正维.黄珊.闽人与琉球[J].福建史志,2002,(4).
- [10]凌波.福州技术沿海上海丝路传扬海外[N].福州晚报·海外版,2014-10-27.
- [11](清)周煌.琉球国志略(第10卷)[M].丛书集成初编本.
- [12](日)安里延.日本南方发展史[M].三省堂刊行,日本昭和16年:381.
- [13](日)新屋敷幸繁.新讲冲绳一千年史[M].雄山阁,日本昭和46年:214.
- [14](清)徐葆光.中山传信录[A]//台湾文献丛刊第306种[M].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1972.
- [15]球阳研究会编.球阳[M].角川书店,日本昭和57年:259.

顺治珍钱三品

黄定学

2016年8月,佟昱先生新著《新编顺治通宝钱谱》(以下简称新谱)已由中华书局出版,根据新谱的定性定级,本人把最近几年收集到的三枚顺治珍稀版别钱介绍给大家,供顺治钱爱好者研究和参考。

本文按顺治钱分类原则先后排序,逐一介绍。

一、上工

顺治“上工”是顺治钱中的名誉品,名列顺治20名珍之二,存世量极为稀少。为清政府工部南京宝源厂铸造,开铸时间约为顺治8年4月,且铸期极短。至今全世界仅见7枚,其中6枚在国内(上海博物馆藏1枚),1枚被外国人收藏。

性质。根据《新编顺治通宝钱谱》,隶定为试铸样钱(图1)。



图1

直径。直径25.2毫米,厚1毫米,重3.5克。从目前所见5枚来看,4枚为小样,只有1枚大样。

来历。是品属从日本回流,华夏古泉网拍品,当时拍卖价28,875元,加上手续费31,000余元,河北一藏家原藏,佟昱先生鉴定。

特征。尔宝光背版等川顺单点通面文,薄肉,有大小样、阔缘狭缘之别,此品为小样,阔缘版,背左上角微决。传世品,黑地章,铜质细润,铸工精良,与工部南京宝源厂较高铸造工艺水平一致。

收藏经过。2003年,确定以顺治钱作为收藏和研究的专题。那时候,还没有专门的顺治钱谱,而只有一部华光普的《中国古钱目录》,该书“下册”共收录顺治钱90种,其中上工等级标注为五级,与上荆、上蓟、左延一样,看不出其珍稀程度。但是,也在收集之列。当时,河南许昌有位收藏家,收藏上工和右延各一枚。从2003年起,我每周给他打一次电话,问这两枚钱卖不卖,得到的回答总是二个字:“不卖!”到了2005年8月10日,在电话询问“不卖”后,把预留的钱订购了其它

种类钱币。时隔一天,突然来了“卖”的电话,可这时却没有财力了。请求宽限一晚,协商无果,第二天早晨,盯了近3年的上工还是飞了,说明此钱与我无缘,终于擦身而过。

时间过去了10年。2015年7月,佟昱先生透露,河北那位藏家的顺治上工意欲出让。在家人的支持下,本人终于以善价购得此钱。

顺治“上工”是一枚尚在不断成长中的顺治珍稀钱。2006年12月,佟昱先生著《顺治通宝钱谱》出版,将顺治“上工”等级定为“一下”,该书把顺治钱等级划分为五等十五级,“一下”相当于“新谱”十级制的二级。“新谱”实行十级制,每级再分上下两档。“上工”在新谱中的等级进一步上升,被定为“一上”,属于最高等级。

顺治“上工”由于位列名珍,存世稀少,求之者众,搜集不易,故价格一路直线上升。

收藏价值的高低采用星级制,五星最高,无星级则最低。每枚钱的收藏价值的星级标准与《新编顺治通宝钱谱》的定级相对应。

上工收藏价值:五星级。★★★★★

二、右同版右延

延绥钱局开铸于顺治三年六月至四年四月,铸期仅10个月,所铸左右背“延”字钱版别虽多,但存世量均少。其中右延分三种类型:标准版、瘦页狭治光背版、右同版。其中标准版存世略多,所见约20多枚;右同版其次,目前仅见7枚存世,其中一枚为外国人收藏,是2011年在大同发现的新版。瘦页狭治光背版最少,至今仅两见,但都为外国人收藏。其中德国人布威纳编《清钱编年谱》上著录1枚,未见实物;另一枚为新加坡景福斋主人所藏。右延在顺治钱20名珍中名列第六。

关于右同版右延的铸地和铸期。因为采用了大同钱局的面文,属于混配版,背延字写法也与其它背右延写法不同,因此,其铸地和铸期尚需进一步研究。

性质。珍稀制钱(图2)。

参数。直径25.4毫米,厚1.25毫米,重3.6克,应为小样;《新编顺治通宝钱谱》著录1枚北京某藏家藏大同坑大样,直径26.2毫米;拙著《顺治钱百珍》著录湖北某藏家1枚生坑,直径25.7毫米,当然就是正样了。



图2

来历。此枚顺治右同版右延,可称得上是名家旧藏,流转有序。原为台湾鸿禧美术馆旧藏,共两枚,后归新加坡景福斋主人,2011年5月23日,景福斋主人将其中两枚之一(即此品),委托华夏钱币网拍卖,成交价为37,275元,为某藏家所得;过了几年后,又在华夏古泉网重拍一次,为河南省驻马店市某藏家拍得,一直珍藏至今。近期,因为购房,出让藏品,遂为本人购得。

特征。此钱正面狭缘,背阔缘细郭,右同版面文,背右直走延,黄铜,传世品,黑漆古包浆,间少量红绿锈,直边,基本未流通,钱文清晰,器形完整。

收藏价值:四星级。★★★★

三、上下一厘·东

顺治“上下一厘·东”是山东省局铸造。开铸和停铸时间,历史文献有较清楚的记录。佟昱先生在新著《新编顺治通宝钱谱》中引用了当时的户部奏本:“根据车克题‘进验新式样钱并请旨颁发事本’记载:顺治十年九月,山东省局开铸顺治背东一厘钱。停铸时间为顺治十年。”“上下一厘·东”分阔厘版和狭厘版两种版别,此为阔厘版。从目前所见实物看,阔厘版存世量略多于狭厘版。

性质。“上下一厘·东”是山东省局的试铸样钱。其背文由于体例特殊,与其它一厘钱不同,因此,未获正式发行。《新编顺治通宝钱谱》定级为:一下。名列顺治钱20名珍之四(图3)。



图3

参数:直径26.2毫米,厚1.4毫米,重4克。与上海博物馆所藏一枚“上下一厘·东”同版别直径相同。“上下一厘·东”还有大小样之别,此品为小样。

来历。《新编顺治通宝钱谱》原品钱,佟昱先生旧藏,2014年10月惠让。“上下一厘·东”实物所见,数枚而已。其中上海博物馆馆藏1枚,新加坡景福斋收藏1枚,北京佟昱先生收藏1枚,2016年4月13日华夏古泉网拍卖1枚,下落不明,再加此枚,总共5枚。

特征。“上下一厘·东”面文为尖头通东一厘版,背穿上“一”字,起笔肥,穿下“厘”字,左边一撇外张,称之为阔厘,反之,则为狭厘。狭缘细郭,穿郭方正;铸工精良,铜质细润;生坑薄锈,字郭深峻;鱼脊边,基本未流通。

“上下一厘·东”由于形制独特,造型精美,钱文生动,存世稀少,受到钱币收藏家的喜爱。在2016年华夏古泉网春拍中,其中一枚生坑钱以116,640元成交。

收藏价值:五星级。★★★★★

(上接第46页)其五福的吉祥寓意。图38就是一枚呈五瓣梅花形状的古代理俗钱币,青铜材质,在梅花的五瓣中各铸一个汉字,连读为“长命守富贵”,传递出对长寿富贵生活的渴望和祝福。中国人民银行也铸造发行了多套梅花形状的贵金属纪念币,如1993年开始发行的两轮生肖金银纪念币,每年都有出现梅花形状的生肖纪念币(图39),寓意吉祥,深受喜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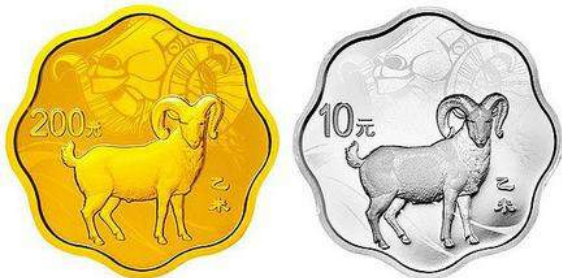


图39 梅花形生肖纪念币

此外,历代还铸造了蝴蝶、鱼、古代钱币(布币、刀币)、钱树、钱剑等独特形状的异形钱币,以其形象的造型、象征的手法来表达吉祥幸福的美好祝福。

福文化是中国民俗吉祥文化的主要内容,而钱币是承载表现福文化的重要载体,钱币上的福文化可谓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异彩纷呈。历代铸造发行的蕴含福文化内涵的钱币种类繁多,表现方式多样,深刻表达出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吉祥幸福的祈盼,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关注生命、向往美满生活、追求实现自身价值的人生百态,值得我们收藏玩味。▲

注:本文附图来自网络,谨向收藏者及作者致谢!

蕲州钱监满地金

曲 毅¹ 段涛涛² 刘斌荣² 郑 飞²

(1.黄石博物馆; 2.蕲春博物馆)

2013年夏天,湖北省黄冈地区蕲春县蕲州镇修建湖滨大道,村民在三号路与昭化寺相交路段的施工现场及周边弃土中挖掘到许多瓷片和钱币。2013年9月22-23日,我们前往蕲州镇调查,在施工路段的路边堆积中,可以见到不同时期的瓷片、钱币和其它零散文物。综合来看属于宋、元、明、清遗存。现将当时采集到的部分标本和相关调查做一简单介绍。

一、地理位置与出土遗物

大量遗物出土的地方,隶属于蕲春县蕲州镇红石头村辖地,地形东北面是缺齿山南麓,西北面为昭化寺,南面棉纺厂排污池,西至红石头村,这一范围的小地名叫铁炉冲,遗址现存面积大约为1万平方米。

出土遗物主要是宋、元、明、清代瓷片和北宋铜钱、南宋铁钱、坩埚、兽骨、最常见为夹有木炭的铁锈块和炼渣等。好的瓷器瓷片及铜钱铁钱,大多被附近村民拣去,有的已经流入藏家手中。据当地村民介绍,修路中曾挖达3米余深的淤泥中,仍然有大量的炼渣和钱币出现。在蕲春博物馆收藏的标本中,我们见到零散浇铸中带流的铁钱,其中主要为绍熙通宝和淳熙通宝折二背春、背一至十二的铁钱。宋代瓷器常见窑口有湖田窑、磁州窑、建窑、吉州窑、定窑、哥窑等。釉色有青白、甜白、象牙白、豆青、油滴、影青瓷等。釉陶有青、褐、酱红色等。无釉的素面夹砂以小型坩埚常见。明清以后青花瓷片不多。主要器物有碗、盆、碟、壶、罐、盏、盖、钮等等。



图1 蕲州铁炉冲遗址采集带流铁钱



图2 蕲州铁炉冲遗址采集背“集春”三铁钱



图3 蕲州铁炉冲遗址采集“绍熙通宝”折二铁钱

图4 蕲州铁炉冲遗址采集“绍熙通宝”折二连二铁钱



图5 蕲州铁炉冲遗址采集瓷片

调查中据说,还有一个铁钱锈蚀大块,约数吨重,在一村民家中地下埋藏。

以上大量的遗迹和出土器物,可以证明铁炉冲是一个铸造钱币有关的遗址。尽管明清以后这里曾是蕲州十里长街的一端,庙宇、商业、交通、轮渡曾经很繁荣,但是,一般的生活和商业遗址都不会形成大量的木炭和炼渣交织混合堆积。冶炼遗址炼渣通常都是比较纯的炼渣堆积,也没有这种交织混合渣的现象。特别是这里发现的铁锈、铜锈夹杂的木炭渣块,坍塌和带流口铁钱的现象,都是铸造工艺中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完全证明这里应该就是一处铸造钱币的遗址。

二、蕲州钱监的建立、罢铸、兴废时间

蕲春钱监是历史上很有地位很有影响的一个钱监。其建造年代和具体位置都有学者做过考据。

徐达元先生认为:“蕲州钱监初置于北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到南宋初期,‘建炎经兵,鼓铸皆废’,蕲春监也停止铸钱”。北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至南宋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计有97年不见记载空白。怕不是“建炎经兵,鼓铸皆废”一笔带过的,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举证。

一般学者都认为蕲州钱监建于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宋史·志第一百三十三·食货下二》明确记载:“诏司农丞许子中往淮西措置。于是子中以舒、蕲、黄皆产铁,请各置监,舒州同安监,蕲州新春监,黄州齐安监。子中所领三监,岁合铸三十万贯,其大小铁钱,令两淮通行。七年,舒、蕲守臣皆以铸钱增美迁官”。开铸一年,乾道七年舒州同安监和蕲州新春监的官员还因为铸钱精美,而得到升官的奖励。

蕲春钱监后经过三次罢铸。第一次是淳熙二年正月,朝廷令蕲州新春监停铸四年。

第二次是嘉泰三年七月,停铸2年。

第三次是宝庆二年,原因无明确记载。陈浩先生引用管意斌的观念认为:“宝庆二年三月‘蕲州火’,有人因此推测,蕲春监肯定在这次大火中遭受了较为严重的灾害,无法在当年恢复鼓铸,直至次年才重新铸钱”。因失火,导致铸币厂停工,不到一年即恢复生产。

第四次停工,也就是蕲州新春监倒闭的时间,一般都认同推测在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稍后)。这一年发生的大事是农历正月初十,——南宋与蒙古联军联合攻克蔡州,金朝灭亡。

第三次停铸原因,根据“蕲州火”的推测,本人觉得还是有些问题,蕲州城当时是指宋罗州城,位置是现在蕲春县(原漕河镇)的北面3里处。蕲州新春钱监在蕲口镇,即现在的蕲州镇红石头村,按今天的距离测算,二地相聚约25公里,来回要三天。县城大火应该与蕲州钱监没有关系,哪怕后来蕲州钱监停铸,也就是整个厂子都倒闭了之后,蕲春县城在“宋景定四年(1263年)癸亥,安抚使王益,迁麒麟山,创今城,西临大江”。

南宋后期的蕲州县城才从罗州城搬迁到蕲口,这个时候蕲州钱监都已经倒闭快三十年了。更何况新搬来的县城距离钱监还有四五里路呢。因此,第三次停铸应该与失火无关。

蕲州新春钱监从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建立,到理宗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结束,其间共计64年。

三、蕲州新春钱监的准确位置

蕲州新春钱监的具体位置,根据大量出土文物,可以证实红石头村的铁炉冲,北纬:30°4'49.97",东经:115°20'43.19",海拔29米。就是准确的钱监遗址。过去考证的人也不少,首推张或定等《南宋蕲州蕲春监地址考》一文,推定详尽:“宋代蕲春监地址,在原蕲州蕲口镇,今蕲州镇昭化寺附近地区,其具体位置在,缺齿山以南,沿市湖以北,所限定的方圆不大的地区。也就是说,宋代蕲春监旧址,在今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红石头居委会辖区及附近地区”。这一区域正是我们本次调查和蕲春钱监出土大量遗物的位置。文章发表于2007年,我们调查时间是2013年。本次调查证实了张或定等关于蕲春钱监地址考证精准,分毫不差。

有关蕲州新春钱监地址的确定,还有一个好处。文献本来是考据的,由于大量、浩瀚,杂乱的文献,需要寻找、分析、辨别、整理、才能确定用于考据,还常常很难精准。钱监遗址的精准确定后,我们可以反推遗迹关系,如:缺齿山的缺齿,就是山被挖去一块形成缺口。缺齿山和红石头村附近,地质形态上都出产一种特定的红砂岩,这种风化的红砂岩,他的粗细程度,和其中的含高岭土成分,都是极好的翻砂原料。在这里建立钱监,一个是水运交通方便,更重要的是就地可以有翻砂的原料——细红砂岩。这种细红砂岩,是铸钱翻砂必中不可少的原料,比如现在的鄂州市青铜范铸工厂,购买的细红砂岩是从南京购买的。我们设想,哪怕蕲州钱监,每天只要2板车红砂岩用来铸造钱币,那么六十年在这里挖去红砂岩,这里就会被挖成一个缺口,缺齿山就是这么形成的。

元朝,由于这里是蕲水入长江河口,又叫挂口,曾建立的蕲口镇,后可能改为蕲阳镇,元朝在这里设立了巡检司一级的衙门机构驻扎。

元末,农民义军徐福通部将,在蕲春钱监北边缺齿山建立了吕王城。

明宪宗成化初,僧悟空在此结草为庵;1471年,蕲州荆宪王把这里定为荆王府家庙。捐金,僧智明主持,就庵建寺,一进四重,规模宏大。整个建筑占地五十余亩,内供佛像百余座,殿内石雕香案和石柱石梁上雕刻的龙、凤、花、鸟,栩栩如生。寺庙佛像及所有梁柱均由石料制成,技艺精湛,无比壮观。整个庙宇叠压在遗址之上。清代经过重修,文革庙宇败落,改革开放后在这

顺治钱风景这边独好

黄定学

摘要:随着经济增速进入新常态,钱币市场也进入新一轮低谷。但是,在清钱中,由于顺治钱是清朝的开国制钱,是对前朝古钱扬弃的产物,是中国钱币文化中不同民族钱币文化互相融合的较好范例,无论从历史地位,理论研究的成熟程度,还是从收藏价值及市场表现看,顺治通宝钱都可以说是风景这边独好。

顺治钱是清朝的开国制钱,是对前朝古钱扬弃的产物,是中国钱币文化中不同民族钱币文化互相融合的较好范例,其满汉钱文的制式,影响了清代几百年。无论从历史地位,理论研究的成熟程度,还是从收藏价值及市场潜力来看,顺治钱都是清钱中一道美丽的风景。尤其从近期市场表现看,顺治钱是风景这边独好(图1)。



图1

一、顺治钱和咸丰钱之比较

在清朝历代钱币中,前三朝的钱币是铸造得最好的。至咸丰朝,由于财政困难,铸行虚值大钱,造成钱制大乱。但也给后世留下了集藏钱币的乐趣。从近十年来市场交易情况看,咸丰大钱的“温度”要大大高于其它清钱。原因何在呢?

第一,历史原因。1937年黄鹏霄著《故宫清钱谱》,著录顺治钱5种,咸丰钱150余种。1940年丁福葆著《历代古钱图说》,从历代古钱币拓图在该书中所占比重,就可以明显看出前人研究和收藏古钱币的价值取向。其中先秦钱占19.3%,近五分之一;而清钱则只占15.1%。在清钱中,咸丰钱占该书篇幅8.8%;顺治钱则只占1.1%。从该书的拓图质量和当时的市场价格来看:顺治钱的拓图大多数只有背图而没有面图,其中有9图并非原拓,有6图至今未见实物。这说明,顺治钱的收藏和研究旧时并不为人们所重视;咸丰钱不

里原有的基础上,又重建大雄宝殿。2013年修建的庙宇前水泥大道,将遗址再次叠压。

蕪州县城后来元明清继续沿袭直到解放初期,1949年,蕪春县才又迁回到现在的漕河镇位置。

元明清的蕪州县城位置基本可以确认,蕪州新春监铁炉冲遗址可以确认,地图上准确的标明,这是最直观也是最准确的标记,可以校对各种杂乱的文献记载。

例如:“废蕪阳镇巡检司,在吕王山下之昭化寺之前,今储水处,产莲中央墩阜,即其遗址”。

“蕪春监孝宗乾道六年设置时,同时设置了铁冶场,在百冶山(亦名白望山),今蕪州镇赤东村洪湖口白李下山。土名鸭婆水”。

这里我们也去调查过,与铁炉冲丰富的文化层比较,那里几乎看不到木炭和炼渣,可谓不毛之地。

四、结语

蕪州新春钱监遗址是十分重要的遗址,而且其文化层还有元明清遗迹单位叠压关系。无论经济地位,铸造技术,城邦军事,宗教事物,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义,关键还在于历史文献可以相互印证的绝好单位。由于保护不善,破坏严重,特别是修路,建房,毫无顾忌。最近还有无知之辈网上呼吁在此建立公园,供认休闲。本人在2013年至2016年11月间,多次前往红石头村,见遗址区域正在大量填土。殊不知,在当年的水塘,沟、港正是遗址的中心区域,其中有大量遗物存在。这样明目张胆的毁坏遗址,可以说是一种无知。关键是竟没有任何人来承担责任,这真是文物保护的悲哀。

习近平最近还强调说:“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蕪州钱监遗址满地金,遍地是宝,文物俯拾即是,宋元瓷片成堆,希望能切实保护到位。▲

[参考文献]

- [1]徐达元.南宋蕪州钱监及其铸钱考证[J].安徽钱币,2005,(4).
- [2]明·嘉靖蕪州志·沿革[M].
- [3]张或定等.南宋蕪州蕪春钱监地址考[J].武汉金融,2007,(12)增刊.

仅所占篇幅大,而且拓图完整,钱谱标价也大大高于顺治钱。当时顺治上户、上工、上薊的价格才标5分钱,右延标价3元,标价最高的是顺治十一两,标价15元;而咸丰钱戴书五文则标价二百元。这说明,当时总的情况是:在历代钱币中,人们是重古代钱,轻清代钱;在清代钱中,又比较重大钱而轻小钱(图2)。



图2

第二,现实原因。其一,咸丰钱的理论研究明显走在其它清钱前面。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钱币的收藏和研究开始出现又一次高潮。1991年1月上海出版的《简明钱币辞典》,共著录咸丰钱255枚,顺治钱74枚;1994年上海博物馆编的馆藏钱币中,元明清部分共收录咸丰钱484枚,顺治钱只收录了107枚。同年9月,清钱巨著《咸丰泉汇》出版,共著录咸丰钱4千余种,版别宏富,无人可及。但这些钱谱印数不多,也有些贵,一般人难以见到。直到1998年5月华光普编著的《中国古钱目录》出版,该书“下册”共收录顺治钱90种。此书印数3万本,价格37元,当时很多人都以此作为收藏顺治钱时的参考。随着顺治钱收藏的热度不断升温,2006年12月,佟昱先生著《顺治通宝钱谱》(以下简称旧谱)问世,这是中国人编的第一部专门研究顺治版别钱的专著。该书共著录顺治版别钱585枚。由于这本书的出版,把顺治钱的理论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但是,《顺治通宝钱谱》的问世比《咸丰泉汇》毕竟晚了十二年!十二年的理论普及和对钱币研究与收藏的影响所产生的累积效应是巨大的。这是咸丰钱比顺治钱略占先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咸丰钱的“高温”得益于先发效应。当收藏顺治钱还在为钱谱发愁时,咸丰大钱在市场上的先发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并逐渐放大,从而形成一股咸丰热。喜欢咸丰大钱的人越来越多,供求开始失衡,市场价位节节上升。早期介入咸丰大钱的群体得到了高额的先发回报,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咸丰大钱的“温度”。其三,国际市场需求旺盛。马定祥先生是国际公认的钱币大师,他耗费毕生心血来研究和收藏咸丰钱,在国际上有着广泛影响,同时也推动国际市场上对咸丰钱需求量的大大增加,如新加坡某收藏家就陆续收藏了大量珍稀咸丰钱。

第三,咸丰钱的成长上限。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可能面临成长上限。就同一定面积和水深的鱼塘只能养

一定数量的鱼一样。如果鱼塘的容积不增加,鱼的数量却无限增加,过多的鱼就会因缺氧而死亡!

咸丰钱的成长上限在那里呢?

其一,资源已近枯竭。很久以来,咸丰大钱已难见有成批大量生坑钱出现了。而顺治钱近些年却常有数千至数万枚的生坑钱面世。所以,在咸丰大钱的交流中,熟坑多,熟面孔多就不足为怪了。

其二,市场供求紧张。在咸丰大钱中,不仅珍稀钱难见,而且连低端好品相的也难得一见了。买钱难,已成了收藏者的共同感慨。

其三,价位高不可企,令人望而却步。在咸丰钱中,最贵的钱,已进入百万元级别了,单枚钱币价格超过5万元的也已经不少。当单枚钱币价格一旦超出钱币收藏的主体一中产阶层购买能力之时,其市场就会变得相对狭小,面临销售瓶颈。在今后不长的时间里,很多咸丰大钱,都将面临成长上限。而顺治钱则还有较大成长空间。

其四,版别众多,难以企及。咸丰钱版别仅《咸丰泉汇》就著录4千余种,而在咸丰钱的市场交易中,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些被交易的钱能在《咸丰泉汇》中找到同版的极为少见,如白铜咸丰宝川当百就是一例(图3)。



图3

这说明,咸丰钱版别远远不止四千种。可以想见,以搜集全咸丰钱实物或拓本彩图作为版别钱研究的对象,是一个无比艰难的任务。而《咸丰泉汇》则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所以,现在的收藏家们,多以单个咸丰钱局版别钱为收藏专题了。

其五,伪品多,鉴别难。咸丰大钱的造伪,很早就有了。旧时北京就有仿铸咸丰大钱的专业户。咸丰大钱因钱体大,仿铸难度相对较小,因而伪品也较多。大多数人难以接触多种多样的实物,鉴别不易。“吃药”的概率也大,增加了收藏和投资的难度。

由此可见,由于咸丰钱版别太多,资源相对紧缺,价格高涨,玩咸丰钱,对于大多数中低收入者来说,是不可持续的选择,也并非明智的选择。

如果改变一下思路,情况或许就会改变!

二、对顺治钱一见钟情的十条理由

清代钱币在历代古钱币中,由于去时不远,存世量

也相对较多。而顺治钱在清钱中不多不少的存世量,纲目清晰的理论体系和良好的研究氛围,版别丰富而又新品层出不穷,市场上日益良好的表现和巨大的增值潜力,都使其为钱币界所钟爱。

1.清钱老大,开篇之作。顺治钱在清钱中处于龙头老大的地位,是清代制钱的开篇之作。具有“扬弃传统、融合文化、创立新制、影响后朝”的重要作用。如其背满文和满汉文纪局式的形制,一直影响和沿用至清末。

2.铸期不长,存世偏少。顺治钱只铸造了短短十七年。当顺治元年(1644)顺治皇帝在北京宣布立国之时,明朝残余势力的抵抗仍在继续,战争尚未结束。全国最重要的铜原料产地也未被清政府所完全控制,铸钱成本较高而无利可图,成为一些地方钱局向中央政府要求停减炉甚至停止铸钱的理由。因此,顺治钱的铸造量同康熙、乾隆钱不可同日而语。

3.铸工精良,工艺精湛。首先,顺治钱从形制上一扫明末崇祯钱轻、薄、劣、小的弊端,结束了铸钱管理失控的混乱局面,使钱币的铸造做到了集中、统一、规范。其次,作为黄铜钱,顺治钱的冶铸水平较之明钱又有了较大程度提高,合金成分有了较大程度改善。其三,铸造工艺水平较高,钱形规整,铜质细润,轻重大小符合当时国家法定标准。看起来悦目,玩起来怡情,藏起来美心(图4)。



图4

4.“式”“类”纲目清晰,品种版别丰富。顺治钱的体系,称之为“式”、“类”、“版别”,纲目非常清楚,版别极为丰富。目前所见,新谱收录版别钱有一千余种,而谱外尚还有不少的出谱钱。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存世稀少而又珍贵的各种混版钱,成为顺治钱中一大新的亮点,对收藏和投资者具有极大吸引力。使他们“欣喜若狂,寝食不安;如痴如醉,心神不定;一掷千金,囊空如洗”。

5.资源尚有潜力,新版不断发现。2002年,辽宁省绥中县发现了一大批顺治钱,其中就有缶宝右户、右工、右同等珍稀版别。2011年山西大同又发现了3万多枚顺治钱,其中除左延,大明上工版等稀少版别外,还出现三枚右临版光背、光背版长顺、右同版右延等新版,令人耳目一新,并引起了顺治钱爱好者的追逐。根

据笔者所见,每年新发现的新版顺治钱,约在20枚左右。资源潜力同时也提升了收藏和市场潜力。即有可能出现,有可能收藏,也有可能捡漏。这也是收藏顺治钱的吸引力之所在。

6.私铸不多,伪品较少。在钱币市场刚放开时,在清代钱币中,顺治钱的伪品相对较少。究其原因:一是旧时收藏者并不重视清钱,对顺治之类的小制钱尤甚。二是钱小价廉,造伪者利薄或无利可图。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一枚咸丰星月当千大钱15元都卖不动,何况小小的顺治钱呢。三是钱币研究和收藏以前尚未进入到版别阶段,珍稀版别并不为人们所认识,更别说伪造了。四是当代铸造的伪钱,所见大多数尚未达到顺治钱的铸造工艺水平。私铸钱虽有,但数量较少。

7.市场价位适中,升值潜力巨大。顺治钱普品目前市场上单枚价格一般几十元一枚,在清代的小平钱中,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四级以上的稀少版别,大多几千元一枚,也在当前钱币收藏主体——中产阶层的承受力之内。根据一些泉友的收藏记录,最近十年顺治钱的市场价,上涨了约十倍,增值率大大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息和一般清钱水平。顺治钱的巨大增值潜力,既吸引了大批收藏者,也吸引了不少有眼光的投资者。

8.理论研究较为成熟,版别知识逐渐普及。顺治钱的理论研究,在清钱中有较好的基础,“五式”分类提出较早,外国人也进行过一些版别的先期研究。特别是2006年12月佟昱先生《顺治通宝钱谱》和2013年10月由湖北钱币研究丛书编委会主编的《顺治钱百珍》出版以后,把顺治钱的理论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版别知识广泛普及,收藏热度不断上升。不少专业钱币网站都专设了“顺治论坛”,学术氛围浓厚。而2016年8月佟昱先生新著《新编顺治通宝钱谱》(以下简称新谱),其理论研究部分攻克了早期顺治钱铸期与铸地等诸多难关,是这本书最为出彩的部分。从而扫清了顺治版别钱研究和收藏的障碍,进一步提升了顺治钱理论研究的影响力,引爆了已经充分预热的顺治钱市场(图5、图6)。



图5



图6

9.理论研究仍有较大空间。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和空前规模的基本建设以及大量的考古发掘,使顺治钱的潜在资源变成了现实资源,富矿时有发现,顺治钱无论是数量和品种都处在不断更新之中,新的研究课题也在不断出现。比如随着新的出土和发现,有些顺治版别钱的成因和铸地问题仍有重新认识之必要。因此,现在取得的成果不是顺治钱研究的终结,而只是开辟了继续通向新的成功的道路。

10.收藏队伍日益扩大,美丽风景快速成形。自从1986年钱币市场开放以来,由于顺治钱铸行的特殊背景,满汉文化融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巨大,钱币界对顺治钱在清钱中的历史地位的认识有了较大提升。因此,喜欢顺治钱的人越来越多。一是有权威的理论专著,可买、可读、可学,而且研究尚在继续深入,理论研究的生命力构成了顺治钱的第一道美丽风景;二是收藏者日众,队伍不断扩大,有文化有知识有实力而又眼光敏锐和独到的青年人团队,构成了顺治钱的第二道美丽风景;三是珍稀版别钱风光无限,构成了顺治钱的第三道美丽风景。

由于上述理由,研究清钱,不能不研究顺治钱;收藏清钱,不能不收藏顺治钱;投资清钱,也不能不投资顺治钱!

信不信由你!

三、顺治钱风景这边独好

最近十年来,没有人宣传,也没有人号召,但顺治钱在清钱中已渐成领军之势,这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清钱中就数顺治钱风景这边独好呢?这是因为顺治钱的亮点颇多。

1.理论新成果。近十年来,关于顺治钱研究的学术论文,在省级和国家级刊物公开发表的,超过了15篇,特别是《新编顺治通宝钱谱》的出版,将顺治钱的理论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2.版别新发现。根据作者按可比口径逐枚统计,《新编顺治通宝钱谱》共著录顺治版别钱1,095枚,取消了2006年版《顺治通宝钱谱》中“上南、上同”等不确定版别17种,数量比2006年版《顺治通宝钱谱》的568枚(减去不确定版别17种后的实数)增加了527枚,占新谱总数的48.13%,其中四级以上珍稀钱新增了136枚,占新增版别钱的25.8%。从新增版别钱的构成看,一是珍稀版别钱在数量上有较多增加。如背二,新增了18枚,是旧谱的300%;再如背延,新增了29枚,是旧谱的241.7%。这反映了近年来顺治珍稀钱收藏的总体水平。二是新版别钱不断有新的发现。如异书治(版别名称,下同)、长顺、单汉字版光背,背双户、新版右荆、新版东一厘、新版江一厘等。三是属于20名珍大名誉品的数量又有新的发现和增加。如尔宝版右大

圈增加了3枚,缶宝右户增加了4枚,上工增加了1枚,缶宝右同增加了2枚,右延增加了5枚,尔宝版上东增加了2枚,上新增加了4枚,江一厘版满汉河2枚,满汉福2枚等等(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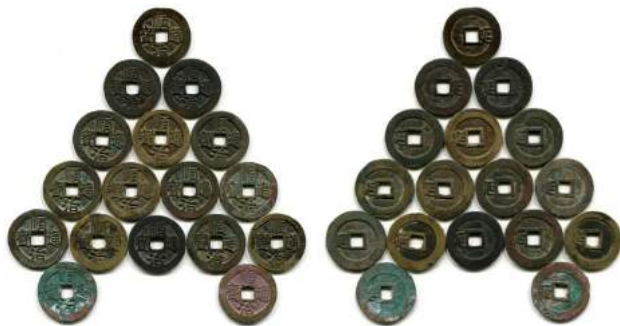


图7

3.市场新表现。近年,不少顺治珍稀版别钱的价格又刷新了历史最好水平,同时,藏家和投资者仍持币待购。

(1)魅力珍钱。如分头延,开始出现时的成交价约6000元左右,时隔不久,生坑分头延的价格,就超过了1万元;同版左延,华夏拍卖,创下过单枚1.5万元的高价,但不久就被1.8万元的成交价格所超越,创历史之最。而同版右延的价格,由华夏拍卖时的3万多元则上升到了6万元以上;2枚上工的成交价,居然创造了25万元的天价,令人惊叹不已(图8)。



图8

(2)争抢新版。2011年,在大同发现的三万多枚顺治钱中,出现三枚右临版光背新版,此钱一面世,即遭到了争抢。标价7000元,有人还想讨价还价,可是一会儿功夫,就有人按标价买走了,可谓秒杀!

(3)“靓妹”俏销。2011年,一些顺治钱并非新版,而只是字口好和包浆漂亮,销售便十分火爆。如:大明上工版光背,瘦页狭治版光背,背二版光背,同版右户等;甚至普通版右户,因为是名坑,销售也同样火爆。这说明,品牌也决定价值!

十年耕耘,众志成城,顺治钱成了清钱中的一道美丽风景。

风景这边独好! ▲

湖南黄铜元鍍金样币收藏研究简述

段洪刚

由于晚清钱荒,加之咸丰年间(1851-1861年),受“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全国通货膨胀严重,北方各省滥发虚值大钱,市面制钱严重缺乏。光绪晚期(1875-1908年),来自云南的铸币铜材料供应不足,铸造制钱的成本持续增加,迫使多数地方铸钱厂停产,制钱产量大幅减少。在御史陈其璋等大臣多次上奏要求开铸新式铜元的情况下,迫于形势,清政府终于同意由洋务派领袖李鸿章主持在广州开铸新式铜元。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广东造币厂首先铸造出新式当十铜元。从此开始了全国各地大规模开铸铜元的历史时期。

湖南造币厂由巡抚余廉三在光绪二十八年上奏设立,地址在长沙西长街,用银元局机器生产铜元。次年(1903年)又另外在长沙南门外灵官渡建设新厂,铸币机器来源不明。旧厂系采用英国铸银币旧机,虽印花机多达二十七架,但产量较低。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开铸至三十二年八月底停铸,四年多时间仅铸当十铜元一亿七千九百九十五万九千一百枚;新厂采用了先进的新设备,虽印花机数量仅比旧厂多3架,但铸速惊人。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开铸至三十二年十二月初八日停铸止,短短一年半时间就铸造当十铜元六亿三千二百三十五万六千八百二十五枚,平均日产量超过110万枚。光绪三十三年,全国各地兴起修建铁路高潮,已奉部令归并湖北的湖南局也以铁路开工为由,又奏准续铸铜元一年。

在这个狂飙突进的时期,全国很多造币厂为了提高产量、质量,大多委托外国造币厂代铸铸币模具,有些外国工厂看到中国的巨大商机,主动为中国各地的造币厂提供造币机器和印花模具。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工厂事先按中国客户的要求,设计铸造了少量的样币,而且各具特色,以便中国客户选择。最有名最广为人知的有英国伯明翰造币厂、美国费立克纳浦厂、德国造币厂等。其中,德国造币厂为中国湖南乃至多个省份铸造过银币、铜元的样币,至今德国某些博物馆保存有相当数量的中国钱币的钢模。

湖南省是晚清中国各地委托德国造币厂代铸钢模和样币的典型代表之一,目前没有更多明确记载这种委托关系的材料和文献,但从实物来看,德国造币厂至少为湖南造币厂设计铸造了五种以上多个版本的铜元模具并都铸造有若干样币,其中有些还引起过极大的争议(比如湖南龙配福建小闽关、湖南配广西飞龙)等,

从这些系列的特殊搭配来看,尤其从福建小闽关配湖南龙来看,德国造币厂从1903年直到1905年都在承揽湖南、广西和福建的业务。但在多年的尝试过程中,没有看到广西有真正的晚清龙版流通铜元面世,福建闽关铸币厂虽在1905年开始铸造,但也没有明确的记载其模具来自德国。于是“湖南省造”系列铜元样币,就成为了中国铜元收藏中的一大疑团,至今没有解开全部的谜底。这也成为了该系列铜元深受藏家欢迎的一大亮点,因为虽然没有明确的历史记载,但却有明确而且真实的实物存在。

在这些明确而且珍稀的“黄铜元”样币系列中,有一个品种如同皇冠上的钻石,熠熠发光。那就是鍍金版。目前全国全世界已知的“湖南省造黄铜元”系列样币各个版本,约30枚左右,其中约2枚在德国的中国天津泉友手中,一枚在俄罗斯青年藏家手中(该品曾拿到北京公博钱币鉴定公司由段洪刚先生亲自观摩鉴定,但币主神秘隐去,再没有出现),其他20多枚在中国大陆及港台泉友之手。所有这些存世已知的样币,鍍金版只有2枚。

其中第一次披露该品鍍金样币的是中国嘉德拍卖会,约十年前在钱币大师马定祥旧藏珍品专场亮相,由福建藏家李某获得,轰动全国钱币界。2011年该品鍍金样币由云南段洪刚介绍转让山西藏家康某珍藏,当时估价约200万元。此后5年,再没有见过第二枚鍍金版,该币当时的成交,创下了中国铜元单枚成交的最高纪录,后来才有四川当三十铜元约400万成交的纪录。

直到五年后的2015年年底,德籍中国泉友吴某,在当地某小型拍卖会收获第二枚鍍金版。细节、图案、甚至背逆现象,都和当年马定祥旧藏一模一样。这才使当年的中国铜元第一娇子获得了更明确的证实。众所周知,任何样币,都不可能只铸造一枚。吴先生在德



湖南黄铜元鍍金样币

对做好吉安红色金融工作的思考

刘小兰

(中国人民银行吉安市中心支行)

红色金融是指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在不同时期开展的金融活动。吉安红色金融资源丰富,保护宣传好红色金融资源,对于传承红色基因,教育后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做好吉安红色金融工作,充分发挥红色金融资源在促进吉安金融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值得我们研究思考。

一、传承红色基因,做好红色金融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激活红色基因,让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彰显新的时代价值”,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吉安是共和国金融发源地之一,吉安东古平民银行是我党创建的最早的银行之一,井冈山上井造币厂是我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个金属铸币厂;在吉安建立的江西工农银行,是中央苏区第一个省级苏维埃政府领导下成立的金融机构,也是我党领导的革命政权建立的第一个具有中央银行性质的国家银行——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先驱……吉安革命根据地时期的金融工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全面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塑造了我国现代金融的雏形。

(一)做好红色金融工作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历史工程。红色金融史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壮丽史诗中的重要篇章,也是当代金融人继往开来,开拓创新,创造我国金融事业新成就的精神力量和动力源泉,当中蕴含的“坚定信仰、艰苦创业、不怕牺牲、清正廉洁、争创第一”的伟大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保护、利用好红色金融资源,继承、发扬好红色金融精神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做好红色金融工作势在必行。

(二)做好红色金融工作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政治工程。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史是一部艰苦卓绝的奋斗史,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和苏区干部好作风,是吉安红色金融历史的生动体现。做好红色金融工作,激活红色基因,必将进一步激发金融职工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坚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理想和信念,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做好红色金融工作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国偶然收获到了这极为珍稀的第二枚鎏金样币之后,很快带回中国,并由北京公博钱币公司段洪刚先生转发图片与国内顶级藏家共同研究分享,确认为毫无疑问的真实珍稀样币,该品的面世,进一步丰富了湖南

“黄铜元”样币系列的家族,也进一步证实了这批样币的来历,其收藏价值与历史价值是不容低估的。

目前所知的中国铜元鎏金样币,一共3种4枚:本品黄铜元鎏金版是最早披露的,目前一共连本品知道2枚;其次是北京公博钱币公司收藏的“天子万年”江南当十加厚鎏金样币,目前知道1枚;其三是今年秋拍由诚轩拍卖公司出品的“大清铜币己酉二文”,目前仅知3枚。类似鎏金样币,一般均为铸造机构精心铸造之后鎏金上呈户部或财政主管机构领导,以求审核批准,数量往往个位数,与一般样币数十枚小批量铸造又大不一样,不会出现多枚,因此更显弥足珍贵。

尤为难得的是,该品保存良好,文字图案细节清晰美观,鎏金层面金黄闪亮,使得这一枚皇冠级珍品的形象更加美轮美奂,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铜元顶级重器之一。▲

观的文化工程。丰富的红色金融资源是红色金融文化的璀璨瑰宝,新时期的金融人不仅应该了解和学习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史,更应该继承和发扬先辈们的优良传统,汲取他们创业干事的宝贵经验。做好红色金融工作,将传承红色基因,传播红色文化,弘扬伟大民族精神,作为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教育,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抓手,实施职工素质教育,进一步践行和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四)做好红色金融工作是助推吉安经济发展的经济工程。吉安大量的红色金融资源地处赣南、赣西南和湘赣原中央苏区等经济欠发达地区,通过对红色金融资源的挖掘、保护,把红色金融资源纳入旅游和文化产业的开发和利用当中,进一步推动吉安红色旅游文化建设,助推吉安老区振兴发展和吉泰走廊区及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为吉安实现“发展升级、小康提速、绿色崛起、实干兴吉”的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二、建立有效机制,做好红色金融工作

开展红色金融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持续、细致的艰巨任务,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多个领域,需要全市金融系统的高度重视,以对历史负责、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积极主动的参与到红色金融工作中,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具体承办部门和工作人员,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从全局的角度,全方位对做好红色金融工作进行谋划,进一步推动吉安红色金融工作开展。

(一)成立红色金融工作机构。红色金融工作机构作为吉安市金融系统共同开展江西红色金融挖掘、保护、利用和开发的工作机构,成员由各金融机构以及热心、热爱红色金融研究的人员组成。其主要职责是研究吉安红色金融资源的挖掘、保护、利用和开发,为红色金融工作提供物质保障。

(二)建立红色金融工作机制。红色金融工作历史悠久,地域范围广,包含内容多,要做好红色金融工作必须做到有计划、有步骤,统筹安排,逐步推进。建立“四共”的红色金融工作机制,通过“旧址共维,基地共建,资源共用,成果共享”的工作机制,使开展红色金融工作形成制度、规范管理,让宝贵的红色金融资源在有效的机制建设和管理中焕发生机。

三、多项措施并举,做好红色金融工作

(一)通过对旧址实物的维护,做好红色金融资源的保护工作。吉安的红色金融旧址是吉安金融机构的“祖屋”。但是不少红色金融旧(遗)址、实物由于缺乏保护,面临损毁、消失、流失,而这些都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因此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一是根据现状对旧址进行维护。对保存完好的旧址,做好日常维护;对房屋破损,但已被相关部门认定的旧址,进行抢救性维修,尽可能恢复历史原貌;对已损毁的旧(遗)址,不可

复制的旧(遗)址采取立碑的方式进行维护,力争保留好历史遗迹。二是进一步挖掘、收集、整理红色金融资料,不断充实丰富旧址、博物馆、纪念馆内红色金融的文物、史料。旧址维护工作由各金融机构共同承担,对旧址的维护要做到有计划、有步骤、有措施、有目标。积极争取地方党史、文博部门的支持,对旧址等珍贵文物进行鉴别、认定,形成共同维护的良好氛围和环境。

(二)通过红色金融基地共建立,做好红色金融资源的开发工作。红色金融旧址等资源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现实价值和教育价值,是珍贵的历史教科书,是红色“记忆库”,把这些历史遗迹作为红色教育内容,建成教育基地,充分发挥教育人、鼓舞人、激励人的功能作用。红色金融教育基地建设由金融系统共同开展,对保存完好、史料齐全的红色金融旧址,采取分层次、有计划、有步骤、逐步推行的方式将其作为红色金融教育基地进行挂牌保护利用,使红色金融教育基地的教育功能不仅体现在地方层面,也体现在国家层面;受众面不仅涵盖金融系统,也普惠全社会。在挂牌的同时要充分利用好党史、文博部门的专业优势,做好文物史料的运用,将红色金融资料、实物纳入党史文博部门的文物保护管理中,使红色金融成为红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通过对红色金融资源共用,做好红色金融资源的利用工作。红色金融教育基地是全市人民的共同资源。金融机构应将红色金融教育基地作为金融系统党员教育、职工培训、新行员入行教育的学习平台,安排员工到教育基地参观学习,重温党的红色金融历史,学习红色金融精神,开展革命传统教育,让红色金融成为金融员工的入行教育史、思想道德课、职业精神魂。红色金融教育基地也是全市金融系统了解民意、了解实情的调研基地。红色金融干部职工教育基地大部分地处偏远地区和乡村,是全市金融系统下基层、进乡村开展调研的最好的工作点,金融机构每年在规划调研工作时,应有针对性的安排到有红色金融资源的地方开展调研,通过深入实地的调查研究,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四)通过对红色金融成果共享,做好红色金融成果的运用工作。红色金融资源是传承红色基因的宝贵财富,充分运用好红色金融成果,通过统一制作电视宣传片、印制宣传材料、设计统一标志,利用营业网点、服务窗口对红色金融进行宣传。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建立微信平台、开办红色金融专栏、建立“志愿者”队伍等,将红色金融知识送进学校、带进社区、走进企业,发挥红色基因的正能量作用,进一步激发金融支持吉安老区振兴发展和吉泰走廊区及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热情,在新常态下积极支持地方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民国汉口和成银行经理赵忍安

吕怀平

和成银行是川帮商业银行之一。1934年5月,吴晋航邀约川康军政官吏10余人创立和成钱庄,为股份有限公司。1938年1月,和成钱庄改组为和成银行,实行总行制。1947年改总行制为总管理处制,该行改行总管理处制后其内部机构设置:总经理秘书室、稽核室、经济研究室、业务部、储信部,当时该行辖有分行10个、支行1个、办事处13个,分布于重庆、武汉、广州、南京、昆明、宜昌、成都、万县、南充、泸县、西昌、长沙、贵阳、乐山、宜宾、合川、广元、北碚、会理、雅安、遂宁等处。

和成银行汉口分行于1946年1月在汉口胜利街25号设立,经理赵忍安。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12月8日和成银行汉口分行进入公私合营银行汉口分行(由上海、新华、中国实业、四明、浙江兴业、和成、浙江第一、金城、大陆、中南和盐业等11家商业银行的汉口分行合并而成),原行名取消。



赵忍安,常州人,赵氏是常州望族,因父亲在四川做官,赵忍安1912年出生在成都。少年时代,他在校读书期间,受到进步思想熏陶,倾向进步。1925年参加孙中山逝世的纪念会。1926年,上街参加了“三一八”惨案游行示威。1933年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反(对)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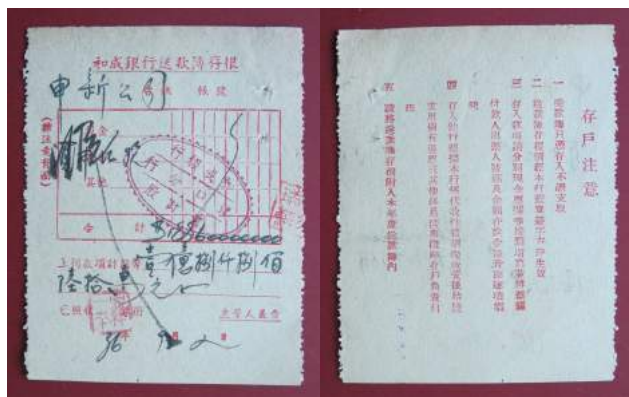
(国主义)大同盟”。1937年他受中共党组织的派遣,到四川乐山彝族地区工作,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在乐山任乐群垦社特支书记。在南充任支部书记、南华艺社党团书记。1940年,被派往重庆,打入和成银行,任襄理(副总经理),潜伏在金融界为党工作,任银行特别支部党团书记、化龙桥区委委员及书记等,直属中共南方局领导。

1945年10月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和成银行准备到武汉开设分行,中共南方局决定为武汉重建地下党组织做内应,通过活动,成功让赵忍安到武汉筹建分行。1946年1月,和成银行汉口分行在胜利街25号成

立,他任经理。

赵忍安到汉后不久,就登门拜访国民党省政府主席万耀煌,主动帮主席夫妇换了30根金条和一些银元,万耀煌看到物价飞涨,拿了不值钱的金圆券通过赵忍安的关系,兑换成金条。此后,万耀煌夫妇把他当作心腹,常到赵家串门。有一次到交通银行赴宴,刚上头道菜,万就借口有事,信步走到和成银行赵经理府上“搞一点小吃”。此事轰动三镇,赵忍安成了武汉上流社会的“大红人”。为他开展地下工作,获取国民党重要情报创造了有利条件,和成银行汉口分行也成为武汉地下党领导机关的重要交通站。

赵忍安为中共地下党武汉创建人之一,直接受周恩来、钱瑛领导,他以和成银行汉口分行经理的身份为掩护,潜入国民党湖北省党、政、军上层,为党送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情报,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因其“西装革履,高大英俊,夫人翁和新旗袍烫发,漂亮高雅”,被当地人称为“中共地下党中的一对‘金童玉女’”。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货币制度立法探析

黄丽 何康

现代国家在遭遇战争等紧急情况时,怎样能够通过合理使用国家权力调控自身出现的经济问题,是一个极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历史上,通过立法等国家干预手段来调控自身经济状况的成功案例不胜枚举,如美国通过罗斯福新政克服了当时的经济危机等。近代以来,西方的经济管理理论在我国的国家治理实践中被广泛地加以应用。其中,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于货币制度立法的诸多实践便是这一应用的具体体现。

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为了适应战时的相关需要,在经济运行领域实施了国家统制金融体制。而这套体制的一个重要部分,便是通过立法手段加强国家对于金融市场运行的干预。其中,加强在货币制度领域的立法是使得这套国家统制经济体制得以运行的关键环节。因此,本文主要基于战时国民政府经济统制政策中的货币制度立法角度进行概述。

一、战时国民政府货币立法的背景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实施经济统制政策、加强对货币制度的立法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背景。

经济基础的变动往往是上层建筑改革的先导。抗战时期国际和国内的经济环境都为国民政府加强货币制度立法提供了理论和现实支持。早在一战期间,便有大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加强对于国家经济运行的干预以适应战争的需要。1929年至1933年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期间、美国实施罗斯福新政并取得了良好效果,更是使得当时世界对于国家统制经济模式有着极强的好感。世界范围内对于国家干预经济发展的

推崇对当时的中国也产生了影响。而在当时的中国国内,伴随着1928年张学良在东北宣布“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完成对于全国政权的形式统一。此后几年间,南京国民政府以统一的中央政权为基础,通过成立中央银行、发行“法币”并改革货币政策使得国家经济管理体系日益健全成熟。1927年至1937年间,中国国内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迅速、金融领域蓬勃发展,相关管理行业也随之兴起。这些都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进行系列货币立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理论积累。

此外,在政治层面,抗战期间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当时国民政府加强货币制度立法的直接政治原因。“九一八事变”以来,全国抗战形势逐步升级、并在“七七事变”后演变成全民族的抵抗侵略战争,中国共产党倡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即形成。此时摆在所有中国人民面前最为急切的任务便是集中全国一切的人力物力支援抗战、早日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逐出中国国土。为应对当时的形势,国民政府借鉴当时苏联经济调控的模式制定了“统制银行及外汇业务”、“推行战时税制”等一系列政策。同时,在当时国民党中央所颁布的《抗战建国纲领》中,“非常时期一切经济设施应以助长抗战力量,求取最后胜利为目标”被作为抗战时期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

二、战时国民政府货币立法的特点

战时立法,通常是一国政府为了适应在战争等紧急状态情况下的需要而制定的法律。因此,战时立法往往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货

新中国成立后,赵忍安历任中国人民银行中南区分行金融管理处处长、武汉市分行副行长,武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工商代表团副首席代表,武汉市工商联筹备会副主委,民建武汉分筹会筹备员。1950年5月,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1952年调中共中央统战部,并任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工业组副组长。1959年到上海,后调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还担任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

主委,为中共的统战事业作出了贡献。“文化大革命”后,他调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任副行长,认真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中共的统战政策,使金融界的知名人士得到妥善安排,还热情拥护金融体制改革,发表了一些银行工作和金融研究方面的文章。

1986年5月25日,赵忍安因患脑溢血不幸逝世,终年74岁。▲

币立法亦属于战争立法的范畴。因此,这些法律法规诞生以来便具有了浓厚的时代烙印。

(一)立法流程的精简性

现代国家的立法流程通常有着严格的立法程序,即通过了解社会实际需要、进行法条的起草和拟定直至最终核准与公布实行等几个流程进行。而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货币立法根据当时的规定,只需要直接由主管机构根据自身需要起草并经相关机关核准备案后即可生效。如当时为加紧对货币发行管制而制定的《中央银行接收省钞办法》经财政部核准后直接得以施行;《统一发行实施办法》经四联总处临时理事会核准后即刻生效而并不用通过正常的立法程序加以制定和审查。因此在立法流程上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二)立法主体的多元性

按照一般理论,一个国家的立法活动往往由一个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进行。而抗战时期,对于货币政策的立法机关除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外,其他机构如行政院、军事委员会乃至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均具有参与货币制度立法的权利。如当时的四联总处制定实施了《集中定制辅币券办法》、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公布实施了《商人简结出口外汇办法》等法规都属于相关机构参与制定货币法律法规的案例。由此可见当时参与货币立法的主体之间层级相当复杂,既有中央政府机关和其相关职能部门又有地方的相应机构,他们彼此之间并非单一的隶属关系。因此当时国民政府的货币立法主体呈现出了多元、复杂的鲜明特点。

(三)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国民政府建立后曾大规模开展立法工作并形成了一套相应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的法律有宪法、法律和命令三个层次,法律被称作法或条例,命令则包括令、规定、细则、规则、办法、流程和注意事项等。在抗战期间的货币制度立法方面,除了有大量以国民政府名义发布的法律如《查禁敌货条例》外,绝大部分法律法规是以命令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如行政院发布的《统一发行办法》、四联总处指定的《集中定制法币券办法》等等。

(四)法律执行的强制性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所制定的系列货币法律属于当时战时经济统制法规的组成部分。而实施经济统制的主要目的便是通过相应的强制手段作为支撑,统制战时国家产业、贸易、物价和生活消费品。因此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货币领域所制定的法律多以强制性规范为主、并伴随有大量刑事处罚条款。如1939年财政部公布的《取缔敌伪钞票办法》便规定了对协助敌方利用假币破坏国家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一经发现将等同于汉

奸罪中的相应条款论处。

三、战时国民政府货币立法的主要内容

(一)根据战时形势规范辅币的发行

小额币券的发行能够适应日常交易与小额收付的需要,在调节日常经济秩序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是战时货币制度立法的重要对象。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流通货币辅币券发行方面制度的立法主要经历过三个阶段。

战争初期,国民政府货币制度立法的导向是支持辅币的制作发行。根据当时的相关规定,以地方银行为单位发行的国币辅币流通范围仅限于发行该币的省份,这就使得敌伪势力很难通过破坏辅币信用来对国统区经济运行施加影响。并对中国的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因此,国民政府通过颁行《设立省银行或地方银行及领用或发行兑换券暂行办法》,特别授予各级地方银行保留一定的货币发行权,以适应战时政府机构庞大的财政支出和前线作战的军费需要。

战争中期,国民政府将货币制度立法的重点转向约束辅币的发行。根据抗战中期的形势变化,四联总处颁布了《管理各省省银行发行一元券及辅币券办法》,规定发行国币辅币的单位只能是各省或者各地方的银行、以免日本侵华势力通过破坏活动大量套取外汇。在这份《办法》中,除了规定了由财政部、四联总处和发行准备委员会作为专门监管机构实施严格监控和督导以规范辅币的发行外,还采取当时最为先进的“双重担保制度”以利于辅币制作发行的监管。

战争末期,国民政府货币制度立法的重心开始变为对于辅币发行的约束。1942年6月,四联总处制定了《统一发行办法》,规定了中央银行为全国唯一的法币发行机构。同年7月,财政部追加颁行了《中央银行接收省钞办法》,进一步加强了对货币发行事务的限制。货币发行制度统一为日后国民政府实施更为严格的国家统制经济体制铺平了道路。但是这种对于金融业务的高度垄断也成为了权钱交易行为滋生的土壤,为国民政府日后出现的严重腐败现象埋下了伏笔。

(二)将货币的发行权收归中央

抗战爆发后,面对国统区经济发展巨大的资金需求和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财政收入锐减、财政支出猛增的实际状况,国民政府在抗战中后期开始实施增发货币的政策。由于战前的货币发行采用的是分区发行,而将货币的发行权统一于中央金融机构、强化中央银行职能,是中央金融机构得以发挥自身功能的前提条件。因此,为收归并统一货币发行权、国民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立法活动进行相应的制度建设。

首先,蒋介石发布了收归货币发行权于中央银行

的指示。随后,根据蒋介石的指示、行政院通过了《统一发行办法》并责成国民政府下辖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四家国有银行遵照执行。作为战时处理国家金融事务权威机构的四联总处为了更好地实施《统一发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又追加颁布了《统一发行实施办法》来进一步规范货币发行领域的监管^[2]。

通过上述的立法活动,中央银行在法币发行领域的专权得以明确、其统一货币的职能在立法层面上基本得以实现,同时国民政府还通过设立四联总处,使其在国家经济运行上发挥重要影响、成为了巩固中央银行经济地位的重要支撑。最终,抗战时期在货币发行方面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核心、其他三家国有银行作支持,全国商业银行为覆盖的金融管理体制。

(三) 严厉惩治假币的制作与流通

抗战时期,为破坏我国金融市场秩序、日伪政权通过大量制作伪造的法币输入大后方的手段企图破坏中国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进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为了防止假币对于国家经济运行的破坏,早在1935年国民政府开始实施币制改革初期便在《中华民国刑法》对于伪造货币罪的各种表现形式给予了明确的定义和处罚措施。尤其是对于协助假币流通、破坏或伪造货币等行为分别进行了具体的界定,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因此,《中华民国刑法》为当时国民政府打击伪造货币现象提供了法律保障,对制造和使用假币的行为产生了强有力的震慑^[3]。

1938年7月,为了进一步防止假币对大后方金融秩序的破坏,国民政府公布了《妨害国币惩治暂行条例》的再次修订版本。其中为了对战时伪造、变造国币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进行更加强有力的震慑,相关法条中的处罚措施比刑法中的条款更为加重。这些法律法规为保护法币权威起到了最后屏障的作用,具有很强的普遍适用性和稳定性。1943年9月,国民政府追加颁布了《战时伪造法币治罪暂行条例》,除了再次体现《妨害国币惩治暂行条例》中严厉惩治的思想外,新条例还制定了全新的法条如悬赏鼓励举报伪造国币的犯罪行为、对伪造、变造国币的行为提供便利或知情不报者均处以刑事处罚等,进一步强化了对于货币市场的管控与治理。

除了严厉打击国统区内部制作和流通的假币和伪币外,为使国家经济运行不受破坏、还须对日伪势力投入大后方的假币进行严格监控。为此,国民政府制订了大量法律法规抵御敌伪势力所制造的假币破坏国内金融秩序,如《取缔收售金类办法》、《私运法币及其他禁运物品出口检查办法》、和《限制携运钞票办法》等。

抗战时期中国流通的法币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样式众多、花色复杂。因此在使用过程中,普通百姓往往对于货币的真伪缺乏辨识能力,这就为敌伪势力制作的假币混入市场流通提供了可乘之机。1939年,国民政府颁布了《日人伪造货币对付办法》,规定了对与敌伪势力通过货币进行破坏的预防和对于相关协助纵容行为的严惩措施,对于遏制敌伪势力破坏中国经济的运行起到了重要的遏制作用。

四、结语

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对于货币制度的立法所拥有的弊端在日后也随之凸显。其中,最为显著的一点便是适应于战时状态的相关法律被官僚系统加以曲解和滥用、甚至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国民政府官员垄断侵吞国家资源的工具。抗战期间货币制度领域的立法也使得国家金融系统的运行过度集中于某个国家机关,最终国民党的官僚系统基本完全垄断了国统区的经济运转。同时,国民政府在战时对于立法活动的随意操控也使得国民党当局的司法系统形成了随意解释相关法条、漠视法律尊严的风气,在司法活动中侵害人民合法权益的行为屡有发生。这些都为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政权迅速走向腐败、丧失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乃至最终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货币制度和立法一样,都是一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通过利用国家机器对当时货币制度所进行的一系列立法活动对全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是近代以来中国对于西方经济政治理论的一次亲身实践。在此过程中所使用的很多理论和立法思想,如通过法定形式统一中央政府对于货币发行的控制、在刑法法条中规定严厉惩处制造使用假币等对于当今的法制建设和经济建设仍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国民政府货币制度立法在实施过程中的缺失也是一部重要的负面教材、也值得当前的我们加以反思,特别在当前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下对于探究腐败行为产生的根源有着深刻的思考价值。▲

[参考文献]

- [1]蒋善祺,罗黎明.民国战时经济统制法初探[J].南昌高专学报,2008,(6).
- [2]伍操.战时国民政府金融法律制度研究(1937-1945)[D].西南政法大学,2011.
- [3]徐德莉.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治理伪造货币政策探析[J].求索,2015,(7).

重温延安时期经济金融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郑泽生

(宜昌市钱币学会)

今年9月5至10号我有幸参加省钱币学会组织的红色教育延安行活动。六天时间里,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到王家坪、杨家岭、枣园参观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故居和中央机关办公地。我们敬佩的是,就是在这样狭小、阴暗、简陋的窑洞里,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雄才大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我们震惊的是,就是在这窑洞的小油灯下,他们写下了一篇又一篇决定中国革命方向、指导中国革命的光辉著作,在这里领导和指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奠定了人民共和国的坚定基石,培育了永放光芒的“延安精神”。置身延安,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为之一振。作为一名金融工作者,我漫步南泥湾的稻田,穿行陕甘宁边区银行旧址,对延安时期的经济金融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一次系统的回顾。

一、经济金融是对敌战争的重要武器

延安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经济金融问题,把“发展工业、商业和金融业”作为“我党的重要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3页),在开展“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的同时,大力开展“经济的竞赛”,“努力于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4页)。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政府成功地运用毛泽东的货币金融思想,摆脱了国民党和日寇的金融掠夺,摧毁了旧的封建主义货币金融体系,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货币金融体系,使边区成了共产党局部执政的“示范区”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试验区”,有力地支持了中国人民抗战事业和解放事业。

二、经济发展是重要基础

延安时期,针对边币与法币同时流通并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毛泽东指出:“边区的问题,基本上不是金融问题,而是经济与财政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只有通过发展生产”。重申“关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和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合,而不是相违背”(《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8页),并明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认为“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

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同时,还批评一些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1-892页)。这些都充分说明毛泽东已经认识到货币发行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即货币的发行应以生产的发展为基础。

为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边区政府采取减租减息、发放贷款、开源节流、精兵简政等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推动了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解决了边区“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的问题,使边区掌握了足够的物资,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现象,为边币币值稳步提高,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1944年,边币发行增加2倍多,但物价上涨只有1倍多,边币又进入到相对的稳定时期。

三、独立自主是重要前提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从巴黎公社的失败中吸取了沉痛的教训,认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方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8页),“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1页)。而对于外国资本的进入,特别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开银行、投资和放款,他则认为,这“不仅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9页)。因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不久,边区政府就在充分吸取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银行、利用银行的思想基础上,突破合作协议中国国民党不同意边区设立银行、

发行货币的局限,相机行事地建立了边区银行,牢牢把握“边区金融问题的中心就是边币问题”这一核心,正确处理边币与法币之间的特殊关系。当货币兑换出现问题时,边区毫不犹豫地发行辅币——光华券;当国民党停发军饷时,党中央授权边区银行发行主币——边币,断然决定停用法币,切断与法币的联系,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保护边区经济的安全稳定,使边区人民免受法币贬值的损失。边区党政军多次发出训令、快邮代电、火急密电等,一再重申“畅流边钞、禁用法币”的政策,使边币牢固地占领了边区市场,也扭转了边区金融工作的被动局面,摆脱了国民党政府对边区的金融控制,保障了边区经济工作的金融安全,赢得了边、法币斗争的主动权,达到了以经济上独立自主支持政治上独立自主的目的。

四、保持稳定是重要目的

保持货币币值稳定,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货币金融思想。延安时期,毛泽东曾指出,要保持汇率的稳定,纸币发行要有准备金,要有适当的贸易政策作后盾,应维持不低于伪币之比价(《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37页)，“能够解决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这两个问题,就能使银行币稳定”(《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页)。因此,边区政府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结合边区实际,灵活机动地开展金融工作。当边区物资缺乏时,物价上涨,就适当地降低边、法币比价,使法币升值,便利物资进口,物资进来后,物价跌落,又适当地提升边、法币比价;当边区不缺乏物资时,就适当地提升边、法币比价,使法币贬值,择机扩大边币的流通范围,促进边区金融稳定、边币稳定。但是,作为交换媒介,法币有优于边币的地方,边币是“短腿”,法币是“长腿”,法币不但是国统区的法定货币,而且还占有边区65%的市场。政策上,边币要独占边区市场而成为边区境内唯一合法的流通工具,但事实上,边区受到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不足的影响,又不能完全排除法币,并在对外贸易上将边、法币联系起来,形成了特殊的边、法币同时流通状态和复杂的边、法币关系。

边币发行初期,特别是光华券辅币发行时期,边、

法币的比价基本固定在1:1,物价基本稳定,与国统区物价相应变化。1941年2月,边区银行币主币发行,边、法币的比价和边区的物价就逐步发生变化,不久就出现金融动荡和通货膨胀。1941年5月,边区第一次出现金融大波动,延安物价指数甚至一度超过重庆,造成边、法币比价下跌,达到2:1。为支持抗战、支持财政、支持经济发展,边区仍旧加速边币发行。从1941年2月到1944年6月,在不到三年半的时间里,边币就增发787倍,延安物价同期上升817倍(高强:《陕甘宁边区货币发行初期的通货膨胀与治理》,《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边、法币比价由1941年2月的1:1跌至1944年2月的11:1,结果造成边区物价飞涨,法币大量外流,边币迅速贬值。

面对因边、法币独特复杂的货币关系而产生的颇为奇特的经济现象与金融动荡,一些经济方面的专家存在严重的金融本位主义、货币保守主义倾向,脱离实际而又无法解决问题。于是,毛泽东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他还认为,“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还没有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8页、第813页)。当时主持边区财政金融工作的陈云认为分属于两个不同经济体系的两个不同货币体系的边、法币之间的货币关系是“七分服从,三分独立”(《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01页)的关系,在战时经济下,货币对物品的购买力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法币的涨跌必然会引起边区外物价的涨跌。这就是说,货币斗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金融稳定只能稳定在比价上,而不能稳定在物价上,如果想通过给边币升值的办法来维持边区内物价的稳定,就会“打了我们自己库里的法币”。因此,为了重振边币信心,打击法币,整理金融,做到在扩大发行的同时又不会引起金融和物价的波动,陈云就采用以发行商业流通券替代边币,最终使边、法币比价重新稳定在1:1左右,使边区物价重新趋于稳定,取得了边、法币斗争的完全胜利,“创造了中外战时财经史上鲜为人知的光辉的一页”。▲

(上接第32页)借券或公债券。它是一种实物公债,此类实物公债券,兹不多述。

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发行的公债券,是适应革命斗争需要而产生的,它在筹集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经费,在支持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反映当时革命斗争历史的重要物证。▲

【参考文献】

[1]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债金融司.中国革命根据地债券文

物集[M].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

[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训令——建立现金出口登记制度》第十九号(1933年4月28日)[A]//江西省税务局.中央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M].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3]同[1].

[4]丁国良,张运才.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M].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

延安行

刘双庆
(天门钱币学会)

久闻圣地延安名，
今日陕北终成行，
一路高铁飞奔进，
终见延河宝塔影。

红军会师陕甘宁，
革命延安是中心，
军民团结齐参战，
窑洞灯火照前程。

黄土高坡杨家岭，
主席书写理论文，
指导思想来确定，
七大会议方向明。

走进旧址王家坪，
军委在此发命令，
总部指挥抗日战，
要把鬼子消灭尽。

来到枣园树成阴，
书记住此四年整，
指导整风转作风，
抗战胜利普天庆。

南泥湾里歌声情，
唱出当年开荒景，
乱泥荒山变粮田，
不忘当年将士们。

边区银行陕甘宁，
十年经营为人民，
发行边币驱法币，
金融史上永留存。

梁家河村好知青，
他是当今习近平，
窑洞生活不怕苦，
六年造福为村民。

纪念馆里展历程，
体现延安七精神，
两点一区是经典，
永远激励后来人。